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1998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丁午壽議員，J.P.

田北俊議員，J.P.

朱幼麟議員

何世柱議員，J.P.

何秀蘭議員

何承天議員，J.P.

何俊仁議員

何敏嘉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永達議員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家祥議員，J.P.

李啟明議員，J.P.

李國寶議員，J.P.

李華明議員

呂明華議員，J.P.

吳亮星議員

吳清輝議員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J.P.

夏佳理議員，J.P.

馬逢國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張永森議員，J.P.

許長青議員

陸恭蕙議員

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

陳智思議員

陳榮燦議員

陳鑑林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J.P.

程介南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黃宜弘議員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J.P.

楊孝華議員，J.P.

楊森議員

楊耀忠議員

劉千石議員，J.P.

劉江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G.B.S., J.P.

劉健儀議員，J.P.

劉漢銓議員，J.P.

劉慧卿議員，J.P.

蔡素玉議員

司徒華議員

霍震霆議員，J.P.

譚耀宗議員，J.P.

馮志堅議員

缺席議員：

梁智鴻議員，J.P.

梁耀忠議員

鄭家富議員

羅致光議員，J.P.

出席政府官員：

行政會議議員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J.P.

行政會議議員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J.P.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J.P.

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J.P.

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J.P.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J.P.

衛生福利局局長霍羅兆貞女士，J.P.

財經事務局局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梁寶榮先生，J.P.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鄭其志先生，G.B.S., J.P.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J.P.

經濟局局長葉澍望先生，J.P.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先生，J.P.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J.P.

工務局局長李承仕先生，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J.P.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議員議案

致謝議案

恢復經於 1998 年 10 月 21 日動議的議案辯論

主席：各位議員，現在繼續辯論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致謝議案，以及分別由李卓人議員、陸恭蕙議員及李柱銘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朱幼麟議員。

朱幼麟議員：主席女士，特區行政長官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可謂是“高瞻遠矚”的，可惜施政報告公布時正是本港經歷近 50 年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衝擊，令社會上有些人不切實際地將施政報告當作是即時見效的救市藥方，因此，對這份施政報告產生不滿。不過，我們要明白董先生是一位行政長官，不是魔術師。他們忽略了報告內對於香港長期發展影響深遠的部分。以下我會說出我對施政報告中在教育和社會福利政策方面的意見，而港進聯其他的同事亦已經就施政報告的其他方面作出回應。

香港最寶貴的資源便是我們的人力資源，過去百多年來，香港經歷了無數風浪，都是靠香港人堅毅的精神跨過危機。因此，制訂完善的計劃來培養本地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歡迎行政長官提出教育將繼續是本港最大的經常開支項目，而對於施政報告內的多項有關教育的措施，我是非常支持的，特別是在中、小學引入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更是切合時宜的做法。不過，我認為報告內提出為學校提供“資訊科技統籌員”的進度可以加快，以盡快擴展至全港每間學校。為了配合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政府亦必須加強對教師的培訓。

“培育本港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這個大原則是正確及值得支持的。不過，不少家長仍然對母語教學缺乏信心，亦有教師尚未習慣使用中文教材。為此政府必須投入資源，一方面加強學生英語訓練，確保學生的英語水平不會因為實行母語教學而下降，另一方面積極發展中文教材，協助教師推行母語教學。

對於高等教育發展方面，我認為要“質量並重”，在培養學生學術成績的同時，更要顧及學生的性格發展。對於“質量並重”，報告內提及增設 11 000 個學生宿位，我是非常贊成的，因為宿舍生活不僅是大學生活最精采的部分，亦能培養學生對大學的歸屬感，更重要是讓學生有更多時間留在學校參與課餘活動，訓練學生與人溝通的技巧和領導才能。

社會福利方面，我支持政府全面檢討社會福利資助制度，使我們的社會福利能幫助真正有需要幫助的人，而不致浪費社會資源。我認為在發展社會福利的同時，更要注重培養“自強不息”的精神，令香港不致淪為福利主義地區。

此外，我亦支持報告內提出的義工計劃，特別是長者義工計劃更值得推展，因為該計劃能充分發揮我們中國人“老有所為”和“助人自助”的精神。

不過，港進聯對於報告內未有承諾成立“社會福利服務發展資金”感到失望。我相信我們的社會仍然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值得我們為他們成立基金推展新的社會服務。

最後，港進聯想就政府不保留兩個市政局的做法，表達一點意見。大家都知道，香港未來 10 年會在新界地區大興土木，以及在市區加快舊區重建。新界地區與港九地區的市政服務需求，仍然會非常殷切，箇中差異也會很大。故此，兩個市政局依然有存在的價值和分工的必要。同樣重要的是，長期以來，兩個市政局作為市民民主參與的重要渠道，以及地區市政服務的主要機構，有關的重組問題實在有需要從長計議、循序漸進，以免只是為了行政的方便，而犧牲了民主參與及市民利益。可惜，政府仍然拒絕延長諮詢期，堅持不保留兩個市政局，港進聯對此表示遺憾。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擱置有關的決定，與各界人士展開理性、務實的討論，尋求最大的共識後，才處理區域組織的重組問題。

總括來說，這份“高瞻遠矚”的施政報告是值得我們支持的。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梁智鴻議員的議案。

主席：夏佳理議員。

夏佳理議員（譯文）：主席，施政報告辯論一般都反映議員不滿政府在好景時過於吝嗇。所以，在現時不景氣之中，各位議員以至市民都期望政府能夠大手一揮便把所有困難一掃而空，這是毫不奇怪的事。可惜現實是未有即時見效的良方，於是大家便要找個人來做代罪羔羊。找誰比找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更為方便呢？但這樣做又是否公道，是否實際呢？

主席，我會把我的意見分為 3 個部分：首先我會談談房屋和金融服務，然後再論及公營部門開支的社會成本，最後會論及政制問題、行政立法關係和 3 項修正案。

主席，我們很多人都認識到經濟增長對社會的重要性，對香港也不例外。連民主派亦認同這一點，只不過他們似乎仍然認為民主至上。我們很多人認識到物業、建造業和金融界向來和將來對本港經濟的巨大貢獻。事實上，施政報告把香港和紐約、倫敦相比，並以把香港的地位提升到與該兩城市相若作為我們的最終目標，是恰當不過的。我不避大言不慚之譏，敢說這目標是我們伸手可及的，不過代價總是要付出的。

要得到那樣的地位，我們一定要不怕改變，以確保我們的金融市場受到妥善規管、公開而且是公平。我們一定要不畏人言，或相反地，對批評充耳不聞；而且我們一定要追得上全球金融市場的發展。事實上，如果自信是正確的話，我們一定不可以怯於提出新的構思，一如我們的財政司司長最近在歐美推廣時那樣做。雖然目前日子尚淺，但各種跡象顯示世界金融市場將由一套新的秩序來規管。香港無疑是亞洲區內最有資格處於領導地位的金融市場。我支持財政司司長主催召開 G22 會議，和我們一起設法解決各種問題。主席，我們在追求那最終目標時，一定不可以忘記我們的市民必定要做好自己重要的本份。以金融業的本質來說，這行業是要求極高而且是競爭極大的；所以要有高度專業和熟練的從業員。在這方面，如果有必要更改政策或法例時，監管機構、市場參與者和各行專業人士可以而且應該要求政府助一臂之力。由政府牽頭的改變最要不得，因為這會引來政府干預之非議；尤有甚者，政府有時也會失誤，而我們的政府亦毫不例外。

主席，任何國際金融市場，如無債務市場，是難以維持其地位的。我促請政府運用說服力或透過其他種種辦法來加速這方面的進程。我們談論這個題目已有一段日子，香港按揭公司的成立就是朝這方向邁出的第一步；但我仍認為步伐太慢了。我們的金融市場一定要盡量向本地和外國投資者提供多樣化的選擇。主席，這目標不用經過甚麼策略思考過程，我們應該要做就去做。

主席，過去數個月來，物業價格暴跌，使到各方人等都呼籲推出措施，穩定市場。施政報告正回應了這些呼籲，為的不是，我要強調不是，要托住樓價或保住地產發展商，而是關注到倘若跌勢不止的話，便會危及銀行體系，到時人人受害。穩定的樓市對恢復信心至為重要，信心恢復過來，才會刺激本地消費。檢討房屋政策，亦屬合時。

主席，我說檢討房屋政策合時是因為時移勢易，但我們卻並無配合。最急需公屋的人要等六年半才可獲得分配住屋；而老人家的景況更甚，他們大多等不及便去世了。還有，我們有些人還住在籠屋或天台木屋；我們的市區重建策略又形同虛設，而且一些工業區早失其原來作用。

主席，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受資助的置業計劃。市場已對各種各樣鼓勵置業的計劃眼花瞭亂，並對政府在建造房屋方面所擔當的角色感到有些迷惑。有關的資助可能是建成的房屋或可能是給予貸款。不過鑑於對居者有其屋、私人參與計劃或夾心階層置業計劃之下各種公共房屋的諸多詬病，由落成所需時間，以至房屋品質欠佳等，那麼資助置業計劃與其用建成的房屋，為何不乾脆給予貸款呢？專注於這辦法，研究實施細節，包括過渡安排，會大為有效得多。

主席，每年本會議員都會提出有關開支和稅收的建議。過去由於本港經濟持續增長，我們的問題是怎樣去花錢、怎樣節制政府開源的意欲而已，所以做起來較為容易。可惜今年好景不再。或許這便是政府把明年財政預算有關我們增長趨勢的中期預測頗為樂觀地定在 4% 的理由。這樣一來，我們便垂手可得 68 億元的新錢，作為推行新增服務或改善已有服務的經費。不少議員對政府不放棄這個預測，詫異之餘，也大感欣慰；但我們這些大表懷疑的人，又有何足以欣慰之處？我希望政府不是由於它毫不起勁、甚或幾乎可說是象徵式地試圖在資源增值計劃下在三年半之內把生產力提高微不足道的 5%，才把這區區之數拋給我們，以免我們發出不滿之聲。我亦不希望這是一項交易，是財政司司長要在下一財政預算之中加稅和增加收入的前奏。

主席，本會中曾任議員不只一任的人都明白立法會一向不遺餘力，游說政府減少浪費、節省成本、刪除繁文縟節、整頓公務員體系或公共機構中架床重疊的臃腫架構，以及提高生產力和效率。現在是公務機關和資助機構迅速行動的時候了。但是，我們不應就此便停止。資源增值計劃應該推廣至非政府開支如市政總署、區域市政總署和房屋署等部門，它們的營運經費數在 200 億元以上。計劃亦應用於已成立營運基金的部門，這些部門的總營運開支亦達 40 億元。主席，我的名單中還有其他部門和機構。其中一個官僚習氣過重和過於架床疊屋的例子便是教育署，署內 7 000 員工之中，有 3 000 人是和直接學校工作無關的。此外，每年有 3 000 至 4 000 名公務員退休，這便是每年省回 15 億元的良機，這數目還未把間接費用計算在內。

主席，政府有個黃金機會可以重建市民的信心：它可以把生產力提高至 5% 以上，並對公營部門的運作模式作出大刀闊斧的反思，也好使我們驚喜一下。這兩項工作早該展開了。

主席，這一點把我帶到行政機關和本會關係的問題上。慣於冷嘲熱諷的人會問：關係？它們之間還存有甚麼關係？傳統上和根據《基本法》，香港有的是一個行政主導政府；但那是甚麼意思呢？誠然，各政策局的局長有甚麼新政策或要更改現有政策、或有立法建議，多少都會諮詢一下。不過，即使雙方誠意十足，難免仍會有些地方意見不一致。在這個制度之下，各局長有權、或亦有些責任承擔，但他們即使決定錯了，對他們卻幾乎全無後患；反之民選的立法機關卻要負責、面對選民；基本上在議會中有的只是否決權。這實在是導致雙方衝突的因素。我記得自由黨在 1994 年倡議實行部長制時，得不到支持。今天，支持部長制的有些還是高級公務員。不過，是否實行部長制，所有的問題便迎刃而解呢？當然不是，但卻可以大大有助於權和責之間得到較佳和較圓順的平衡。話雖如此，我仍認為，公道地說，諮詢制度其實已有改善，仍是有些作用的。在自由黨而言，我們會繼續爭取和行政機關改善關係，但倘認為行政機關犯錯，我們定會挺身起而批評，絕不會逃避責任。所以，我要重申自由黨有關兩個市政局的立場。政府只在施政報告中表明意向，未有向市民解釋整個計劃而便以市民支持來取消兩個市政局，此舉似乎有欠公平。只有大家都知道整個計劃之後，我們才可以評估市民是否仍然支持這建議。

最後我想就議員同事所提出的修正案說幾句話。首先，大家要明白，致謝議案，本質上只是一種禮節。議案本身全不觸及施政報告的內容。所以我認為沒有必要就議案提出修正案。如果議員要批評施政報告，大可在辯論中提出。如果有議員覺得施政報告全無可取之處，則可以投反對票，那便相等於投不信任票了。就一項禮節性質的議案提出修正案，既不必要，亦無理由。故此自由黨會支持原議案，反對所有修正案。

主席：劉千石議員。

劉千石議員：主席女士，

失業減薪威脅

最新公布的失業數字顯示，失業人口由 174 000 人增加至 181 000 人，以全港大約有 180 萬個家庭來計算，即平均 10 個家庭中便會有 1 個家庭有成員失業，可見情況已經極度嚴重！

今時今日，在失業危機的陰影下，“打工仔”同時面對減薪的威脅，導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不知道失業、減薪等厄運何時降臨在自己身上！現在幾乎每一天，我們工會都要處理工友投訴公司裁員、減薪、減花紅、減雙糧、要員工超時工作沒有“補水”等問題，可以說，失業、減薪已經成為威脅普羅市民生計的洪水猛獸！

有人說，最近股市、樓市轉好，經濟開始有起色，顯示市民的信心回升。我不明白是否股市升便顯示市民有信心，那股市跌是否表示市民沒有信心；那麼，有市民因為擔心供不起樓而“被迫”以跳樓來了結生命，那是表示有信心還是沒有信心呢？

行政長官言論鳴鑼

在昨天的辯論中，有同事提出自由市場論調，指出假如公眾相信自由經濟，便不應期望施政報告提出解決良方。我相信我無須再重複我對於政府角色的理解，但有一點是最清楚不過的，便是相對於其他政府官員來說，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是唯一一個人在過去一年多以來三番四次指香港是“高工資”的。即使我們不說董先生是近期“減薪風潮”的罪魁禍首，但我相信，他亦須為“減薪風潮”鳴鑼開道承擔一個責任。他指本港工人工資過高，認為應該調低工資以加強本港競爭力，已經是人所皆知的事，就連在今年 7 月香港回歸一周年紀念大會的發言中，他仍然再一次重提高工資的問題。

行政長官經常掛在口邊說本港的工資高，成為近期各間私人企業減薪的其中一個很好的藉口，它們以“提高生產力、加強競爭”為名，“混水摸魚”為實，在經濟低迷的時候“一刀切”減薪。行政長官在答問大會時表示，政府不應該干預私人市場的工資水平，但是他完全無清楚交代為何過去他一直認為香港“高工資”！

雖然行政長官沒有或不肯作出公開回應，但我很想清楚指出，香港一般工人的工資水平不但不是偏高，其實甚至可以說是偏低。與其他與香港發展程度相似的國家比較，以製造業的工資為例，香港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資大約是 973 美元，而同是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南韓及台灣則大約是每月 1,500 美元，全部都較香港為高。事實上，香港的工資高也有原因，主要是香港過去 10 年來的通脹長期處於高水平。假如扣除通脹以實質工資計算，香港製造業工人過去 5 年的實質工資事實上出現了 0.5% 的負增長，而同期亞洲各個經濟體系的製造業工人的實質工資則有正增長，其中南韓工人的實質工資增長更高達 7.1%。

試問行政長官憑甚麼說香港是“高工資”呢？

政府助紂為虐

行政長官“高工資”的言論燃點起減薪的火頭，現在“打工仔”已經到了水深火熱的地步，行政長官卻逃之夭夭，表示“政府不可以說香港是高工資抑或低工資的社會，而應讓市場自行平衡”。他可曾想過，小市民今時今日所面對的困難有多重？

雖然失業率是 5%，但正如我剛才所說，10 個家庭便有 1 個有成員失業，如果包括開工不足、減薪、扣花紅雙糧等情況，一個家庭可能遭遇到多重打擊：丈夫被裁員、妻子被迫減薪、兒子剛剛畢業卻又成為失業大軍的一員。中等入息家庭亦不好過，樓宇變成負資產、供樓利息高企、飯碗亦擔心不保。他們面對的生活壓力這麼沉重，政府又豈能袖手旁觀呢？

政府不肯立法保障工人，只是計劃發出無約束力的指引。我想問一問董先生：如果一間賺大錢的公司仍然堅持減員工薪金，政府究竟可以做甚麼？是不是任由工人被剝削？假如工友堅持不肯減薪，政府是否亦承認那些工友只得面對被裁員的命運？

政府只是不斷強調勞資協商，但是卻不正視勞資關係不對等的現實，更廢法剝奪本來“打工仔”擁有的集體談判權。政府甚至不可說只是袖手旁觀，根本便是助紂為虐！

行政長官可能真是對他過往“高工資”的言論“無悔”、對廢法的決定“無悔”；但是，這樣下去，所謂重建信心，是否只會適得其反，而行政長官與市民的鴻溝是否只會越來越大？

市民只是難題

主席女士，我亦想談一談施政報告的一個主題，有關所謂“羣策羣力”。

行政長官強調我們要羣策羣力，不過，他從來沒有想過與普羅市民一同“羣策羣力”，因為普羅市民對他來說，只是一個“問題”、一個“難題”，甚至有些時候會成為他的“包袱”。

正因為行政長官認為普羅市民是“問題”、是“難題”、是“包袱”，而不會認為市民是可以一同解決問題的夥伴，因此，“民主”成為洪水猛獸，“人民當家作主”便成為天方夜譚。為了解決他心目中的“難題”，行政長官的“羣策”拍檔就只是一些大財團、大商家、特定的專業人士，甚至是外國的大企業家和知名人士；隨之，各個不同大小的專責委員會相繼設立。目

的是甚麼？只是滿足這些“羣策者”的需要，滿足“拍檔”的需要。

不過，大家不妨想一想，那些大財團、大商家，甚至外國的企業家和知名人士，大多數是“有錢搵便來、有錢搵便走”的，他們大體上對香港缺乏一個非常明確的承擔。

高唱抗洪精神

當行政長官在讚嘆“抗洪精神”的時候，我亦同時看到另一幅圖畫，就是當洪水到來的時候，他自己與一些“羣策”的拍檔站在岸邊，不時流露出他們對民困的“憐憫”、“難過”；但是，在洪水下面便是“羣力”，由人民造成的“人肉沙包”，以“血肉長城”抗洪！

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是否值得香港人“感謝”，無論本會最終的表決結果是甚麼，我相信香港人已經心中有數！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李家祥議員。

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

經濟逆轉，政局穩定

自去年行政長官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以來，香港的經濟環境逆轉，樓市股市劇跌、市道低迷、失業率高企，令不少市民的生計直接受到影響。改變幅度之大，是大家當時都始料不及的。

不過，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過去的一年，本港的政治方面卻顯得穩定，社會言論、遊行示威等生活上自由方式比起回歸前毫不遜色，而本會更是以歷史性高票數產生。表面上，一切運作都顯得十分順利，令主權成功移交這個事實，在國際上得到進一步肯定，使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更為鞏固。

宣泄情緒，於事無補

不過，行政長官的第二份施政報告發表後，輿論差不多一面倒地予以抨擊，在某種程度上，亦引導了民意的傾向，尤其是市民現時面對着重重困境，對施政報告期望奇高，自然失望情緒便越大。施政報告暴露了政府的有限能力和創見，霎時便打開了羣眾宣泄情緒的缺口，更被政黨利用這便宜機會，以修正今次議案來賺取免費宣傳，趁機落井下石。一年前，大家亦可能猜不到，着重經濟、迴避政治議題的行政長官，到頭來竟是失足於經濟問題的處理上。

雖文過飾非，勿遇非而沮

政府雖錯在經常文過飾非，但現時市民的情緒已跌落到極度悲觀的深淵中。本會單靠煽情鞭撻，並不能幫助港人度過難關。莊子在《逍遙遊》篇曾說：“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事實上，香港仍具備各項優勢，因時度勢，港人應冷靜地分析得失，本會同事亦理應在政治上表現得克制務實一點，共議“轉危為機”之策。

勝在宏觀，敗於力微

相對於去年施政報告的宏圖大計，今年的施政報告只可以說是一個以“調整應變，穩定人心”為主調的平實報告。這主調在基本內容上，確實有其可取之處，尤其是在宏觀經濟環境上，對本地及外地的商界，都能達到政府傳遞一個很清楚的信息的目的，即全面重新修訂房屋政策、穩定樓價、力保港元匯價、營造利率下調的環境，以及意識到港元有可能隨美元的回軟而下調，再加上積極的基建投資、實行減稅措施，都為恢復中長期的投資信心，提供了最主要、最有效的根本條件。

施政報告中積極提倡加強內地合作的方向及扶助幾項最有條件的經濟活動，假以時日，可望成為地產、金融服務以外的主要經濟支柱，增加整體經濟的增長潛力及穩定性。雖然說不無風險，且極耗時間及資源，但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始終是一種頗為進取，而又不可再或缺的施政方針，本會應予高度肯定。

危中“見機”，施政報告在經濟範疇上或許是做到了，但如何掌握和接受這些未來經濟機會所帶來的挑戰呢？政府可採取的具體行動，又會否令人相信是有效，並可以做到真正的掌握契機呢？有機會、有崇高目標，不過，實際行動計劃卻定得太飄忽。這個差距，難免令市民覺得行政長官只是在搬弄“畫餅充飢”的技巧，實在有教市民“望梅止渴”之嫌，最終造成給反對派有政治“機”會，乘勢製造政府施政“危”機的錯覺。

陷於困境及信心薄弱的市民，除期望出現堅定有力、有創見的領導者外，更會抱着明知政府能力有限，但或許仍有一線創造奇蹟生機的僥倖心理。就如以往在信心逆境中，港府曾突然提出的新都會計劃、新機場計劃等一樣。當年政府更趁市民還在頭暈目眩之際，即時表現出無比的決心，閃電上馬，彷似魔術師從帽中突然變出自白兔般地令人精神一振。霍震霆議員還告訴我，在足球上，這做法可稱為“穩守突擊”。現時奇蹟計劃欠奉，市民甚至就迪士尼樂園這種另類中型計劃的發展機會，也不惜代價、高調地公開表示絕不放過。港人這種求“機”若渴，無論長遠的或短暫的，未獲滿足的熾熱心態，可說已表露無遺。

改墨守成規，勿守株待兔

除了有創見的目標外，作為帶領港人隊伍的官員主將，他們的士氣和工作態度亦非常重要。在順風順水之時，謹慎而不冒進，深思熟慮，是為官的金科玉律。在逆境之時，主動積極，身先士卒，分秒必爭，決心排難解憂，反會顯得特別可貴。我試舉一些例子作證：

(1) 加強競爭力，減低營商成本

政府本有計劃，由註冊公司開始到日常經營直至公司清盤等整個營商的新陳代謝過程，都能達到精簡法例和程序，以及增加服務外判的安排，以達致更高經濟效益、降低整體成本的目標。但自 8 個月前財政預算案發表之後，一系列有關的措施，仍只聞樓梯聲，實施工作進展緩慢，全部都未能及時出場，紓緩目前困境。

現時所見，新公司成立寥寥可數，另外數以千計的公司不斷倒閉，其中不知有多少事實上本來可在新例下仍然有一線生機的。清盤工作堆積如山，長期凍結的資產又不知凡幾，令人深感有關官員處事態度太過墨守成規，慢條斯理，不知人間何世！

(2) 爭取外商投資

除了在營造更佳競爭條件上，表現“牛步”外，政府在落實推廣吸引投資的整體策略上，亦欠缺真正的積極性。除了一些手板眼見的工夫，例如演講、展覽、宣傳資料外，官員似乎完全缺乏主動出擊的本能和條件。

試看看其他亞洲國家，不但會有策略地鎖定國際級的大公司作為推銷對象，更會出動最高層的官員，甚至包括正副總統或部長來作游說示好的工作。在談判條件時，又能作出富有彈性的稅務、批地等安排。有關政府除了擺出“萬事有商量”的姿勢外，又再派出專人提供貼身服務，幫助外資順利地辦妥所有程序上的瑣事。反觀香港式的推廣工作，相比之下，就彷如“守株待兔”。

(3) 爭取內地銷售市場

施政報告雖高談內地發展機會，但實際商討的成果只涉皮毛。

實際上，本港的經濟發展是受政治因素所限，只能向外出口，本身的內銷市場細小，不能帶動經濟的真正復甦，所以除了遠望歐美，被動地等待機會之外，別無良法。

不過，在 97 年回歸後，內地市場對港貨所實施的重重稅項和配額限制，理應有爭取逐步放寬的餘地。本港對內地產品是百分百開放的，若能讓港貨及服務亦能主動地爭取部分內地銷售市場，經濟復甦，即指日可待。對此現成又近在目前的契“機”，政府又可會大膽地以新思維方式來反覆探討思量呢？

應唯命是從，或以身試政

施政報告對不少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仍傾向迴避。行政長官的深藏不露，令人擔心現時表面上的穩定，究竟是否已生暗湧，而行政、立法兩議會和公務員隊伍的相互關係，是否正面臨重大的考驗。

一直以來，本人都以本港整體公務員隊伍一貫的高公信、高效率和緊密的團隊精神引以為傲，尤其是公務員事務局和庫務局今次不避艱巨，在要求公務員接受現實、面對薪酬福利的調整、精簡架構的衝擊上的決策方向，積極果斷，毫不含糊，充分體現出公務員系統中，仍有自律自強的一面，值得敬佩和支持。

然而，“愛之殷，責之切”，能讚亦能彈，只要個別官員有微少散漫和自滿，政治取態稍為偏離中立，我都必會覺得非提出警惕不可，不吐不快。

不少議員早已提到近期有個別官員的表現態度傲慢或行事方式獨斷獨行。這些行為並不符合作為受薪公務員的角色。是好是壞，博學或疏才，行政長官和本會議員在《基本法》規範之下，都是經過選舉產生的，表現不佳者，自有輿論和選民批評治理。反而公務員卻沒有同等的憲法授權，即使才高八斗，仍是直接或間接受聘於政府，制度上應安於本分，對行政長官可提供意見，但政策一有決定，便得唯命是從，謹守政治中介的角色，義無反顧地全力執行。其中的任務更包括須盡力向本會解說，協調應變，直至得到本會最少半數的議員支持為止。在現時政治意見紛紜，不同黨派林立之下，要達到這些目標，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是可能的。

管理不善，賞罰不分

原制度的構思，公務員若對行政長官的政策決定有不同的看法時，他們只有“領命”或“辭官”兩個選擇，並無堅持己見的餘地。當然，官員亦非完全沒有主動性，但卻非得行政長官認受不可。如果縱容官員陽奉陰違，是行政長官第一個層次上的管理錯誤；如果任由官員經常提交錯誤的政策或在執行政策時錯漏百出，而不賞罰分明，則是第二個層次上的管理錯誤。以上兩者，行政長官皆難辭其咎，必須負上政治責任。

偏離中立，自主政權

另一可能發生的情況，便是多名公務員都同時集體偏離政治中立，堅持本身制訂政策的權力。如果這種情況又得行政長官默許的話，便會變成制度上的根本轉變。屆時我們很多議員所倡議的部長制，要求有關官員承擔本身所訂政策的政治責任，便大有道理，否則，便變成官員有權無責，行政長官變成“預鑊老闆”。

現時不少議員、市民看到的是一個永遠“無出錯、無人管、無獎罰”的公務員制度。可以責怪的，一是行政長官管理無方，賞罰不明；二是個別官員本身偏離中立，自主政權，卻可將政治責任轉嫁給行政長官和整體公務員身上。其實兩者的說法，在本質上是很不相同的，這些只有行政長官才知道。如果行政長官認為是前者，便應立刻加強管理，跟政務司司長配合，約束官員行為，以正視聽；如果是後者，便應考慮體系的更變，以政治委任予主導政策者，親自令其“以身試政”，分權亦要分責，以確保整個大局的穩定。

行政長官亦曾對行政、立法議會關係趨向緊張而表示關注，但卻似乎未明箇中理由。部分議員的過分刁難，固然是其中原因，但行政長官與官員處事作風若只是意見廣聽，到頭來卻是“眾人皆錯我獨醒”，即使有與政府相同的意見，也只屬巧合。這種行政主導的方式，能不讓與政府“羣策羣力”、共謀對策的人士心灰意冷嗎？政治公關其實易為，不用甚麼高官能人。我記得從前有些官場高手，明明是自己的意見，也經常說成了是聽了他人提供意見的結果，將功勞歸於別人，令與之合作者心悅誠服。將這技巧應用在要靠選舉生存的政界，更萬試萬靈，反之，必舉步為艱。

題目眾多，難以聚焦

除了評論政治、經濟外，施政報告內的議題眾多，難以聚焦，我只會在青年事務和綜援問題上稍作回應。

青年事務發展的方向，各方人士都喜獲政府重視及真正落實資源分配，採取全盤有效計劃而又付諸行動。有議員曾質疑政府委員會的有效性。若以青年事務委員會這一年來和其他與青年事務有關的重要諮詢委員會、青年團體、政府各方的協調配合，創造出各方都高度認同的成績，便不應再有疑問，委員會是可以做出成績的。我亦相信，在這方面，政府應該可以大膽用人，起用一些如本會議員或跟政府有其他意見的領袖作為工作上的夥伴，一方面可以令我們更瞭解和體諒政府內部的運作情況，另一方面亦可以得出很好的效果。

在施政報告發表後，我亦有機會出席一些青年人的論壇。青年人雖然認同政府在青年發展方面的工作，但卻更關心切身的教育及失業問題，而且不滿情緒極高。我覺得這是值得政府重視、着手瞭解及疏導的，青年事務委員會在這方面亦樂意盡力配合。

在綜援檢討方面，我只想奉勸政府一句：“切勿憑空開亂炮，目標不分，勢大效小。”綜援申請當然會有濫用情況，但真正無良的懶人必定是極少數，真正涉及濫發的款項其實亦相當有限。如果借勢趁機對十多萬正在接受綜援的人士威嚇削減，又拿不出實質提議，這只會造成社會不安、政府無良的感覺。政府實在應多做少說，甚至以不說為妙。社會人士對實際情況應已相當瞭解。綜援是有檢討的餘地，但實事求是的討論效果，可能會比政府高調地將事件政治化更好。

羣策羣力，無須異議

“轉危為機”可在經濟、政治上有不同演繹。行政長官勇於創造未來的經濟機會，但卻被本會批評是忽略了已迫到眼前的政治危機。不同出發點，但各有道理。

不過，對於“羣策羣力”，卻再不應各有異議。政府解決當前問題的力微，已未能為盼顧目前的市民帶來驚喜。如果在今次的議案辯論上又演變成各自為政、各自表演，四大皆空，本會比政府在處理這問題上的表現又好多少呢？“羣策羣力”須有為大局着想的氣量。現時本港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遷怒泄憤行為，還望本會同事多拿出有遠見的建議，保持自尊的行為，放棄歧見，不再巧立名目。

我謹此陳辭，支持梁智鴻議員的原議案。

主席：李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對於我們目前所處的情況，在行政長官剛發表的施政報告裏有這樣的描述：“綜觀內外，香港正面對不少轉變。這些轉變或會帶來不安與困難，但也會帶來新思維、新機會。”。但是香港市民怎樣從困局中把握新機會，創造更美好的將來？我們也期望在以“羣策羣力、轉危為機”為標題的施政報告中找到。本人現嘗試就以下方面探討施政報告內容。

工業發展

施政報告作出了相當積極的建議，例如設立應用科技研究院及撥款 50 億元成立科技研究基金，推動這方面的發展，同時亦鼓勵利用內地與香港的各自優勢，加強在工業發展的相互合作。其實，本人今年 4 月在北京主持一個內地與香港怎樣將高新科技產業化的研討會，就有關的合作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由於內地與香港在科研成果商品化方面的合作潛力很大，本人在會後也向行政長官提出建議。本人深信香港的工業、融資、專業人才和國際經驗，正好配合內地眾多的科技人才和豐富的科技成果。對於政府能夠重視這方面的合作，本人表示歡迎，但亦希望政府盡快訂定一套完整的工業政策，對本港高等學府的優良人才和設備，應該盡量加以利用，以加速創新科技的發展，也同時提高我們的生產力和增強競爭力。

中小型企業

為了提高我們的競爭力，香港亦應該盡力協助中小型企業的發展。中小型企業一向都是香港經濟的骨幹。這些公司除了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外，它們較小的規模及簡單的架構亦容許它們對市場作出快速的反應，而它們的僱員人數亦佔了全港工作人口的三分之二。當一些賺錢的大機構繼續進行重整架構和精簡人手的時候，許多人都不瞭解到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反而可以創造大量新的就業機會。事實上，過往一些西方國家曾相當依賴大企業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也漸漸明白中小型企業的潛力，相繼積極鼓勵這方面的發展。在協助中小型企業方面，特區政府確實採取了一些積極的措施。除了較早前批出的 50 億元中小型特別信貸計劃外，施政報告提出的建議包括在工業署內設立中小型企業服務中心，也是值得讚賞的。這些政策都是朝着正確的方向，但本人認為還要增加對中小型企業的支援。因為這些企業在推動我們未來的經濟發展及創造就業方面，必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基礎建設

特區政府在未來 5 年將會動用 2,350 億元興建西鐵第一期工程、地鐵將軍澳支線、馬鞍山鐵路、上水至落馬洲延綫，以及多條特區內部的公路幹線，本人十分歡迎。這些項目的興建，確保香港交通運輸系統能夠配合日後經濟發展和滿足人口繼續增長的需要，也提供大量職位，對紓緩目前的經濟困境將會起積極的作用。可是，施政報告卻沒有為日益增加的內地與香港交通銜接問題，提出足夠和有效的解決方案，甚至連討論多時的蛇口至元朗、珠海

至屯門等跨境公路橋樑配套計劃，也隻字不提。不知是否因為經濟放緩的原因，極具潛力的北大嶼山土地發展計劃，亦沒有包括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內。其實，本人去年已提出開拓北大嶼山以容納 100 萬人口的計劃。當時，甚至引起英國兩個電視台的關注，分別不只一次邀請本人在大嶼山現場做節目，向他們的英國觀眾作出介紹。

報告中提出的交通運輸項目及策略性排污計劃的深層隧道工程，都是繼機場核心工程以後的具世界級規模、高做價的大型基建工程。特區政府應以機場計劃失誤引以為鑑，加強政府的監管，尤其是工程項目管理及招標的程序安排，更須提高透明度，重用熟悉本地環境和需要的本地專才，並且確保本地工程界獲得有關的技術轉移及接受培訓的機會。只有通過這樣的安排，才可以增強本地工程界在國際間的競爭能力，實現向外輸出工程技術及工程項目管理的良好理念。政府不要再搬出已簽署了的世貿組織的政府採購協議作為藉口，因為它是不包括專業服務的。

為達致這個目標，我們建議特區政府在政策上、制度上及投標程序上保障以本地資本為主的公司。在訓練人才方面，應在工程合約訂明優先聘用本地人才及本地工程系畢業生。此外，特區政府亦須謹慎安排各大型基建項目的時間表，俾能在一段長時間內，均衡地推出各工程項目，配合本地的人力資源及其他資源的提供，避免弄致一時工程太多、一時工程太少的“水喉開關”模式。這將有助達致平穩的工程進度及工程價格。

在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亦特別提及有足夠資源積極進行有關的道路及鐵路項目。雖然本人並不懷疑政府的決心，但卻不敢肯定政府是否真正能夠完成這 5 年基建目標。本人認為政府必須多些鼓勵私人機構參與，例如可以利用“設計和建造”(Design and Build)及“建造、營運及轉移”(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B.O.T.)的方法。這樣的安排既可減少政府在財政上的負擔，並且可加快完成工程項目的時間，以配合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以及製造就業機會，但政府必須同時負責監察工程的質素。事實上，大型工程項目動輒用上 10 至 12 年才完成實在不足為奇。本人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深入研究將來工程項目利用上述安排的可行性。

環境保護

在環保工程方面，行政長官提到海水質素、空氣質素和垃圾處理。本人認為方向是正確的，可惜在某些範疇上，在策略及方法方面，卻有些錯誤的地方。因此，過去已花了大量資源，但成效還是不大，我們要反省是否有許多本地因素沒有被詳細及適當地加以考慮。因此，我們明顯地得到一個結論，便是必須盡量利用本地專業人才來解決這些重要的本地問題。

資訊科技

二十一世紀將是資訊年代，資訊科技勢必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特區政府對於這方面發展的重視是絕對正確的。特區政府除在學校及高等教育學府加強資訊科技教育之餘，亦須照顧在職人士及畢業生，向他們提供各方面的協助，例如提供深造課程。此外，在其他層面上，由貿易以至城市規劃，必須配合資訊科技的發展，以及研究把有關技術及概念引發及應用，令香港由電子貿易以至智能城市的發展能與先進國家看齊。

由於科技發展既快速，又越來越專業化，特區政府在政策的釐定及執行方面，必須多由具有資訊科技專業知識及經驗的專業人士領導和擔任。

立法與行政關係，決策官員任命體制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並沒有深入探討立法與行政關係。他亦沒有提出創新和積極的意見，只輕描淡寫地說要互信和多溝通，完全忽略問題的迫切性，這是令人關注的。

為加強對市民及立法會問責，本人認為負責決策局的領導官員不應該隸屬於公務員隊伍。行政長官應該任命有才幹又認同行政長官的施政理念的公眾人士，亦包括現任公務員。當然，該等官員必須為其施行的政策負責。另一方面，這樣的安排亦可確保具備相關專業知識的人士出掌決策職位，達致內行人領導內行，而不須從現任政務官隊伍中按部提升。在制訂政策時，有關官員越來越須具備有關範疇的專業知識，以應付越趨複雜的社會及經濟問題，否則，最後便很難向市民作詳細交代。

總結

無可否認，1998 年的施政報告為我們定出未來發展的方向。不過，對現時的失業人士來說，報告書內的建議與他們並無切身的關係。施政報告亦沒有說出怎樣“轉危為機”。他們唯一的安慰是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對他們的鼓勵：“要對自己有信心”，可是，要這些可能從來沒有經歷過失業之苦的人接受這樣的勉勵，並不容易。

本人絕對同意行政長官所說，解決經濟及失業問題的措施，不可能亦不應該一次過同時列入施政報告內。施政報告也列出特區政府過去在本港所採取的多項措施，以紓解民困，本人希望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繼續努力。更重要的是，要令處於困境的市民知道，政府是真正明白他們的處境，讓大家一起“羣策羣力、轉危為機”。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梁智鴻議員提出的致謝議案。謝謝。

主席：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李卓人、李柱銘及陸恭蕙 3 位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我們前綫提出表示遺憾的修正案，因為我們覺得行政長官這份施政報告並沒有真正回應社會人士在很多方面的要求及憂慮。我們也知道這項修正案未必獲得通過。現時很多報道都認為不單止這項修正案不能獲得通過，可能 3 項也不獲通過，甚至連梁智鴻議員那項原議案也不獲通過，變成四大皆空。這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投票機制又再次發揮它的力量。當然，當時制定《基本法》的人不會想到有這種情況出現，但看來現時可能會有這種情況出現了。

有些人會說為何立法會這樣怪，又或說為何會分化得那樣厲害。主席，我不想說也真的要說，這可能又是關乎我們的選舉產生方式。我有理由相信，如果我們 60 位議員都是由直選產生，李卓人議員那項修正案便會獲得通過。主席，為何我會這樣說呢？其實，各位官員也可以撫心自問，現時市民對政府的施政有何想法。姑勿論是由於外圍因素影響，抑或是我們內部的錯失，整體來說，市民怎樣評價政府的施政呢？我相信無須我們在這裏說，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民意調查的結果。因此，主席，當行政長官到北京述職時，一個又一個領導人讚賞他，高度評價他的政績，令我們感到很詫異。我們有時候會想，領導人能否聽到香港市民的想法；又有多少敢說出真心話的人可以到北京親自向領導人說呢？我們真的很懷疑。我們希望領導人真的有雅量，可以容許在各方面有不同意見的人有機會向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當然，主席，我們不是邀請北京干預，但是我們希望北京的領導人在稱讚我們的行政機關、行政長官及其他官員時，充分掌握資料，以及知道各方面的市民的想法後才稱讚，否則，別人會覺得為何北京的領導人的想法與香港數百萬人的想法有這樣大的鴻溝？領導人是否被人誤導？抑或有些事他們完全不想理會，你們香港人要的，他們便反對？這樣對我們特區與中央的關係，是完全沒有好處的。

主席，我當然會談論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問題。這兩天，有些同事說不要提這些問題，因為現時市民最着緊的只是經濟問題。我覺得這真是荒謬。我覺得市民對各種問題都着緊。不過，如果有些人，包括在這個會議廳內的一些人，把民主、人權、自由和法治當作是毒藥，又或是票房毒藥，不想談論的話，市民自然很難再能聽得多些這方面的意見。不過，我們身為民選的議員，有責任討論這些問題，無論別人是否喜歡聽，我們有機會時一定會討論。

主席，有關民主這問題，我在這會議廳內已多次指出，我們很希望有一個民選的政府。我們 6 位議員在上月 15 日與董建華先生會面。我們 6 個人是來自 4 個團體的，一同見了董先生 40 分鐘。我們跟他說民主，他說為免令我們在 10 月 7 日失望，所以先在那時對我們說在民主方面沒有商量。我們覺得既然曾有百多萬市民在上次選舉中投票，相信市民的訴求已是很清楚的，是否行政長官只說一句，為免令我們在 10 月 7 日失望，所以先跟我們說沒有商量，就這樣便要了我們？他真的這樣做。主席，我們是不會放棄的，只要我一天在這裏，我仍會繼續說出我的意見。我們不是說要推翻政府、搞革命，但只要我們覺得是正確的，我們便會據理力爭。我們希望行政機關能回心轉意，這當然也包括高級的官員在內，因為他們是很有影響力的。他們不應只顧自己管轄範圍內的事情；如果他們真的想香港好，認為香港應該有民主法治，我希望他們在內部開會時也提出來討論。

此外，有關人權方面，主席，很多人都說香港很好，在中共接管後完全沒有問題，沒有人被捕，這是真的。有些時候，當我們示威時，警察可能較為粗暴，這是有問題的。不過，大家有否想過為何會這樣？這是因為社會越來越靜。我最近曾與一些學術界人士傾談，他們說他們現在全不表示意見，因為這樣可能會出事。這些人也懶得嘗試看看會否出事，因為他們如果這樣做可能會被調職、降級，甚或革職。他們懶得表示意見，這是所謂“識做”。我們香港人這麼多年來都很“識做”，那個人有財、有勢、有權，我們便向他膜拜，因為這樣做對自己一定會有益處，在政治上可以踏上青雲路。不過，如果所有香港人都那麼“識做”的話，這個社會便會變成一個很可悲的社會。我完全不相信有一個社會可以完全沒有相反聲音的，這是沒有可能的。我們希望在不同意見發表後，可以有一個有秩序的方式加以解決。現在的情況如何呢？我們的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和商界人士絕大部分都不表示意見了。試看看各項民意調查的結果，其中顯示出市民並不太高興，有很多心事。他們會打電話到電台節目說出他們的意見，因這樣做別人不知道他們是誰，只聽到他們的聲音。如果要他們站出來表示自己的意見，讓傳媒報道，你們

可以問一問傳媒有多少人願意說出自己的意見。只有我們這些“爛頭卒”、民主派的人才會說出，但說出了又怎樣呢？很多時候傳媒根本不會報道。如果是這樣，何用警察把人拘捕呢？根本沒有人會報道，我們這些傻人只是“講人自講”。在這情況下，我相信我們在人權自由方面的發展也是絕對不會令人樂觀的。

在這方面，我認為政府可以做些工夫。現時民政事務局每年都會撰寫多份報告，提交聯合國各個有關組織。由於那些報告涉及很多政府部門，我們希望該局有一項新責任，便是看看他們有否遵守那些國際人權公約，而不是只是搬字過紙。他們應該負起這個責任，不應只是擔當信差的角色。此外，我們希望司法機構和執法的官員在人權法方面能有多些訓練，有多些關於國際人權公約在其他國家的法庭如何實施，以及人權委員會有關事宜的資料。我知道他們是下過工夫的，我希望有關的政府官員在作出回應時，能告知我們他們做了多少工夫，以及他們是否有一個很大的圖書館，可以獲得很多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在人權方面，我認為政府最少要做到這些事。

主席，至於法治方面，昨天吳靄儀議員已經說得非常好，我很同意她的看法，所以我不會重複。政府決定不控告胡仙女士及新華社這兩件事，我相信本會是會繼續跟進的。這些事件發出了一個令人很擔心的信息，便是是否在法律面前，並非人人平等。這兩件事至今仍未了結，因為有關案件仍在審理。不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是說最近在律政司內，會委任一名很高級的官員，即法律政策專員的問題。主席，我不是政治歧視，但如果一個接一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擔任我們政府的高層職位，實在令我有些擔心。事實上，中央領導人也不贊成本港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香港的政壇活躍，所以，他們說要搞辦事處也不大成事。中央其實很明白，因為知道他們的身份是在國內從政，是代表香港到國內去；但拿着這個身份擔任我們行政機關內的高層職位則是兩回事。雖然有人說這並不重要，只要在出任政府職位時辭去那些職務便可。不過，這樣如何可以說服我們六百多萬市民，說不用擔心，他擔任這職位時是很獨立、很大公無私的呢？梁愛詩女士以前是人大代表，我對這已有意見，現在類似情況可能又再出現，而且又是在律政司內。最重要的是，這個部門是協助行政機關處理法治的問題。部門內有這些人，實在令我很擔心。

當然，有些人會對我說，劉慧卿，現在是中國管治香港，是中國共產黨管治整個香港。不過，我們以為香港是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我們覺得，最低限度，不要讓那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湧入我們的行政機關。事實上，我們也不知道有多少是共產黨黨員。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又怎可以說服我們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其實翻遍所有文件，也找不

到何謂“高度自治”的解釋，這只是一個口號而已。有關委任這名官員的問題，我們可能已說得太遲，因為我相信已經作出了決定。不過，我希望行政機關知道市民的想法，即在挑選最高級的政府官員時，很重要的是，他們不會有強烈的內地政治背景。

此外，主席，今天當然一定要提的是經濟問題，很多同事也談到這方面的事情。今次市民很失望，說政府在經濟方面沒有做過很多工夫。財政司司長數天甫下飛機，便馬上告知我們，說在經濟發展的隧道中看到曙光。我們當然希望他所說的是正確的，但亞洲金融風暴開始出現時，他說情況在聖誕節便會好轉，所以我不知道我們對他應否仍具信心。其實官員作甚麼預測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那些預測是建基於事實，所以，我們很希望曾蔭權先生在 11 月初作出回應時，能告知我們是基於甚麼數據、甚麼事實來說在這隧道看到曙光；是否投資增加，抑或各方面的購買力、廠房、設備的數字全都增加，令我們知道我們會走出谷底？主席，其實大家都很擔心。我也曾與周德熙先生提過，我們在工業方面是否可以做得多些，令我們的競爭力加強，不會有那麼多人失業，因為失業問題是很重要的。我們明白，政府一向都說在很多事情上不會作出干預，不會給予資助，但如果我們要與其他國家競爭，我們在這方面可以怎樣做，我們希望各位局長想一想。長遠的高科技發展當然是好，但在短期和中期，我們怎樣告訴越來越多的失業人士，即使他們接受數個月的培訓後也不會找到工作；我們在增強競爭力方面完全束手無策；而且也不會做到甚麼來吸引本地及外國的投資者？主席，在這些方面，我們希望官員能做到一些事。

最後，我想說一說公務員的問題。主席，對於行政長官提出要公務員的生產力增加 5% 這建議，我是非常支持的，而且我覺得是絕對可以做到的。我覺得在公務員隊伍內，仍然有些尸位素餐的人，所以我十分支持政府嚴厲對付那些人。我也希望政府不要不斷增加職位。政府即將成立一個新的局，負責衛生事宜，該局的主管人員職級已經訂為 D8。現時在行政長官辦公室新開設的新聞統籌專員職位，又有傳聞可能屬 D8 職級。真奇怪！人選已定，是林瑞麟先生，但職級、職能等仍未決定。相信林煥光先生日後要向我們解釋，為何這事會這樣奇怪。我不反對開設這個職位，因為以前的總督也有這個職位，但當時擔任這職位的官員屬 D4 職級，現在無理由跳升至 D8。我們希望有關人士能解釋，為何會這樣怪，在選定了人選後，他才度身訂造自己的職能和職級。我認為這是不可以接受的。現時普羅市民都要勒緊肚皮，我們希望公務員明白到要與市民一起共度時艱，所以，除了要去掉公務員隊伍的肥膏外，也不要胡亂開設新職位。

我謹此陳辭。

主席：陳榮燦議員。

陳榮燦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第二份施政報告，在多個月來，廣泛收集了香港市民，包括各政黨、工會團體、社團組織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施政報告 10 月 7 日公布，在 9 月下旬還有工會團體向行政長官反映意見。我感覺到工會團體的意見，在施政報告中也顯示了出來。這份施政報告可以說是行政長官及其寫作班子“絞盡腦汁、挑燈夜戰”來完成的作品。

行政長官最近赴北京述職，受到國家中央領導人公開大讚之餘，希望董先生夫婦利用短暫的假期，好好享受一下真正的私人生活，休息一下，養足精神，回港主持政務。謹祝兩位旅途愉快。這可表示議員也有些中國傳統的人情味。

施政報告發表之後，社會上有讚有彈，包括在座立法會議員，昨天有整整 30 位議員的發言中表達出來。本人也曾指出，這份施政報告“前景可觀，近憂未決”。

我們指的“近憂未決”，當然是大家特別是打工仔女最關心的解決失業、減薪等就業問題。工聯會前幾天公布今年首 9 個月有關減薪減福利的投訴便超逾 800 宗。其中以投訴僱主減薪、扣薪及欠薪佔最多，單欠薪、減薪項目即共有 578 宗，佔整體投訴的 60%。

在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廣大打工仔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處於被動的位置。在裁員、減薪減福利方面，酒店飲食、零售百貨業是重災區。工會收到的個案非常多，本人在此呼籲僱主立即停止種種損害工人利益的事情和行為，如果勞資關係進一步惡化，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勞工處現正草擬“僱員權益指引”（“指引”），但尚未公布，其效用如何目前還未知。我們曾就這問題在立法會作出討論，不過，我亦建議政府吸納工聯會最近提出的“僱主就減薪簽署承諾書”（“承諾書”）跟指引一併推行，讓僱員縱使同意減薪亦獲得一定保障，同時增加彼此的互信。

承諾書很簡單，只有兩點：(1)公司保證如日後公司遣散或解僱員工時，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等工人權益，按減薪前的工資計算。(2)公司承諾日後業務狀況獲得改善時，恢復員工原有的工資和福利。上述建議只是權宜之計，最終還是通過立法，才能真正保護工人權益。

(一) 再就業支援計劃

在目前香港經濟環境及營商環境極不理想的情況下，一下子要全部解決失業問題，是有一定的困難；但對失了業的一大羣人士，政府應該想多些辦法去幫助和關心他們，特別是解決他們失業後所遇到的經濟困難。

工聯會一向主張政府應積極協助失業人士，並為此建議政府成立“再就業支援計劃”。“再就業支援計劃”具有“失業援助金”的性質，正正可以幫助目前的失業人士。該計劃的具體內容是：(1)為失業人士提供緊急經濟援助，協助失業人士暫緩燃眉之急；(2)同時提供配套的再培訓課程，以便失業人士學習新技能，提高轉業條件，待經濟復甦時有用武之地；(3)培訓之餘並義務地參與社區服務，讓他們保持社會上的角色，提升自信心；(4)加強“就業選配服務”，協助失業人士尋找工作等。

“再就業支援計劃”與綜援是互不相同的計劃。“再就業支援計劃”向失業人士提供的不僅是經濟援助，還加強他們重投市場的條件，包括技能再培訓、心理輔導以及提高社會參與角色等配套支援服務。該計劃對幫助低技術、低文化水平的人士會有一定的幫助。

(二) 老人福利

施政報告對老人服務方面也較少支援。與去年的首份施政報告相比，今年關於照顧老人部分的篇幅明顯減少。例如，施政報告提出增加 15 支家務助理隊，與現時估計短缺的 60 隊仍有很大的距離，以及資助宿位等，根本無法解決實際的需要。政府應加強社區支援，使暫時未入住老人院的長者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社區照顧，同時並為將來人口老化做好未雨綢繆。

(三) 環境

施政報告提出改善環境，提高市民的生活質素，值得歡迎。但對於目前本港的環境質素日漸惡化，空氣質素日差，施政報告缺少實質性的改善措施。希望政府正視問題。施政報告指出，政府打算在未來 5 年動用 120 億元改善污水處理系統，包括增建深層管道，把港島區排出的污水送到昂船洲處理。

我認為政府提議的集中式污水處理方案是可行的，不過，從長遠改善水質方面來看，政府應該將污水作二級處理，同時排污口必須要在本港水域，以免影響內地水域的水質。

政府不久前公布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第二期的環境評估的報告，提出 4 個方案作公開諮詢。4 個方案都耗資上百億元，加上營運費高昂，政府預計排污費在將來會倍數遞增，如果政府仍維持現行的“污染者自付”的收費模式，一成不變對市民、飲食業、工商業，尤其是用水多的行業來說，將是沉重的負擔。政府應對市民定下減收排污費措施，減輕市民負擔，共同搞好海港水質、改善環境。

主席，說回施政報告。亞洲金融風暴引發香港整個泡沫經濟爆破，加上國際金融大鱷狙擊，使香港經濟元氣大傷，在百業經營困難，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有人說今次的施政報告很難寫，我也同意是很難寫的。

施政報告發表之前，有人把施政報告的內容比喻為花轎裏的新娘。猜測新娘是醜還是美，結果這個從花轎裏走出來的新娘，跟聰明的預測者估計一樣，並非貌美如花。雖然她不算很美，但這位新娘看來也樸實無華，頗為端莊賢淑，有內在美，說不定是否算“好生養”，但懷孕產子是日後的事，暫且按下不表。事前可以預測得那麼準確，是因為大家都掌握了一點，就是俗語說“又要新婦靚，又要利是平”，世間上沒有那麼便宜的事。主席，如果有，可算是你幸運，或是“姻緣注定”。

主席，本人無意大讚新娘，相反，如果政府將樸實無華的新娘刻意塗脂抹粉，塗上多些胭脂水粉，打扮得花姿招展，恐怕過得三朝兩日，回復本來面目的時候，新郎哥必定大叫“貨不對辦”，反而不美。希望這位新婦，遇到好婆婆，雙方和睦相處，羣策羣力，做好家務，所謂“家和萬事興”。

社會人士指出，施政報告整體上可算務實，並沒有譁眾取寵。政府肯面對現實，承認失業率仍會上升，這是施政報告所說的。我認為單從這一點來看，政府已開始有危機感。當然，政府如何處理和解決危機，才是廣大市民及打工仔所希望見到的 — 容許我套用行政長官的一句話：“我們應該做得更好！”（“我們”是指政府）。

有學者指出，施政報告具體分析了香港的相對優勢，並提出政府如何可以協助發展這些優勢；又指出與過去的施政報告比較，今年的施政報告，無疑頗具前瞻性和策略性。

工聯會對今次的施政報告也作出以下的評論：施政報告客觀分析了香港目前所處困難的原因，同時提出了解決困難的措施，展示了香港未來的前景。它是一份切合實際、目標清晰、方向明確的施政報告，反映出特區政府對香港市民的高度責任感和長遠眼光。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梁智鴻議員的致謝議案。謝謝主席。

主席：李永達議員。

李永達議員：主席女士，過去 1 年，香港經歷政治、經濟急劇變化。香港回歸祖國，洗脫殖民地耻辱，但卻未能實行全面民主制度，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為空話。

一年以來，行政長官董建華的任命帶給市民短暫期望，但這個蜜月期很快結束。董建華的治港策略及方式屢屢受到市民質疑，這不單止是因為董建華並非由市民普選產生，更重要的是行政長官董建華不能建立一套既能顧及社會長遠發展策略又能及時解決社會短期危機的方法，而且在施政決策中，每每優柔寡斷，進退失據。和殖民地時代的總督比較，行政長官董建華表現得封閉，遠離民眾，未能建立一個具透明度及向公眾負責任的政府，更遑論能建立管治威信，帶領市民共度艱困。

施政報告中有關民主發展的問題令人極之失望，除了舊調重彈，重申特區民主發展要符合《基本法》的蝸牛步伐外，更迴避了港人要求更大民主發展的訴求。

特區政府為了進一步扼殺民主發展，中央集權，以禽流感事件為借口，決意取消兩個市政局，在整個民意諮詢過程中，政府一直玩弄數字，失信於民。我同意兩個市政局在工作方面仍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尤其是財政監督方面。但我不能想象一個不受民選議員密切監督的中央集權決策局，怎能做到既有透明度高又向公眾負責。政府強調收權後效率會大大提高，除了這空頭支票能否兌現成疑問外，假效率之名扼殺民主參與，忽視民主參與可達到公開及負責任的政策，反映出政府的短視。更令人擔心的是，文化政策事務中，中央政府統籌管轄對創作自由造成威脅。市民不應獨立討論殺局事件，因為新立法會上任後，政府已透過多宗事件，例如挑戰立法會《議事規則》、《假期條例》等，顯示其有一再向民選議會收權的傾向。“殺局”，只會扼殺民主參與、減低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及向公眾負責任，與向民選立法會收權

同出一轍。政制事務局最近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簡布，指“殺局”共涉及超過 150 條主體及附屬法例。這龐大的法例審議過程要在少於 1 年內完成，這不是迫立法會做橡皮圖章，又是甚麼？政府現時將諮詢民意，聘請前政府高官做專家報告、草擬法例一併進行“快馬加鞭”的做法，究竟有甚麼目的？

政府是否擔心下一屆立法會有更多直選議員時，這些民主倒退建議便更難獲得通過？最近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以“減差餉”這種利誘方法爭取市民贊成殺局，是一種低劣手段，更侮辱了廣大市民及立法會同事的智慧。民主黨的立場是無論是否有兩個市政局，差餉負擔都應削減。

現在，我轉談有關特區政府過去 1 年的土地房屋政策。“政策搖擺不定、維護大地產商權益，忽視中下階層的房屋需要”是過去 1 年來房屋政策的最佳寫照。去年，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大量增加土地供應，並以每年興建不少於 85 000 個單位為目標，來遏抑樓價及提供市民所需的房屋單位。今年在經濟調整期間，受到大地產商的壓力，便以停止賣地、托市去挽救樓市、挽救地產商，這種“一時 85 000 平抑樓價、一時停止賣地托市”的手法令物業市場產生大混亂。

停止賣地其實並不能改變樓價因“泡沫”經濟爆破而繼續下調的趨勢，反而令政府財政收入大幅減少，估計每年收入的減少會在 300 億至 500 億之間，與建築行業有關的專業人士及工人失業人數會上升，以及 3 年後私人樓宇供應會出現斷層等嚴重後遺症。屆時因供應減少而物業價格可能會再度上升，行政長官董建華是否又“打倒今日的他”，提出增加住宅供應或再次提出打擊炒樓措施。況且，對於一些中小型或沒有土地儲備的地產商，地價下調便是他們有入市投資的機會，停止賣地便是政府人為製造市場障礙，令市場不能在公平競爭下運作。為了穩定長遠房屋供應及政府的財政收入，政府應在明年 4 月恢復賣地，當土地供應繼續穩定，私人物業價格因供應充足而趨向平穩，不會反覆上下波動，令一般夾心階層有信心負擔私人樓宇時，才是適當停止夾心階層建屋計劃的時機。

對於施政報告中提出以貸款代替居屋的建議，民主黨不能同意。居屋作為公營出售單位，有調節住宅單位供應及私人樓宇價格的作用。再者，居屋白表申請人實際上平均家庭入息約為 2 萬元，雖然其入息限額是 33,000 元，但是平均入息只得 2 萬元。大部分仍不能夠負擔現時 150 萬元或以上的一般私人住宅價格，居屋對這些月入近萬多二萬元的家庭來說，仍然是置業的唯一出路。居屋出售亦為房委會帶來每年近 200 億元以上的盈餘，作為推展出租單位興建房屋計劃，所以當地產商或某些政黨人士大喊停建居屋時，他們要一併考慮房委會建屋的財政來源。一廂情願希望現時財政緊絀的政府和財政司司長可以向房委會直接或間接注資，是不切實際的。

施政報告中最令人失望的是有關加快輪候上樓的時間，居民上樓的速度仍然太慢。現時的平均輪候時間為六年半，要在 7 年後，即是 2005 年，才可縮短為 3 年。現時因停止賣地及停建夾屋，有部分土地可以適合撥作興建出租單位，所以，爭取令輪候時間提早到 2002 年達到 3 年的目標是可以辦到的。政府若接納民主黨的意見，我相信很多基層市民必會拍手稱讚。

去年，施政報告中提出 10 年內應有七成置業的目標，我認為應該放棄。因為政府只應扮演提供土地、基建及公營住宅單位的角色，至於市民是以租還是買的形式來解決居住問題，應由市民按自己的負擔能力及其他因素綜合來決定。七成置業率會使房屋政策不合理地偏袒某些人，致令政府資助人買豪宅而不資助籠屋居民等畸形社會現象出現。

談到房屋需要，政府不應忽視籠屋居民的住屋問題。上星期，立法會一致通過民主黨劉千石議員的議案，要求政府全面安置籠屋居民及在一段時間內取消所有籠屋。我希望政府不會再迴避各政黨及議員的要求。舊調重彈是不能解決這個緊迫的住屋問題。

《床位寓所條例》只是一項過渡性的安排，政府不應厚顏地辯稱市場有此需要而推卸責任，俗語說“有頭髮誰願做瘌痢”。如果政府有足夠單身人士單位，而輪候時間可以大大縮短，每年在聯合國文化經濟社會會議中香港便不再會被那些落後我們很多倍的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表批評，說香港還有這種不人道的住所。

主席女士，“羣策羣力、轉危為機”不能只是一個一廂情願的想法，行政長官董建華應該細心想想，他每天“7 至 11”的工作時間，和自稱以“無私、無愧、無怨”的態度去服務市民，為甚麼市民還不欣賞他，不支持他？我建議董先生應多些微服出巡，直接聽聽市民的意見，多些聽聽“反對”的意見，想羣眾所想，憂羣眾所憂，這樣他的施政才有出路。

謝謝主席。

主席：司徒華議員。

司徒華議員：主席，“行政主導”這 4 個字，在《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和所有香港法法律中，都沒法找到。孫明揚先生說：“人人都咁講，我就跟住講”，他是承認了“人云亦云”、“不知所云”。一位市民寫信給我說：“豈止霸道，簡直強盜”。施政報告中，借區域組織檢討來“殺局奪權”，就是“霸道”和“強盜”的樣版。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區域組織檢討後不久，當時的文康播局局長周德熙先生，向臨時立法會慨嘆，在文化藝術政策上，自己是“無兵司令”。這說話透露出，所謂區域組織檢討，目的是想學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咸陽者，首都也、中央也。因為文化藝術，屬意識形態範疇，最為敏感，受到了強力的反擊。於是，政府便去另找突破，終於找到了“禽流感”。

究竟誰要向禽流感事件負責呢？事發之初，行政長官董先生斥責傳媒誇大渲染，影響了遊客到港，這是不是過於麻痺大意呢？後來，中央組成跨部門聯絡小組，採取了“殺雞有卵取”行動。如果說是“欠缺有效的中央統籌”，那麼這個跨部門聯絡小組，是用來幹甚麼的？兩局轄下的部門，只負責“執死雞”，而且不是兩局的直接指揮。“殺雞有卵取”，卻利用了來取消兩個市政局，來奪取兩個市政局的權力。

施政報告第 149 段說：立法會可取代兩局，擔任“申訴大使”的角色。我曾問行政長官：知否一個立法會直選議員的選區，等於多少個兩局議員的選區。他顧左右而言他，說我考他，交了白卷。按比例代表制，一個立法會直選議席，接近 3 個兩局議員的選區。以新界東、西區而言，有 5 個立法會直選議席，那麼一個立法會議員的選區，就是 15 個兩局議員的選區。這樣一個這麼龐大的選區，怎樣可以兼顧得了，怎去取代兩局議員“申訴大使”的角色呢？區議會權力過少，立法會兼顧不了，“殺局”就是堵塞申訴渠道，削弱市民的監察。

區域組織檢討諮詢報告公布了。捏造民意、篡改民意、不擇手段、取其所需，那樣卑劣的手法，可以媲美當年港英政府扼殺“88 直選”，甚至可謂“青出於藍”。做壞事比做好事做得出色，這是董先生執政以來，做得最出色的一件壞事。

假如是尊重民意的話，請看看今天報章公布的，中大亞太研究所的民意調查。對董先生的管治，滿意的只有 23.4%，不滿意的有 34%。根據這樣的民意，可引用《孟子》中齊宣王的一句話：“何不廢也，以羊易之” — 兩個市政局怎能廢除？應該用廢除別的東西來替代廢除兩個市政局。

在現行的憲制中，兩個市政局是最具民主性的。在回歸前，絕大部分議席，由單議席單票制的直選產生；少部分間選議席，也是具民意基礎的。回歸後，才強行增加了四分之一的委任議席。兩個市政局具有決策權和財政權，不受中央干預，比如在當前這經濟衰退時刻，減租減費都能迅速反映民意，

比起中央政府和房屋委員會，都乾脆利落，絕不拖泥帶水，討價還價。董先生是否因而感到不舒服，誓要“殺局奪權”呢？回歸以來，民主政制步步倒退，如果“殺局奪權”得逞，又是一個更大的倒退！這真是：“紓困無方，轉危無機；殺局出術，倒退有術”。為了“殺局奪權”，董先生還使出收買區議會的詭計。請區議員聽聽這句話：“趙孟之所能貴，趙孟之所能賤。”

這次“殺局奪權”可以說是：有預謀、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的。“50年不變”，但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方面，說變就變，一步一步的倒退。

不久前，本會通過“一局一署”的議案，即使是分組投票，兩組都獲得通過，民意得到充分的反映。這次“殺局奪權”唯一可守的關口，就是本會，要通過本會去修訂法律。假如本局的政黨和獨立議員不轉軛，堅持原來的立場，“殺局奪權”是不能過關，只是碰壁而回的。這是對各政黨和獨立議員的嚴峻考驗，是否在關鍵時刻和重大問題上，便暴露出護航的保皇黨的本質？請大家好自為之！

主席，民主黨和我反對原議案，支持所有能反映出民意不滿的修正案。有人估計，這次議案辯論結果或會是四大皆空；儘管如此，我認為也是不錯的，就讓這個施政報告得個零分吧。我謹此陳辭。

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金融風暴爆發，至明天剛剛 1 年，在此之前，差不多每年的香港施政報告都在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上發表，因此，在金融風暴影響下導致經濟低迷的 1 年後，由特區行政長官發表的來年施政報告肯定是難度極高的。即使在以往香港經濟表現良好的時候，政府的施政報告也都不可能面面俱圓，滿足到每一位市民的需要，更何況這一年來，香港受金融風暴拖累而經歷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市民的就業受到極大的影響，失業率持續攀升。面對這樣一個嚴峻的經濟局面，社會人士對施政報告如何提出挽救經濟、紓解民困等措施，自然有各種各樣的期望，因此，施政若做不到全面照顧，不滿情緒也容易產生，但我們也清楚瞭解現實，明白香港經濟的特點，長期積累下來的結構性問題並非朝夕可改，政府面對經濟周期性循環，在短期的實際影響力有限，政府所需的是勇於承受壓力的負責態度，對公共資源的運用更須審慎和恰當。作為負責任的政府，面對當前困難，同樣要面對長遠出路，我們要的是真正根治香港經濟民生問題的方案，不滿和抱怨並無助問題的解決。衡量這份施政報告的成敗得失，並非要看它是否肯大灑金錢，或承諾多多，而是要看它是否有分析現實，掌握問題癥結和施政重點，規劃出真正引導香港經濟走出困境，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長遠路向。

(一) 增強信心是穩定經濟的基本要素

施政報告現實和準確地分析了香港目前所面對的困難，指出了經濟復甦所依賴的 4 個要素，即外圍環境好轉、利息回穩、樓價穩定和市民重建信心。本人認為，外圍因素的影響是客觀存在、難以控制的，但信心因素最為重要，例如八十年代初期，在未有外圍因素影響之下，市民因對本港前途信心不穩而出現外匯市場極大波動，港元匯率曾經一度跌至近 10 港元兌換 1 美元。因此，本人認為，政府可以透過所推行的政策和措施，正面地引導市民對前景的信心，而在經濟逆境之下市民信心的重建更屬關鍵，尤其是在目前香港的經濟結構之下，金融和地產市場是我們的根基所在，市民的信心對於這兩個市場的穩定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這兩個市場的穩定又可以為整體經濟帶來生機，從而在根本上紓解民生的困難。施政報告基本上準確地掌握了這個問題的核心，當然，圍繞重建市民信心一環仍須盡力推出相應的措施，對於解決目前經濟和民生問題應可帶來實質性的正面影響。

(二) 穩定樓價是經濟復甦的大前提

面對過往 1 年來樓市的大幅調整，面對數十萬已經擁有自置物業家庭的資產萎縮和銀行體系需要穩健經營的現實，政府前階段推出了暫停賣地措施，施政報告又進一步修正了去年 85 000 建屋量的政策，停建夾屋，使私人房屋的供應更緊隨市場而進行調節。此外，施政報告更提出檢討居屋政策是否以購屋貸款取代，這將促動公眾預測私人住宅樓宇市場的供求平衡會有更大的調整，以上種種，明顯看到其苦心在於穩定樓定市，刺激低迷的經濟。當然，涉及長遠房屋政策的檢討，本人促請政府當局必須要審慎和有全面的考慮，特別是對居屋供應量和配合市民負擔能力方面，必須達到長遠而合理的平衡。從另一方面看，施政報告提出各類檢討和方向，也正好反映了政府面對目前的經濟困難，基本上掌握了問題所在，初步選定了施政的重點，但是對於施政的具體措施與力度仍須進一步縝密行事。

(三) 本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必須保持

正如施政報告提出，我們要加強香港經濟的現有優勢，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這將有助恢復投資者的入市信心。政府在 9 月初推出完善金融市場監管和運作的措施，有這方面的正面作用，但面對這 1 年來金融市場所受到的衝擊，以及使用公帑入市反操控行動，我們希望政府能繼續作出有系統和前瞻性的檢討，汲取經驗，增強香港金融體系的防禦沖擊能力，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要優先鞏固和完善現有市場機

制，確保公平和公開，有效防止市場操控，然後才考慮推出適當的金融產品，我們不能盲目追求市場的多樣化和規模擴大，這樣才能真正恢復投資者的信心。此外，聯繫匯率是香港經濟的基石，我們不但須將對聯匯的信心建立在政府的承諾上，也須有實質性的措施作為聯匯的堅實後盾，政府在 9 月初推出貼現窗和銀行結餘兌換保證等鞏固貨幣發行局制度的措施，穩定了利率，但當局不能以為這樣便可以一勞永逸，要保持審慎和清醒，聽取專家學者和業界的意見，繼續研究並準備好有效捍衛聯繫匯率和保障市民利益的措施。

（四）政府仍須堅持本身角色的定位

在這個特殊時期，政府第二份施政報告面對來得突然且前所未見的經濟衰退和民生困難，必須有承受壓力的負責態度，對政府自我角色的定位必須堅定和明確。行政長官在這份報告中，為香港的未來發展作出了定位，但更重要的一點，是這份施政報告同時堅持了對特區政府角色的定位。香港奉行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政府以審慎為理財原則，對於經濟活動的介入只局限於必要和引導的範圍。香港經濟的復甦，有賴多種因素的好轉，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除了應進一步完善本地的市場運作機制和盡力穩定市場信心外，太多使用公眾資源的措施也是不切實際的。

因此，從實事求是的角度來看，為着紓解民困，政府其實已經提出了多項措施，包括稅務寬減、退還差餉、推出中小型企業特別信貸計劃、設立就業專責小組、將注資 5 億元於僱員再培訓局，以及加速推行基建計劃等。在協助市民就業方面，其實可做的短期措施確實有限，儘管如此，政府今年可能仍要面對超過 200 億元的財政赤字。在外圍因素未有全面改善的時候，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對短期刺激經濟和紓解民困的措施的實質效用可以作出期望，但又不能期望太高，原因是市民今天所面對的就業困難，既有長期積累下來的泡沫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亦有金融風暴的即時影響，須有長遠的產業改造和升級政策加以根治，在短期內也有待外圍因素的好轉帶動整體經濟的復甦。面對這一現實，一個負責的政府不可能作出無約制和缺乏實質效用的財政承擔。最近美元回軟和美息下調，帶動香港樓市、股市以及其他經濟活動改善，正好說明了外圍因素相對於政府的政策，有着相當實質性影響，這正是本港長期存在的經濟體系的特質。

（五）積極引導本港經濟結構升級是長遠需要

本人認為政府對於香港長遠的發展路向，應該負上引導性的責任。因此，即使面對短期的經濟困難，經濟發展的長遠目標也不應動搖，政策的視

野和重點要保持清晰和明確，這份施政報告延續了首份施政報告的思路，將科技和創新的策略進一步具體化，以 7 個國際或區域中心為香港未來目標定位。為此施政報告作出了具體的承諾，例如設立 50 億元的創新及技術基金，推動科技應用，此外，也將繼續增加教育開支，並繼續按原定計劃推出大型基建項目。

總括而言，面對目前的經濟困難，我們應該中肯地評價施政報告。這份施政報告能夠堅持政府角色的定位，在介入經濟運作方面堅持審慎和自律，同時能夠堅持推行長遠的施政目標，以科技和創新為重點，着力於引導香港鞏固和擴闊經濟基礎，提高生產競爭力。公道來說，施政報告不可能解答全港每一位市民的不安和疑惑，但總體上是踏實和有遠見的，相信有關的具體政策的實施，將會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為香港走出經濟低谷，進入新發展階段作好準備；而我也深信，只要各項施政政策與措施能增強市民大眾的信心，當大家充滿信心，團結一致，香港人一定有能力共渡眼前的難關，並且創出長遠有利的基礎，換取更穩定繁榮的明天。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並支持內務委員會主席提出的致謝議案。

主席：劉皇發議員。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1 年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了他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當時香港順利回歸不久，一切如常，仍然是一派興旺的景象，該份施政報告以“共創香港新紀元”為標題，無疑是切合當時的情況。1 年後的今天，行政長官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以“羣策羣力，轉危為機”為主題，正好反映出香港遭逢金融風暴，陷入困境的巨大轉變。這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事前根本無法預計。

經濟萎縮，利率高企，失業率攀升，資產價值急降，種種負面因素的浮現，令香港人在過去 1 年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大家最殷切期望的自然是政府能夠盡快帶領香港走出困局，但我相信務實的香港人不會寄望一份施政報告就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基於香港經濟復甦的步伐備受外圍環境的影響，行政長官表明並無可以令香港迅速復原的萬靈藥，話雖如此，施政報告其實制訂了多項旨在增強香港經濟動力和競爭力的措施，勾劃出一幅令人振奮鼓舞的藍圖。

有意見批評施政報告並無開出解救香港經濟困境的良方，並將報告中列舉的宏大長遠目標貶為難救近火的遠水。平情而論，這樣的說法實在有欠公

允。在過去數個月中，港府已先後推出連串的措施去紓解民困、穩定樓價、創造就業機會、捍衛聯繫匯率，以及維持本港的金融秩序。有關措施的成效難以衡量，但可以肯定地說，倘若沒有施行這些措施，香港的情況必然會惡劣得多，困難得多。這些措施均具時間性和針對性，當然不能留待施政報告宣讀後才付諸實行，倘若以此而攻擊施政報告“無料到”，明顯是心存偏見，並非中肯客觀的評論。

正如行政長官所說，本港“經濟的困難還會持續一段時期，明年的情況亦令人難以樂觀。”因此，我們須繼續設法增添香港的動力，使其早日踏上經濟復甦之路。施政報告用了不少篇幅介紹制訂策略，推動經濟增長以及加強這方面的優勢，包括促進科技發展，推展大規模基建項目，以及加強旅遊事業等措施。其中行政長官決定委任一名旅遊事務專員，專責推動本港旅遊業的發展，就是一項非常好的投資和開源措施。香港近年無論在購物，以至旅遊景點和設施方面，備受區內競爭對手的強力挑戰，吸引力已大為下降。旅遊業是本港經濟重要的一環，當局有需要大力加強這方面的推廣工作，令旅遊事業再創高峰，為本港的經濟作出更大的貢獻。

在這個範疇裏，我建議政府研究在明年舉辦一個全國性對外貿易會，面對經濟低迷，悲觀鬱結情緒瀰漫的境況，在港舉辦大型國際性的經濟活動，對本港各方面的環節將可起到積極的刺激作用，是項活動將會吸引世界各國的商人遊客前來，對本港的旅遊業以至國家整體的經貿，都會有所裨益。此外，貿易會可以作為慶祝 50 週年國慶的一項重點活動，香港既已順利回歸祖國，此際在港舉辦有關的活動，除了顯示祖國強力支持香港外，我們可藉此國際盛會宣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至於交易會的具體計劃，包括是否須與廣東省有關當局合作舉辦，我相信只要港府有這意願，是不難達致一個完滿的解決辦法。

主席女士，除了開源，行政長官也宣布了政府部門的節流計劃，有關計劃要求部門首長藉提高生產力來減低開支，目標是在 4 年內，節省運作成本 5%。我對是項計劃深表贊同。為了確保政府持續講求效率，我認為有關提高生產力的做法，不應只是一個針對金融風暴的權宜之計，而應該確立為一項長期性的措施。香港公務員素以優秀見稱，我深信他們絕對可以不斷求進做得更好。此外，我認為現在也是適當的時候檢討公務員的賞罰任免制度，以加強他們的問責性和警覺性，這樣也有助於改善公務員的形像，以及提高他們的威信。

香港現時面對經濟不景，財政出現龐大赤字的嚴峻局面，政府部門固然須節流，當局還須作出全盤考慮，以釐定其他可以減省開支的地方，我認為國內移民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環顧世界幾個接受移民的主要國家，例如加拿大和澳洲，她們的移民數額經常會因應本身的經濟狀況而作出調整，目的是要保障國家和國民的利益。香港雖然不是一個國家，但在接受新移民方面，其實是面對同樣的問題。內地居民到香港定居每年達數萬人之眾，在香港經濟好景的時候，接受此等數量的移民當然不成問題；但如今香港經濟情況逆轉，並且不會在短期內復元，失業情況更趨惡化。據報道，越來越多新移民找不到工作，而申請公援的新移民人數持續增加。

從另一角度來看，一個經濟低迷的香港，將會令新移民在生活上和情緒上，面對較多的困難，不利於他們適應和融入社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為香港有需要與中央政府進行磋商，謀求暫時調低接受新移民的人數，待香港經濟情況好轉後，再因應當時情況將移民的人數增加。

主席女士，施政報告最富爭議性的，應是關乎兩個市政局存廢的決定，一如所料，政府一意孤行勢要“殺局”，對此，我深感遺憾和失望。在上次的施政報告辯論以及隨後在很多其他的場合，我一再指出“殺局”的建議缺乏理據，現階段並不具備取代兩局的條件，正如不少人一樣，我要說的，都已經說了，我不打算在此再費唇舌，但當局必須慎重處理一個問題，就是倘若“殺局”的法案不獲得立法會通過，當局將如何善後，政府不能為了達到“殺局”的目的，而不理一切，不顧後果，政府必須拿出一套可行的、為市民接受的妥善方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梁議員的議案。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他上任後第二份施政報告，用了相當大的篇幅勾劃香港未來發展的藍圖，實事求是地為香港定下了長遠發展目標。

去年 10 月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威力已蔓延全球。香港在這次風暴中深受經濟衰退之苦，出現經濟負增長，失業率更是 15 年來的新高。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個別地區經濟興衰不單止是個別因素，亦涉及外圍經濟因素，而香港本身是開放型經濟體系，外圍經濟因素的好壞，對香港有極大的影響，在這個經濟黑暗時期，要一下子靠香港內部資源扭轉劣勢，似乎是不切實際。

在經濟逆轉時，每個人都不好受，但總不能就這樣被動的期待着經濟的復甦。我們應該在逆境之中求變，提升本身能力，應付未來社會的轉變。

逆境求存 自我增值

踏入二十一世紀，我們面對的轉變，只會越來越快，越來越複雜，我們的應變能力會受到更大的考驗。為了適應社會的轉變，我們必須作好準備，而強化危機感(Anticipatory of crisis)是提高適應力的目標。

香港特區政府在提高香港人的危機感及適應力應肩負領導角色。特區政府是管治香港的機構，其施政對香港的發展有着深遠影響。作為最大僱主的特區政府，在面對快速轉變的社會中應從內部做起，改善公務員的思維及提升預見危機的能力，以免危機出現時，予人感覺手忙腳亂，不知所措。

政府帶頭強化公務員質素，亦應同時鼓勵僱主及僱員同樣地要改善本身的思維方式，要不斷更新本身的能力，配合社會的發展，而且具有靈活的應變能力，否則我們必落於人後，不能應付工作的挑戰，最終難逃被工作淘汰的命運，我們的年青人須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同樣地須具備高度的靈敏性。有見及此，我們就必須從教育改革開始，把以往那種傾向考試訓練，欠缺思維與分析的填鴨式教育，轉為強調思考及提高分析能力為中心，而邏輯學是貫穿兩者的重要學科。

困局與展望

社會要持續積極發展，還須有相應的環境配合，即是個人是否有機會發展理想及創造財富。

作為紡織及製衣界的代表，我想利用這個機會，以業界為例，說明上述兩項因素的重要。紡織及製衣業超過九成是中小企業，在我接觸的中小型廠商中，有不少是白手興家，由工人做起，從累積工作經驗再加上自身的拼搏精神而成為老闆的。他們實現心目中的理想，不是空口說白話，對本身工作有一種忠誠，對香港的工業抱有一種難能可貴的良心，願意繼續從事這種工業。

今天紡織及製衣業是本港最大的製造業，亦是製造業當中賺取外匯最多的行業。以 1997 年為例，紡織及製衣業佔製造業本地產品出口總值的四成；達到 848 億元。我們香港人要不要保留它呢？

董建華先生在他剛發表的第二份施政報告明確指出，要將香港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的設計和時裝中心”，我極之同意也非常有信心我們這行業有足夠的根基。

香港的紡織及製衣業，由於面對國際的競爭，已不能再走六、七十年代的那種低成本生產道路，必須向高增值的方向走，才能有持續及更大的發展空間。我們這一個行業不是今時今日才邁向高增值，我們已經持續走這一條路好久了。

要落實行政長官將香港發展為國際時裝中心，必須正視兩個現有的問題。

第一，勞動力老化。由於七十年代推行小學免費教育，其後擴展至初中，到九十年代初又大力擴展專上教育，市民教育水平大大提升。

如果比較 71 年至 96 年的就業者，屬小學程度的由 50% 降至不足 20%，相反地，提升至中學水平則由 28% 大幅增加至 58%，而大專比例更上升四倍。

過去 20 年，香港大力發展金融及服務業，吸納了大部分年輕人加入，令紡織及製衣業這類高創匯能力的工業缺乏新血補充，業內就業人口不斷萎縮，1997 年我們有九萬三千多人，比 1996 年下跌 16%，大大削弱本行業的競爭力，同時，現今世界面對的是跑 9.9 秒的世界標準，我們則正在跑 29.9 秒，因此，令勞動力年輕化正是當務之急。否則，即使我們有這種願意勞心勞力、有心在這行發展的人士也難一展抱負，更遑論為社會創造財富。

第二，香港紡織製衣成品，有八成是輸往歐美及東南亞市場，深受各地歡迎，成品縫上“香港製造”的標纖就是品質高尚的保證。若將生產工序遷出香港，勢必影響香港貨品的競爭力。我在此曾重複提及，法國便是一個最好例子，因將成衣工序外流，結果喪失時裝中心的領導地位，由鄰國意大利取而代之。

創新科技

今年，施政報告發表之後，有些人猛烈批評政府沒有解決本港經濟困難的措施，其實他們忽略了董建華先生提出創新與科技是為了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個長遠而實事求是的方向。反觀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其總理吳作棟快速因應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重申新加坡下一世紀的發展策略，強

調如何提高競爭力，重點在於高科技和高增值的方向。此外，當地的報章亦高度重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對港、星發展高科技的取向予以高度的肯定。因此，我深切希望港人能以客觀、冷靜、具前瞻性的態度真真正正地批評、分析香港的發展，不要過於短視，只顧目前，忘卻未來，忘卻了我們的下一代。

現在，我也想就科技人才及資金兩方面表達一些意見。高科技發展的一項極重要因素就是人才。香港對於科研工作一向意識薄弱，加上香港近 20 年來的經濟發展，尤其過去 10 年的泡沫經濟，注重“搵快錢”，年青人在社會瀰漫這種“炒賣”氣氛下，缺乏長遠眼光，欠缺耐性，只追求快速成果，這種心態對於講求恆心與耐性的高科研工作發展是一大障礙。

培育我們的科研人員，最少也要 3 至 5 年，但目前來說，我們須吸引內地及海外人才來港工作，解決現今想立刻發展的工作，或許我們可以美國矽谷的經驗作為參考。目前在矽谷成功創業的人士有兩成多是亞裔人士，他們絕大部分是在六十至八十年代在美國讀書的留學生，又或擁有外國同等學歷的人才，他們很輕易取得工作證留美工作，在短期之內，僱主認為其表現卓越，便會替這些專才申請移民，令他們安心工作並留下來，為他們製造財富，因此，政府在審批科技人才來港的申請時，應以批出工作證的形式，手續必須簡單，以方便出入境為原則。

對於投資資金方面，我認為“有麝自然香”。只要我們的科技發展有相當的表現，獲得國際讚許，投資資金自然會滾滾而來。而且，創新科技委員會提出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並注資 50 億元，為開展高科技研究提供初期資金，一定能起一種催化作用，所以我是絕對支持的。

我認為香港發展高科技首先應從電腦軟件方面着手，只要政策與路向能夠配合，我相信兩三年內，一定可見成果。

有吸引的營商環境，自然能令各行各業蓬勃發展，也可以使個人有機會一展抱負，創造財富，對社會經濟作出貢獻，政府亦會在當中得益，能夠開源生財，投資社會建設，改善民生，這才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醫療衛生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充滿挑戰的工作，不過從事挑戰的工作亦要有健康身體。因此，政府應該加強基層健康護理教育，強調個人有責任關注本身的健康。

此外，政府應以租金優惠方式，鼓勵私家普通科醫生自行組合在公共屋邨開設醫療中心，提供較長的診症時間，減少使用醫院資源。政府屬下分科醫療診所(Polyclinic)亦可以合約形式租予由私人專科醫生組成的醫療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務，病人在醫生轉介下，可利用中心其他醫療資源獲得即時服務。

過去 1 年內發生的醫療及衛生事故，引起市民廣泛關注。董建華先生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一個專責處理環境及食物安全的決策局，我亦支持這項改動。不過，在規劃新決策局的職能時，必須考慮有否與現有部門的職權重疊，有否灰色地帶，要釐清部門間的配合等原則。

環境保護

董建華先生在施政報告對於改善環境提出具體及長遠的目標。毫無疑問，環境保護是社會大趨勢，香港作為一個大都會，亦有責任維持。要將這個概念、價值轉化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項長期目標，須依靠密集式的宣傳，鼓勵市民參與及討論環保事項，才能將這個概念、意識植入港人心中，透過行動表現出來。

作為最大僱主的特區政府為了貫徹對環保的決心，可由本身做起，推行環保運動，化概念為行動，起一個帶頭作用。如果每個人都有環保意識，香港的環境質素才可以起着重大的轉變。

結語

近期內地的水災，令我十分感觸，看見同胞在資源緊絀下，仍能夠各盡其份，羣策羣力，奮勇救災，這種齊心協力的精神，值得我們敬佩。反觀香港較內地資源及機會何止多出十倍百倍，我們有信心度過難關，只要彼此同心，定能創造更美好的將來。我不是呼籲大家抗洪，我是呼籲大家學習那種精神，我相信大家是分得清楚的。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主席：李華明議員。

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我會討論 4 個題目，第一個是社會福利。庫務局局長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上表示，明年社會福利的實質增長是 29 億元，扣除 22 億元綜援新增開支後，直接資助服務開支只餘 7 億元，除了較受重視的安老服務，其他方面的服務是沒有足夠資源來應付越來越大的服務需求。

眾所周知，行政長官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人，提倡敬老、孝道，去年施政報告中，安老服務佔了頗長的篇幅，但是，一年過去，我想問一問行政長官，長者的環境得到甚麼改善呢？儘管安老事務委員舉行了多次會議，也花了很多公帑作研究報告，但仍然有萬多位長者在輪候入住安老院，而住在私營安老院的長者仍然得不到合理的照顧。

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最大的承諾是增加 900 個安老宿位，加上去年承諾的 7 100 個宿位，由 1998 至 2002 年間政府將增加約 8 000 個受資助宿位。政府要如期達到這個目標的唯一方法，就是大量向私營院舍買位，所以施政報告中亦提出改善買位計劃。跟政府自己興建安老院比較，向私營院舍買位無疑可以減少政府開支，快捷便宜，但我希望政府在貪圖方便便宜的同時，亦嘗試為長者提供一些保障。例如，自 1994 年《私營安老院條例》實施至今，只有兩成院舍能夠取得牌照營業，雖然政府會提高買位費用，但是，如果沒有嚴謹的規管制度和質素保證，增加買位的費用可能只是增加了經營者的利潤，卻沒有改善服務的質素。

最令人反感的是，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暗示，綜援開支大幅上升，政府要審慎理財，惟有向綜援人士“開刀”。目前經濟衰退，失業人數上升，正是需要政府加以援手的時候，政府不單止沒有增加支援，反而落井下石。更過分的是，綜援檢討將於今年年底公布，但社會福利署的高官已不斷發表“綜援養懶人”的言論。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盡快進行公開及廣泛的諮詢，在此之前不應發布不適當的言論，引起社會大眾對綜援人士的歧視及誤解，造成低下階層的分化，我希望政府審慎處理。

第二方面，我會談一談能源部分，第三是關於消費者權益，第四是區域組織檢討。關於能源，在電力方面，我在今次的施政報告內發現很多有關電力公司的政策仍在檢討和研究中，其中包括增建發電廠、電力供應商聯網問題，以及中期檢討利潤管制協議等。我希望政府在進行這些檢討和研究時，能夠認真從開放市場、促進競爭，以及保障消費者利益的角度去考慮。事實上，去年中電發電過剩事件已充分暴露利潤管制計劃的弊端，政府必須藉着這次中期檢討的機會，盡量爭取改善協議內不足之處，以達致維護消費者的權利，不要以為單靠葉澍堃局長公開呼籲電力公司不要加價，便當作保護消費者的利益，這是不足夠的。

另一方面，在能源供應方面，與市民息息相關的，便是燃油。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是必須進行監管的。油公司在香港是以寡頭壟斷方式經營，各公司之間好像達成價格協議，每當世界性油價飆升時，油公司便會即時加價，但在油價滑落時卻遲遲不願減價，只會多送紙巾、蒸餾水，或飲品等。過去 1 年，國際油價及新加坡石油產品的來價一直下跌，但香港的油公司只象徵式地在 1 月和 3 月間降低了車用汽油和柴油的價格，但減價幅度與來價下降幅度仍有距離，而本港的石油氣價格更在 1997 年 6 月開始從未嘗試調整過，這些行業的行為是完全剝削消費者的利益，所以我認為政府必須加以監管。

在消費者權益方面，過去 1 年，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接獲的投訴達 18 000 宗，較去年同期增加一倍以上，其中最多人投訴的自然是餅店和影視店，影視店更擅自更改條款，強迫消費者多看影碟和影帶，充分反映預繳式消費制度，對消費者毫無保障；消委會建議研究立例，保障預繳式消費，可惜工商局在來年的施政方針中，對預繳式消費的問題隻字不提，連“關注”、“研究”等字眼也沒有採用，工商局在加強保障消費者權益方面，我認為是失職的。

另一方面，政府去年否決制定公平競爭法及成立公平競爭委員會，取而代之，便是成立“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但該委員會的成員全是政府官員，工作目標含糊不清，更遑論工作日程，結果連一隻無牙老虎都不如，只是一隻用作裝飾的寵物而已。事實上，工商局亦認為已完成大任，在施政報告中，把這些列為完成項目，而在未來的施政方針中，也沒有再提出任何工作。民主黨對此感到非常失望，事實上，我們民主黨對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提出建議，委員會成員應該包括不同行業、不同利益的代表，避免自己人監察自己人。同時，委員會應就各行業及部門制定公平競爭指引，並舉行公聽會等。民主黨在此再次強烈要求有關委員會履行職責，長遠而言，政府應制定公平競爭法，確保香港經營環境符合公平競爭的原則。

最後 — 可惜孫局長不在 — 我想指出，今次區域組織檢討的諮詢報告，最少有 3 大謬誤，如果政府是基於諮詢結果而決定“殺局”，我現在便要指出，這 3 大謬誤足以令政府覺得應該重新檢討這結論是否適當。

第一個謬誤。在這個諮詢報告中，政府在兩段中重複表示，大部分市民都支持把食物安全和環境衛生收歸中央，由政府負責，但是對於有否需要保留兩個臨時市政局，“則意見不一”。“則意見不一”這字眼，我是引述諮詢報告的。另外一段，是關於問卷。由政制事務局設計的問卷，共收回 1 500 多份，政府竟然在諮詢報告中這樣寫：“大部分受訪者贊成由政府直接負責食物安全和環境衛生等工作，但是對區域組織未來架構安排，則意見不一”，

又是“意見不一”，但是我們再看一看由政府出版的意見匯集（我沒有帶來的“電話簿”般厚的意見集），當中有七百多篇意見書，大部分都支持保留及合併兩個市政局，而不是贊成把它們取消，而政府自己做的調查則更離譖，62%的市民是支持保留或合併市政局，只有17%的被訪者，支持解散兩個市政局。那份問卷調查是由民政事務局設計，並分發給18個區議會的分區委員、互助委員會主席、業主立案法團，他們並非一般市民，因此他們的意見，不可以當作一般市民，所以重質不重量，他們的質是不足夠的，我完全不可以接受這種說法，因為他們是民政事務處培養出來的地區領袖，他們所表達的意見是非常清晰，有62%贊成保留或合併兩個市政局，並非“意見不一”，所以指“意見不一”，是第一大謬誤、“打茅波”，因為已經非常清楚地有這種意見，報告書便不可以這樣寫。

第二個謬誤，是文化藝術團體表示的意見，顯然，市民很少表達這方面的意見，政府在這份諮詢文件中提及文化藝術、康樂體育的意見時，是引述藝術發展局和康體發展局這兩大團體的意見，但政府完全沒有引述另一類的團體意見，這另一類團體的意見，是完全與政府的想法相反的。政府認為現在的文康體育、文化藝術過於分散，互不協調，所以應該集中由一個新架構處理，但另一類團體（包括香港文化界聯席會議、香港藝術家聯盟，這些團體都是文化藝術界的人士）卻指出，現在的問題卻正正在於過分集中，兩個市政局控制了所有場地，它們應該把一些場地交出來給民間團體主辦，這些團體的意見與政府、康體發展局及藝術發展局的意見大異其趣，但為什麼政府在諮詢報告中，隻字不提？此外，也有一些有分量的團體提出意見，但顯然，中聽的便寫出來，不中聽的便丟棄，所謂“順我者取，逆我者棄”，整份諮詢報告，便是這樣寫成的，但最不幸的是，連學者的意見也遭閹割得不堪入目。請大家再翻看諮詢報告內學者的意見政府特別強調，在諮詢期間有4位學者致函政府，政府然後把這4位學者的部分意見抽出來，作為支持政府的立場，就是“殺局”及不再需要有兩個市政局的論據。那4位學者便是劉兆佳、劉佩瓊、鄭宇碩及張贊賢，我也看過那4份來函，全在我這裏，我把它們全影印了，並逐篇逐篇小心地看，發現有很精采的地方。原來那4位人士的意見，其實與政府的意見並不相同，只不過政府抽取了一部分，當作是他們的意見，舉個例子，劉佩瓊說：“市政局即使不取消，亦應合併”，其實，她對於取消或合併兩個市政局，覺得無可無不可，兩種做法都可以，但她亦強調，她贊成諮詢文件內第三個方案，即把市政局和區議會合併，但並非贊成解散兩個市政局，但政府卻引述她的話來支持解散兩個市政局，事實上，她是贊成方案(三)，即合併市政局和區議會。

同樣，劉兆佳先生亦贊成方案(三)，但政府又引述他部分意見來支持政府解散兩個市政局，這完全是斷章取義的做法。關於鄭宇碩的那部分更過分，鄭宇碩是贊成取消兩個市政局，但條件是要把區議會減至5個，不是政府現

時建議的 18 個，此外，他更建議政府應資助政黨，資助競選經費，以及加強政黨代表在立法會的功能，要擴大立法會的民選基礎，為什麼這些建議政府卻又不提呢？政府只引述他的結論，要取消兩個市政局，他在前面列出這些條件及分析，並不只說一句支持政府解散市政局，而是有這些條件的，政府是不可以這樣引述的，這等如說，我支持煤氣凍結收費，但我更支持它減價，難道政府可以說我支持凍結，便不理會我下一句話嗎？這是不可以的，張贊賢教授是支持取消兩個市政局，不過，他強調，更理想的是，所有的地區議會應進行全面直選，但在政府的諮詢報告中，沒有提及這些分析和理由。鍾庭耀先生建議，在解散市政局後，所有的職權應下放予區議會，並把全港分作 5 個類似市議會的組織，他的意見跟政府解散兩個市政局，保留 18 個區議會不同。即使這數位學者也贊成取消兩個市政局，但還有十多位學者在報章上發表文章反對解散兩個市政局，政府為什麼又不加以理會呢？政府為什麼不引述呢？政府為什麼不跟我們談一談呢？顯然，政府在解散兩個市政局的所謂諮詢中，已完全擺出自己的立場，只是利用學者的意見，斷章取義來作為支持自己的看法。

主席女士，我從來未見過一個這樣取巧的諮詢、這樣取巧的民意諮詢，有人形容行政長官“打波”怎樣怎樣，但我只有一句話說，這是本世紀最“茅”的一場波，政府打這場波，“茅招”盡出，我只能夠向大家分析在諮詢報告中的很多謬誤，我希望政府能夠再聽取我們議員的意見，不要在立法會上打賭我們不敢投反對票，企圖硬闖法例，取消兩個市政局，謹此陳辭。

主席：譚耀宗議員。

譚耀宗議員：主席，今時今日在香港不懂游泳，的確很令人擔心，因為過去 1 年，香港好像一艘剛下水的輪船，它飽受金融風暴的蹂躪，信貸收縮，中小型企業經營困難，內部消費疲弱，失業率高升，裁員減薪風波一浪接一浪，再加上一連串大型事故有如強風“正面吹襲”，船上的乘客對前景的信心不免有些動搖，有部分乘客不斷責難船長，更有人揚言罷免船長。船長要協助乘客克服各種困難，共同將這條船駛離風暴，需要的不單止是止嘔解暈、增強體力的靈丹，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確的航行方向。因此，船長提出航行方向和各種應變措施，很可惜，船長的努力未能改變那些喜歡責難他的人。

在施政報告發表之前，政府先後推出了一整套挽救失業，協助市民度過難關的措施，包括稅務寬減、加快基建、創造新職位及凍結公屋加租等，這些即時措施顯然對解決我們眼前的困難起了一定的作用。施政報告除了提出進一步加強短期紓困措施之外，更制訂長遠策略，穩固經濟根基，推動經濟發展。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將着眼於未來 30 年本港的經濟增長，發展高增值行業，並利用香港所具有的各種優勢，建立一個更多元的經濟體系，以抵禦可能會再出現的各種風暴，這種具有前瞻性的策略值得我們肯定。

有些人批評施政報告，他們認為“今生”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就為“來世”描繪了一個美麗新世界是不切實際的。但同樣是這些人，過去亦曾經批評前港英政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政策缺乏長遠規劃，為甚麼他們的眼光現在又變得那麼短淺呢？

有些人說，香港的科技發展落後於其他國家，連鄰近的新加坡、台灣都比不上，現在提出發展高科技及高增值工業，簡直不自量力，不切實際。如果按照這些人的看法，香港繼續依靠低檔次的技術和流動性極高的外來資本發展經濟，日後再來一次金融風暴，香港的經濟命脈必會連根拔起，不去奮鬥求存，必定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積極拓展人力資源

推動香港經濟的健康發展，除了投資發展創新科技、高增值行業和基礎設施之外，尚有一個不可欠缺的重要元素，就是人才的培訓。對此，施政報告再次強調將教育放在第一位，並首次提出“終身學習”的概念，希望促進香港成為一個崇尚學習的社會。

無可否認，發展教育，尤其是延續教育，是使香港勞動力保持活力和競爭力的重要一環，也是香港經濟保持成功的關鍵。施政報告承諾會致力讓所有有志於學習的市民都有提升自己能力的機會，這種積極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

施政報告亦承諾再注資 5 億元予僱員再培訓局，並為再培訓課程引入一套資格審定機制，使市民能夠透過培訓不斷提升自己的資格。從終身學習的概念來看，這些措施對提高就讀人士的競爭能力和自主能力肯定有幫助。

但是，在政府的施政方針中，我們卻看不到強而有力的拓展延續教育的措施。未來 1 年，教育及人力統籌局並沒有為延續教育制訂量度指標。現時的一些弊端，例如教育署直接負責的成人夜校仍然停留在補足教育階段，對於私人機構發展的延續教育課程，政府無論在監管、協調或統籌等方面都與社會的實際情況脫節，這些問題仍未得到足夠的重視。

至於僱員再培訓，作為延續教育的一部分，卻往往被視為解決失業的良方妙藥，若抱着這樣的期望，不單止不現實，甚至會導致市民對再培訓制度失去信心。只有我們整體社會都重視延續教育，重視個人自我能力的提升，我們才能夠更有信心面對各種危機。我深深體會到失業人士所承受的壓力，但亦希望失業人士不要因為暫時無法找到工作而對參加再培訓課程失去信心。

建立包括高增值高科技工業的多元經濟體系，相應對勞動人口的技術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再加上本港成人口的比重增加，以及不斷有內地人士來港定居，香港的教育服務急須作出相應的配合。但我們面對的狀況卻是十分嚴峻的：香港 320 萬勞動人口中，有四成人只有初中或以下教育程度。而聯合國最近發表的《人文發展報告》亦顯示本港文盲率高達 8%。雖然現時民間舉辦的各種延續教育課程數量不少，但據辦學團體反映，初中或以下程度的市民參與率十分低，足以反映出這些市民的學習自主性，是因為各種原因相對較低。現時政府投入大量資源於中小學和專上教育，務使新一代能掌握一定程度的語文水平及應用資訊科技，如果這是先進社會對市民提出的質素要求，政府亦應為低學歷市民的提升，創造更佳環境。因此，除了發展傳統的學校教育之外，全面規劃成人延續教育刻不容緩。

拓展終身學習，建設一個學習社會，政府必須承擔較宏闊的教育施政範圍及較大的財政開支，但從英美國家，及鄰近的日本和台灣的經驗可見，若能夠透過鼓勵私營機構及企業參與，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政府最須做的，是致力於建立一系列促進成人教育發展的基本措施，包括統籌編訂課程大綱，制訂教材，確立考核評審機制等，從而建立具備自我調節能力以適應社會需要的職業訓練和資歷體系，鼓勵在職及自學進修。

長遠規劃安老事務

在安老事務方面，政府於去年對改善長者福利作了較全面的承諾，以提高長者的經濟能力，改善長者居住環境及醫療護養條件，提供更強的社區支援。政府所採取的措施，例如推行長者住屋計劃、成立外展醫療隊及家務助理隊、設立長者健康中心等，都得到市民和服務機構的認同與支持。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再次承諾增加資助安老院舍宿位、資助老人院舍提供持續照顧服務及設立老人日間暫託服務等，相信對提高現有的老人福利服務的水平有一定的幫助。

但是，香港人口老化的情況越來越急劇，我們除了改善現有安老服務之外，實在急須對未來長者服務需求作出全面的評估，並長遠規劃，未雨綢繆。現時全港 65 歲或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 10%，但到了 2016 年，65 歲或以上的人口將會增加到佔總人口的 13.3%。老年撫養比率則會由 1996 年的每 1 000 個勞動人口對 141 人增加到 2016 年的 184 人。照我們現有服務的發展，屆時相信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

我們強調，發展經濟必須有長遠規劃，同樣對健全安老制度，拓展長者福利服務，政府亦必須高瞻遠矚，不能再停留於改善現有服務的層面。日本在老人福利政策方面不斷改進的做法是值得我們參考的，日本除了固有的退休金制度之外，1989 年推出一個稱為“黃金計劃”的老人健康護理及福利服務 10 年發展策略，保障老人的退休生活。至 1994 年，日本政府再推出經改良的“新黃金計劃”，並為老人福利服務開支尋找新的財政來源。最近，他們檢討該計劃後，針對計劃的財政緊絀狀況，將會在 2000 年推行長者供款形式的“長者長期照顧保險制度”。由此可見，改善老人福利服務並不能一蹴而就，香港在這一方面，仍然有一段長路。

主席，對於行政長官所提出的施政報告，大家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亦有許多批評的聲音，可見我們的討論空間、言論自由，並沒有因為經濟的困難受到限制、受到遏抑。不過，本會的同事昨日不斷把行政長官所說的“無私、無愧、無怨”來開玩笑，我覺得這些同事無論說出多少個“無”字，都比不上一個“有”字，相信本會同事都不會否認我們的行政長官是個有心人，不過，他是否有能力做到他期望做的事情，是取決於本會同事及香港市民是否願意與他羣策羣力，轉危為機。羅馬非一日建成，也非單由一個人可以建成。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反對所有修正案。

主席：張永森議員。

張永森議員：主席女士，我自己對施政報告有一個較為傳統的期望和理想，我希望透過每一年的施政報告，政府都可以具體地表現給我們看，這是一個管治有效率的、有領導能力的、有表現和有誠信的政府。從這個傳統的期望出發，我對這次的施政報告頗為失望。我亦希望用另外一些原則和標準去看這個施政報告，例如從經濟和政治的角度，研究施政報告在遠見和現況這兩方面的對比。

我首先談一談經濟的遠見，在這方面，我給予施政報告的評分是頗高的。我認為施政報告掌握到一個要點，就是我們現時本身的經濟、工業和各方面都有需要作多元化發展。施政報告建議我們推廣高增值、高科技、多媒體的行業，創新科技發展，開發科研和資訊科技等，希望香港能夠成為國際間一個多方面的中心，成為亞洲首要的國際都會。這個方向我覺得是對的。

另一方面，我亦想看一看政治的遠景，但我給這方面的評分卻頗低。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表示，長遠來說，我們會全力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進一步發展本港的民主制度。這其實對我們要求加速民主步伐，要求加速立法會和行政長官普選，甚至要求為了配合社會需要而考慮《基本法》是否有需要作出修訂，已經下了一個判語：規限我們必須在現時《基本法》的規定下，才可以進一步發展本港的民主。

我亦想談論一下現時經濟的狀況，我對施政報告在這方面的評分是中等。行政長官其實已經明白到，在經濟低迷時，刺激經濟最首要的措施便是解決利息和銀根的問題。當我們能夠在合理的利息水平中穩定下來，當銀行能夠在銀根方面放寬，當大、中、小型企業都能夠在合理的成本中運作，亦有足夠的營運資金經營時，社會上的公司倒閉、裁員、減薪事件便會自然減少，整體的投資氣氛亦會自然改善。這樣的話，我們的商業經濟和工業運作便可以復甦，亦可以直接和間接地控制我們現在的失業問題，提升就業機會。

但另一方面，政府也要考慮在一個新的經濟環境中、一個通縮的環境中如何自處，香港以前這方面的經驗實在較少。行政長官說不會加稅，但政府部門的其他同事很快便站出來說，加稅和不加稅都要經過審慎考慮。賣地減少了，當政府的收入日益減少，但另一方面又要刺激經濟時，在通縮的情況下，究竟政府的財政來源來自何處呢？外國給予我們的經驗是，政府可以考慮其提供的服務，無論是運輸、傳遞或甚至市政服務，可否私營化，這是一個新的方向，我希望日後我們可與政府就着這個方向進行討論。

我給予施政報告中有關政治現況的評分是非常低的。讓我用 3 個例子加以說明：第一個是政府對政策的承擔，第二個是行政和立法的關係，第三個是區域架構的檢討。

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的一年多中，政府對政策的承擔其實面對了很多問題，包括醫療、衛生、機場事件、金融風暴及經濟低迷各方面，可是，我看不到政府對這些政策勇於承擔。我不是要政府認錯，只是希望政府能夠站出來說，在過去一年多，其政策中的確有些地方可以檢討；這個檢討，我們可以與政府一同進行。然而，我連一個最基本的政策承擔的檢討都看不到，實在非常失望。

第二方面是行政和立法的關係。董先生承認，行政和立法的關係有需要改善，而他解決的方式便是溝通、再溝通。溝通是可以的，但令我感到非常

失望的是，當行政長官來到立法會答問時，卻連我們一個最基本的要求都不答允。我們問行政長官可否在 1 年內不要只來 3 次，可否多來一至兩次，與我們討論問題；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行政長官表現他支持溝通，他亦很容易答說可以多來一兩次，但他連這個基本的態度都沒有。行政長官一直強調溝通，說我們有很多其他渠道，但是，如果這些渠道沒有一個機制，只流於一些非正式或社交的渠道來溝通，是絕對不能達到我們的要求的。所以，我想利用這次辯論提出要求，希望政府能夠行出主動的一步，在機制上作一些改善，讓行政長官、行政會議和立法會能夠安排一個高層次的協調會議。至於政府官員的政治任命方面，我的態度亦很明確，我支持政府逐步在公務員架構中和公務員架構以外，把一些通才和專才吸納到政治任命中。

我想轉過來說一說兩局。有關兩局的區域架構檢討，其實在地區上也有很多討論。我想用一個準則來看這件事，便是政府究竟有否很坦誠地處理這件事？有否公開及公平地處理這件事？經過很多地區性的討論後，有人問我，有沒有想過除了諮詢文件所說的原因外，政府究竟有沒有其他原因？有沒有一些政治因素？他們的看法是，其實內裏是有一些政治因素的，因為兩個市政局是財政獨立、可以制訂政策和執行政策的架構，對政府現時行政主導的概念，是一個極大的衝擊。我們亦可以看到一個趨勢，由於這些民主架構一直是透過選舉產生的，如果逐步讓個別或聯合的政團掌握到這些議會的大多數，對民主為主導這個概念的衝擊，將會更大。政府好像十分害怕這個情況出現，現在它正掌握到一些時機，便是現時兩個市政局的架構是臨時性的，再加上經濟低迷，大家關心經濟的問題多，關心其他問題較少，所以對政治衝擊可能較為容易接受。

此外，由於過去兩年發生的一些事件，使兩個市政局給人的印象較為低落，加上一些醫療、食物安全、環境衛生的事故，令政府覺得最好便是在這個時候“下手”，如果不在這個時候“下手”，便沒有機會了，於是逼出了政府處理這個問題的手法。剛才很多同事都談過這個手法，對政府整個處理方式非常不滿：政府在短短兩個月內，在沒有具體和全面資料提供給市民的情況下，也沒有具體行政架構的建議，便以一個非獨立、不科學、沒有系統的方式，在 6、7 月諮詢民意；收集到的民意不十分入耳時，政府如何處理那些意見呢？它有兩個方式：一個方式是肢解民意，然後再作分析，將肢解後的民意加上重質不重量、各取所需的形式，肆意歪曲。政府沒有告訴大家，其實在過去的 4 個月中，在政府、政黨、學術團體、區議會、區議員和分區委員之間進行的接近 10 個的調查，得回來的意見都是不支持“殺局”的，大部分意見均支持保留兩個市政局或將之合併。

政府鍥而不捨，把解散兩個市政局跟區議會的津貼、區議員的薪津，甚至跟差餉掛鈎。我知道政府會逐步澄清這些問題，但我覺得這些資料被披露，是絕對有系統、有安排的。兩個市政局解散與否，明年的差餉也會下跌；明年正值 3 年一度的評估時期，地產的價格大幅下調，所以即使不解散兩個市政局，差餉亦會下跌的。因此，不要把差餉跟解散兩個市政局混為一談。

此外，強迫立法會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一百六十多條主體和附屬法例，那個時間表根本是不可行的，亦不切實際。為甚麼要這麼急呢？原因正是背後的政治因素。

我想作出一些建議，政府在處理區域架構組織的檢討時，其實還有一個機會可以納入正軌，我希望政府會考慮這 4 個建議：第一，為了穩定自己的民意基礎，政府應該進行第二期的諮詢；第二，不單止諮詢市民，並且透過立法會，跟學者、政界方面舉行公聽會；第三，提交給立法會考慮的法例應有系統、一攬子地提交，待立法會能全面討論問題；第四，與立法會訂立一個有效的檢討時間表。最後，要告知市民大眾，如果立法會不支持政府的做法時，政府將如何在 1999 年年底，有效地安排繼續提供市政服務給廣大市民。

最後，我想藉此機會作出一些承諾。在兩個市政局的討論中，我們認為應該向市民作出一個具體的承諾，便是由現在起到 99 年，無論“殺局”結果如何，我們都會盡忠職守，檢討自己的表現；我們成立的市政服務聯合工作委員會，會朝着“一局一署”的方向邁進，以具體表現這個概念是可行的。我們也會向市民提供全面的資料，讓他們瞭解兩個市政局跟市政署的關係，其困難何在。最後，我們亦會諮詢民意，讓民意作出最後決定，究竟兩個市政局的前途應該如何。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何世柱議員。

何世柱議員：主席女士，施政報告一再強調“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自由黨一向關注老人問題，對於政府這個服務目標，我們是支持的。然而，本港人口不斷老化，直至 1997 年年中，60 歲以上人口已接近 94 萬，佔總人口 14.4%。根據估計，到了 2006 年，本港 60 歲以上人口將會增加至 23%；75 歲以上的人口增長率會上升得最快，相信到 2006 年，75 歲以上人口的增長率將為 4.59%，與整體 60 歲以上人口增長率的 1.77%相比，相差兩倍半。老年人口的增加，表示依賴公共資源的人數亦會上升，而第一個浮現出來的問題就是老人的住屋問題。我們懷疑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政策，是否能夠切合所需，達到“老有所屬”的目標呢？

隨着家庭結構和價值觀的轉變，本港家庭對照顧老人的概念正在改變。不少家庭成員為了工作，無法照顧家中的長者，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則會把長者送到私營老人院舍，但私營院舍收費高昂，並非一般家庭所能負擔，因此，唯有依賴公共資源，等候入住政府資助院舍。可惜，資助老人院舍的供應量卻遠少於需求量；政府提供的數據顯示，直至 9 月底，輪候入住各類資助老人院舍的人數共有 37 430 人，平均須等候的時間為兩至三年，而需求量最高的護理安老院，輪候時間便要超過兩年，療養院則更要輪候達 3 年之久。這現象與政府希望達到“老有所屬”的目標，似乎還有一段很長遠的距離。

施政報告內提出，計劃在 1998 至 2002 年期間增加約 8 000 個受資助宿位，但其中的 7 100 個是去年已承諾的；因此，政府今年只是輕撥資源，增加了 900 個資助宿位。據資料顯示，政府在這些新增的宿位中，將會集中在私營安老宿舍的買位計劃。

資助老人院舍的供應，將不足以應付需求，而施政報告所提出的政策，亦難以達到“老有所屬”的目標。我們認為政府應該靈活變通，因應社會環境的轉變，提出切實的方案，自由黨就增加資助老人院舍的供應，在此提出以下幾項建議：

首先，單靠政府批地興建老人院舍的速度太慢，政府應該把握現時樓宇價格下降的良好機會，並按照不同地區的需要，購買現成樓宇改建為老人院舍，這方法可快捷地增加老人院舍的數量。除此之外，現時不少空置的政府宿舍正公開招租，其中大可選擇一些合適地點改建為老人院舍；例如，香港東區那打素醫院就正與志願團體合作，把醫生宿舍改建為老人院舍，由於鄰近醫院，使長者在醫療上得到便利。此外，施政報告已因應樓市的變化而暫時停止興建夾屋（我們但願如此），政府可考慮把原本已撥出來興建夾屋的土地，改為興建老人院舍。

除了增加老人院舍宿位外，政府還要關注那些無須入住老人院舍的長者的需要，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居所。政府應該經常檢討老人住屋計劃，進一步縮短長者輪候入住公屋的時間。此外，我們支持政府讓那些與長者同住公屋的家庭優先獲得編配公屋，但是政府必須經常抽查和探訪，以防止有人虛報資料而獲得優先編配。

本港對老人服務的需求，將會因應人口老化而日益增加。老年人曾經服務社會，為社會作出過貢獻，我們要確保他們的晚年生活得到保障。政府應密切瞭解需求的轉變，不斷檢討現行的老人政策，實事求是地解決老人問題。

現在我想談一談失業問題。目前本港失業情況持續，不少分析都預計失業率會再度上升。有人認為施政報告在解決失業問題上着墨不多，辦法也言之不詳，但事實上，在失業問題上，政府可以直接做的其實不多，政府的主要責任是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新的內外投資，並鼓勵現有的投資者擴展業務。當經濟活動繁盛，職位便自然增加，失業問題便可以解決。

事實上，施政報告用了不少篇幅描述發展工業、改善營商環境和穩定樓市。自由黨的同事就這方面也發表了很多意見，詳細闡述了他們的看法，我不在此重複了。施政報告中描述的都是間接解決失業的辦法，有人會認為這些是“遠水不能救近火”的方法；但一些即時的措施，如加快基建項目以增加職位、加強再培訓課程等，政府已即時付諸行動，這些亦不會等到在施政報告中才提出。

現時本港正經歷痛苦的經濟調整期，不單止是僱員要面對失業危機，不少老闆也正面對經濟困難、生意難做的困境。我們必須讓投資者對前景有信心，讓他們可以努力下去，走出谷底。僱員亦要面對現實，與僱主共謀對策，同舟共濟，務求雙方在薪酬上得到共識，使老闆得以維持經營，僱員亦不致失業，一起度過這個經濟難關。

輸入外勞問題一向備受爭議，現時已有一個嚴謹的機制監管輸入少量外勞，亦保證本地人可優先就業。我們並不同意“一刀切”地停止輸入所有外勞，因為在不少情況下，輸入一些外勞是可以同時增加本地職位的。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有一間即將開業的四川菜館，須聘用兩個地道的四川大廚，在本地未能覓得合適人選後，他們唯有要求輸入外勞，當政府批准它輸入這兩名外勞後，這間四川菜館得以成功開業，並同時創造了 50 個職位予本地人。因此，輸入外勞不一定會減少職位，反而可以增加本地人的就業機會。

我們必須明白，失業是經濟衰退衍生出來的問題，有很強的連帶關係，因此，我們必須找出問題的徵結，才能對症下藥。現時最重要的，是如何穩定經濟，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當經濟復甦過來，職位自然會增加，失業問題也便會解決。

現在談一談綜援問題。本港社會現時有一羣依賴綜援生活的人，他們只能過着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由於經濟不景，依賴綜援的人數正不斷上升，當中除了沒有工作能力、老弱傷殘的人士之外，還有一批有工作能力的失業人士。很明顯，申領綜援人士的人口結構和特徵，已因社會經濟環境改變而有所不同，政府亦必須因應改變而作出相應配合；因此，政府必須盡快檢討現

時的綜援政策，以更適切的方式應付社會需求。

自由黨一向不認為綜援制度會“養懶”人，而設立綜援的目的，是要協助社會上的老弱人士，讓他們能夠過有尊嚴的生活，使他們得到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但是，現時綜援所提供的金額，是否能使他們活得有尊嚴呢？現時不少接受綜援的家庭都是捉襟見肘，生活在社會貧窮的邊緣。我們認為，現時的綜援政策未能完全協助他們解決生活上的需要，政府應該作出檢討，使那些真正需要協助的老弱人士，能有安穩的生活。

現時在接受綜援的人士當中，為數不少是失業人士，他們均有工作能力。有人認為，現時的綜援政策對有工作能力家庭的資助金額過高，特別在整體工資下降時，這些有工作能力的家庭所領取的金額，與社會一般家庭的收入有所差距；這樣除了造成社會不公平外，還會減低這些有工作能力人士的就業意欲。我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有必要作出檢討。

我們必須明白，不管社會如何進步，經濟如何發達，社會上仍會有一些需要協助的人，政府必須用實事求是的精神，體恤他們的需要，協助他們改善生活，這才是進步社會的表現。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並反對各項修正案。

主席：何俊仁議員。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我首先會代表民主黨就運輸基建設施方面發言。

在擴建運輸基礎設施方面，今年政府最明確交代的，就是 4 個鐵路計劃即將動工，它們分別是西鐵第一期、馬鞍山至大圍鐵路綫及九鐵尖沙咀支綫、將軍澳地鐵，以及上水至落馬洲支綫。猶記得自 94 年 12 月運輸科公布“鐵路發展策略”開始，每年在施政報告發表時，我們都會問到這些鐵路的進展，而多年來得到的答案，都是指鐵路工程仍在研究中。結果因為研究再研究的緣故，這些鐵路由目標 2001 年或之前完成，變成了現在要 2002 至 2004 年期間才完成。

在今次的施政報告中，我們亦看到有很多大型運輸基建設施在研究中，我們當然希望政府不會以研究為藉口，拖延這些重要的決定。若然真的在研

究中，我們希望政府能加快研究的程序，令工程可盡快落實和開展。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表示會採取措施，簡化推行運輸基建工程計劃的程序，目標是把實施工程計劃所需時間縮短 15%。對於這項措施我們表示支持，但可惜報告中卻無明確指出有關措施的詳情，以及何時可以得到落實，我們希望運輸局局長在下星期可以給我一個比較確實的答覆。

我跟着想談一談公共交通服務方面。作為廣大市民每天賴以上班和上課的公共交通運輸工具，鐵路公司竟然可以完全擁有加價自主權；而巴士的收費則由一個既缺乏運作透明度，成員又欠缺代表性的交通諮詢委員會全權審議。在這類調整收費的機制中，可見市民的民意和權益，完全被忽略！為了改善鐵路和巴士的加價機制，民主黨曾於 1997 年提交私人條例草案，修訂地鐵、九鐵和巴士條例，很可惜兩條條例都不獲通過，原因是當時的運輸司蕭炯柱先生游說議員時，承諾政府會積極考慮成立一個獨立、有公信力和高透明度的公共運輸管理委員會，委任受社會尊重和信賴的人士，負責審議所有公共交通加價的事宜，並表示在適當時機會諮詢公眾人士有關這個機構的成員組合、職權範圍和運作模式。但到了今天，我們才知道在這條條例草案不獲通過後，政府原來根本沒有做過任何全面的檢討，甚至可能沒有做過任何檢討。較早時，運輸局局長曾表示，目前的監管架構運作良好。我們對於政府不能落實其承諾的這種不負責任態度，表示強烈不滿！我們再一次要求政府盡快提交有關的檢討報告，落實較早時運輸局局長所作出的承諾。

今年的施政報告中也提到會加強監管各家鐵路公司，我想問局長有關實質措施如何？在鐵路票價方面，政府如何確保市民權益受到保障？

至於交通管理方面，近期社會上都關注到西隧與紅隧流量不均衡的情況，事實上，西隧流量偏低不單止不能紓緩紅隧的擠塞，更是浪費本港的社會資源。我想原因非常簡單，就是西隧收費太貴所致。

造成今天的結果，我們認為政府須負上責任，原因是當初政府讓西隧公司的專營協議擁有自動加價機制，清楚列明公司的回報、隧道費和加價的準則。這條條例缺乏彈性，並且單方面保障營運公司的利益。條例一旦通過後，便連政府自己也不能左右隧道公司的決定，完全失去了作為監管者的角色，明知西隧收費太高，浪費社會資源，但仍然束手無策。

民主黨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在研究中，我們亦知道政府可能會提出方案以改善 3 條隧道的運輸情況，我們願意審慎考慮政府日後可能提出的方案，但我們再三提醒政府，必須顧及市民的利益，絕不能隨便利用加價的方式要求其他隧道使用者來津貼西隧。總括來說，我們希望政府能周詳地考慮，然後提出一個方案，而不應草草了事來敷衍公眾。

主席女士，我另外想討論一下有關金融改革的問題。過去 1 年，香港的金融制度出現不少問題，包括證券公司接二連三出現欺詐和倒閉的事件，銀行曾經出現擠提，港元多番受到狙擊，政府 8 月入市等，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受損。但在今次施政報告中的金融服務業部分，我們看不到政府或行政長官有認真汲取以往的教訓，全面檢討現有金融體系，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就金融事務提出兩項建議，第一，指定財經事務局局長日後要採取主動，在規管當局與市場運作機構之間進行協調，並研究這項工作所需的資源；第二，跟進去年建議成立的財經學院。這兩項建議中，只有第一項為新建議，第二項是以前曾經提過的。

民主黨認為第一項工作是應該的，所以我們表示支持。政府的入市事件，反映出證監會、期交所、聯交所與中央結算公司各自為政、缺乏協調的問題，因此，財經事務局必須加強統籌角色，加強各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繫，以堵塞現有金融市場中運作的漏洞。

民主黨對於施政報告未有提及兩項重要的檢討，表示失望。第一，檢討聯交所的組織和結構。自從 87 年股災後，發生停市與期貨市場崩潰事件，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受到嚴重損害，甚至被冠以“無王管的賭場”或“私人會所”的惡名；事隔 10 年，這名聲仍然未能洗脫。事實上，目前聯交所的股權由經紀持有，而且享有壟斷性的地位，從過去不少例證中，亦說明聯交所以保障會員利益為首任，漠視投資者利益；而且保護主義色彩濃厚，拖延了市場的發展。民主黨認為我們必須盡快檢討聯交所的壟斷地位與結構，例如將聯交所會員的責任交由聯交所屬下的獨立公司負責，或將聯交所的股權擴大，將原有由經紀全權擁有，擴展至其他市場人士或公眾人士亦可參與擁有。

第二，由於過去 1 年金管局在聯繫匯率方面的表現，已充分暴露其角色與有關條例的關係含糊不清的問題，民主黨要求檢討金管局的結構，並制定金管局的法例，清楚賦予金管局權力，界定其角色、職責、組織架構（例如總裁任期、委任、董事局及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職權與組成等），以及金管局的財政問題，確保金管局獨立行使監管的責任，同時保持運作的透明度與問責性。

過去 1 年，證券公司接二連三倒閉，令投資者損失慘重。政府監管不足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亦同時反映了對投資者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政府應利用資訊科技，令投資者充分掌握信息，瞭解自己的權利，作出明智的投資決定。聯交所應該設立資料庫，如有關法規與守則的資料庫、上市公司與會員資料庫，以及統計資料庫等，金管局則應定期向公眾公布銀行的基本資料，

如貸款組合、資本充足比率、資本額等，並將這些資料上網。

最後，政府原本承諾於 95 年取消定期存款利率協議，但其後卻諸多推搪，終於取消 24 小時存款利率協議的計劃，而在今次施政報告中，仍然對存款協議取消問題隻字不提，令銀行公會堂而皇之透過利率協議，繼續維護一些大銀行的利益，從而損害了消費者的權益。民主黨認為，銀行利率協議有違公平競爭原則，亦對施政報告未有實行以往的承諾，表示失望。現在民主黨正草擬私人條例草案，建議取消銀行公會制訂最高利率協議的權力，此外，民主黨亦要求政府盡快考慮透過立法形式，成立銀行存款保險機制，以保障銀行客戶的權益及銀行體系的穩定。

主席女士，這兩天以來，我們聽到會內有不少批評的聲音，但我只想在總結中說幾句由衷的話。許多同事的批評縱使非常強烈，甚至是尖銳的，但我們絕對是善意的，並非帶有惡意或敵意。縱使批評是多方面的，甚或涉及施政的基本原則，但我相信同事們並非完全抹煞政府各部門所作出的努力和成績。不過，整體而言，我們對施政報告仍然感到遺憾和失望。當然，我要再說一次，我們並不是絕望，從而要跟政府對抗；民主黨仍然會繼續努力，鍥而不捨地推動民主改革，爭取政府各項施政的改善。我們亦會尋求在一切可能的空間之內跟政府合作，謀求改善市民的生活，希望香港盡快度過今天面對的難關。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陳國強議員。

陳國強議員：主席，在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對發展高科技作為擴闊香港經濟基礎的決心，是十分清晰的；他致力將香港變成亞洲首要國際都會的想法，長遠來說，也是好的。施政報告裏提及發展高科技、高增值工業的問題，的確着墨不少，使人覺得香港將會走向更現代化的社會。

不過，打一個比喻來說：我們香港人由一個高峰走入低谷，向前望，又看到有另一個高峰，何嘗不是好事？只是，政府斷然不能教所有市民光是向前看，卻不幫助他們攀上這個山峰的。沒有“體能”、沒有“技能”，又如何可以捱上萬里路、攀登萬仞高山呢？

我認為在推動本地工業更新和發展的同時，應該考慮得周詳和全面一點，不要忽略了一羣低技術工人的技能提升問題，並且應該締造更好的就業環境，發展香港的人力資源，以及開創更多就業機會。

提及香港十多年來的人力資源結構，我們結合過去一些簡單的數據作出分析，就能夠明白香港在人力資源再培訓上的工作成績，是並不理想的。從行業來看，製造業就業人數由 1986 年的 95 萬，一直下跌至 1996 年的 57 萬，跌幅達四成多，佔整體就業人數的比例，也由 36% 下跌至現時的 18%。同期與服務業有關的第三產業（包括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運輸、貨倉、通訊、金融、保險、地產、商用服務、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等）就業人數，由 145 萬增至 217 萬，增幅約為四成，佔整體就業人口的比例，則由 55% 上升至 72%。可想而知，很多以前從事製造業的工人，都投身了服務行業，特別是從事那些非技術的職位。

此外，如果我們再回頭看看以前教統科發表的 2001 年人力統籌展望，便會發現它預測 2001 年香港具高中及預科程度者，將分別短缺各四萬多人，而具大學程度者，則多出二萬多人，初中或以下教育程度者，也約多出五萬人。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到另一個可能出現的問題，就是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力供求不平衡，主要是由於教育方面的人力規劃，未能與經濟發展相配合，造成學無所用，浪費了人力資源。

事實上，如果香港經濟還未出現目前的困難狀況，人力資源發展尚且出現低技術勞工欠缺培訓轉型、整體人力資源規劃不妥善等問題。而現在經濟不佳，職位大幅減少，失業率持續上升，除了揭示出過去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之外，香港的人力資源及就業環境的配合，更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但最重要的，是政府將如何為市民帶來“體能”和“技能”，以度過這個痛苦的調整期。

談到人力資源架構問題，根據施政報告所述，行政長官打算合併兩間科技學院及 7 間工業學院，成立一間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專責學術和職業訓練。我認為政府肯踏出第一步，去進行培訓機構的改革，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不過，我希望政府對人力資源架構的改革，不會就此便沒有“下文”，而要繼續深化重整人力資源再培訓的工程。

我們工聯會在兩年前已經提出辯論，要求政府重整人力資源再培訓架構。當時我們指出，香港的人力資源培訓制度明顯地有幾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有關政府部門和機構之間的運作，欠缺整體配合，以致形成各自修行而資源重疊的狀況；另一方面，政府在人力資源培訓政策方面，並沒有明確的方向，對於負責延續教育職能的兩個主要培訓機構，即職業訓練局（“職訓局”）和僱員再培訓局（“再培訓局”），在缺乏中央統籌和協調的機制之

下，兩者之間的職責仍然有角色重疊的現象，以及互相爭奪資源的情況。

現在要合併兩間科技學院和 7 間工業學院，只是改革職訓局的個別架構，對於職訓局與再培訓局相互之間的角色分野，尤其是兩者都在推行有關再培訓工作，而兩個機構並沒有明確分工的問題，亦沒有進一步的明確化。

除此以外，自從 1992 年政府實施了僱員再培訓計劃以協助基層勞工轉業之後，整個僱員再培訓計劃的方向，仍然是模糊不清，沒有長遠的發展策略，在課程設計上，既不能有效使就讀者學習新技能，又缺乏與現存其他培訓課程的銜接。近年來，有關當局短視地把重點由“培訓主導”轉向“就業主導”，只關注畢業學員能否在短期內找到工作，卻忽略了學員能否得到充足的培訓。單就以現在來說，失業率上升，生計艱難，勞力市場萎縮，職位減少；政府有見及此，增加注資 5 億元進行再培訓工作，如果再培訓局仍然以七成就業率為指標，拒絕資助其他機構開辦有關提升轉業技能的課程，那將會導致很多失業人士無法在此期間接受培訓，真正令人感到無奈。幸好我現在聽到再培訓局從善如流，承諾檢討及更改上述指令。

我始終認為，單純依靠政府決策部門訂定具體人力資源政策，往往會忽略社會各方面的意見。政府應該趁着調整期的出現，成立一個由勞、資、官方及專業人士組成的法定機構，專門負責促進現時各個培訓機構的統一和合作。它的具體工作在於 3 個方面：第一，研究香港勞動力市場和行業發展的趨勢，讓各個培訓機構可以作相應的配合，以及在課程和技術訓練上作適當調整；第二，制訂及推行整體人力資源培訓方向，以配合本港長遠的經濟發展；第三，統籌和協調人力資源培訓的各有關部門，訂定培訓機構的發展路向，以求各機構的工作能對促進就業機會發揮有效作用。

其實，香港有約 130 萬的勞工是中三或以下程度的。基本上，特區政府要兼顧 3 個層面的培訓工作：第一，低技術勞工的再培訓，目的在於使他們能掌握所屬行業的新技術；第二，技術勞工的培訓，除了使其掌握所屬行業的新技術之外，更提升個人的生產力和工作效率；第三，專業和管理技術、新科技等的培訓，作為提升香港整體的科技和管理水平。如果香港忽視這百多萬低技術工人的培訓工作，以後出現的社會問題，只會更難解決。

再談到“體能”問題，市民要走過這個低谷，必然要有體力，即是“有飯吃”和“有工做”。政府不想失業者長期倚賴福利救濟，但失業人士何嘗希望靠綜援度日呢？所以，特區政府除了為失業人士提供緊急的經濟援助以

及技能再培訓之外，還要想方設法，為廣大僱員締造良好的就業環境。長遠而言，要成立一個妥善的失業保險金計劃，為將來一旦再次經濟不景時，作出未雨綢繆的措施。我以前曾經提及，政府在扶助發展本地工業的同時，應該考慮加強香港與內地的互動和合作，最重要的是開拓本地工業發展的空間，特別是向中央政府爭取一定的內銷權，以增強吸引外資投資本地工業的條件。

除了市場是發展本地工業所須考慮的主要因素之外，另外的問題則在於工業發展的多元化，即能否創造不同層次的工種，給予不同文化和技術程度的工人有就業的機會。

行政長官強調發展高科技、高增值工業，認為藉此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是董先生沒有提及如何解決現時一大羣低技術、低文化程度工人的就業問題，或在日後的高科技、高增值工業中，如何吸納那些未能因再培訓而提升技術、並且適應新科技就業環境的工人。

眾所周知，從現時香港的人力資源來看，能掌握高技術的工人，並非佔整體勞動人口的最大部分，反而低技術工人為數不少；他們能否在勞力市場中有其位置，對於社會發展及安定，尤為重要。因此，政府不能只着重發展高科技、高增值工業，而將這些低技術工人置諸不理，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

其實，在一些新興國家中，也不乏可製造低技術工種的工業。例如某些西方國家已推行有序的環保工業，其政府制訂了一系列積極的措施，對發展環保工業作出經濟支援、技術支援和稅務優惠，從而實現環境保護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目標。尤其在有關工業的生產程序當中，保留了大量的低技術工種，這不但可為本地工人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同時所生產的物資，也符合全球環境保護的需要。

事實上，與環保有關的一些新興工業，都具有發展前途。它們不僅可以節約能源，並且減少空氣、土地和水的污染，更重要的是，該等工業亦為低技術工人提供了就業機會，能讓本港的工業發展更趨多元化。我認這些都是值得政府參詳的。

最後，我謹在此籲請全港僱員，在逆境中應該自強不息，加強自我培訓和提高技能，以適應未來工作的挑戰和競爭，為香港經濟創造更驕人的成就。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吳清輝議員。

吳清輝議員：主席，對香港市民來說，過去 1 年是不尋常的，是風吹雨打的一年；對董建華先生來說，我想也是頗為沉重的 365 天。第一份施政報告的題目是“共創香港新紀元”，信心十足；到今年 2 月的財政預算案，題目上便有了“利民紓困”這種字眼，說明要應付亞洲金融風暴對本港造成的強烈衝擊。現在的第二份施政報告，題目是“羣策羣力，轉危為機”。數個月間，困難已演變為危機。

對這份力圖克服當前危機，走出逆境的施政報告，我想就 3 方面提出我的看法。

發展科技工業

首先，我要談一談香港發展科技工業的問題。眾所周知，自從香港製造業向外遷移之後，要不要本土工業便成了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要工業便要走科技含量高的高增值道路，發展科技必須有政府扶持，但過去政府卻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坐視本土工業消失。許多關心香港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人士意識到，沒有工業、沒有科技，香港的經濟結構便有缺憾，所謂服務型的經濟也難以保持持續的競爭力。回歸後，我和香港科學會及其他許多工業界的團體和人士，不約而同地向董先生提出多種發展科技工業的建議。這些建議在某些用語方面或許有些出入，譬如說，“高增值、高科技工業”，“高新科技工業”，“科技工業”等，但有數個方面意見是一致的。第一是認為單純依賴金融地產業的經濟結構是不健全的，它使香港的經濟基礎變得脆弱。香港必須在發展服務業的同時，重建本土具有競爭力的高增值工業。第二，政府必須效法先進國家和地區，積極促進和扶持本港科技工業的建立。第三，政府對科技工業發展的支援，應因地制宜以推動“中游”研究和開發為重點。第四，加強香港與內地在科技方面的優勢互補，互相合作。我們高興地看到，在過往一年間，董先生是很認真地對本港的科技工業問題作出研究和決策，成立由田長霖教授為主席的創新科技委員會是重要一步。第二份施政報告使我們看到，政府已認識到，“創新與科技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很明確地宣布香港“現在要做的，就是加強科技發展的支援，盡量匯聚優秀的科技和創業投資人才，以及鼓勵建立更多以科技為本的企業”，而更長遠的目標，是把香港建成“華南以至整個亞洲的科技創新中心”。

主席，把前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扭轉為以“創新與科技”推動本港工業發展及其他行業優化的新政策，我認為是香港經濟政策的重要轉變，可

以說是謀求本港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策略。對此，我們應給予積極的評價。

主席，容許我在此順道談一談由田教授所領導的委員會，其英文名字是 "Chief Executive's Commission 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中文是“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我想指出兩點：第一，科技之前是沒有“高”這個字，這是恰當的。第二，在中文名字方面，創新與科技之間欠了一個“與”字，這是關鍵所在，而這個“與”字表示了創新和科技是並排的。我的理解是，我們鼓勵創新，因為創新才可導致高增值產品，而在工業範疇方面，一般來說，創新是離不開科技，這意味着要幫助科技含量高的工業發展，同時應促進現有工業提高科技含量，而不是為了追求高科技而搞高科技工業。這即是說，我們不是鼓吹搞巨額投資或特高風險的科技，例如衛星、納米科技（即十億分之一的晶片）等這一類尖端科技工業，而是有促進相當科技含量、有良好市場潛力的產品。舉個現實的例子，我們希望促進更多像以香港為基地，從無到今天產值數十億的液晶技術這類產品出現，也希望傳統工業如製衣、機械等，多用新技術，提高產品質素。此外，我還想指出，施政報告披露了這一新的政策將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 它傳達了香港特別行政局政府重視創新與科技這一信息，將有利於吸引國際上的投資者、企業家和科技人才來港施展才華，為我們的科技工業注入養料和動力。

主席，作為來自高等教育界的議會成員，我順道在這裏談一談高教界所能扮演的角色。在過去 10 年，香港的高等教育在量和質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政府增加了研究資源，儘管這些資源有限，但是香港的研究在嘗試確保教育水平的同時，在這數年來是有可觀的成績的。去年英國科技署的一個世界各地研究概況研究顯示，在由同儕評估的學術文章 (peer review) 方面，香港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在 1996-97 及 97-98 兩個年度，我們 7 所院校正在培養一千四百多名碩士及博士學生。近年來，每所學校都有同事在不同領域做出有廣泛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每年都有不少同事接受大型國際會議邀請作主題演講，也有不少同事獲得有關中國或國際科技的獎項。去年，香港便有一個化學家被中國科學院選為院士，也是中國目前最年輕的院士，他的研究絕大部分是在香港的實驗室裏進行的。這個現象說明，我們的科研已慢慢進入收成期，也惟其如此，我們才有信心說，香港的高等院校已可對香港發展科技工業提供有力的支援，可惜公眾暫時仍未瞭解我們的情況。然而，科技領域十分寬廣，香港 6 所有理工科的院校是不能將之全部覆蓋，再加上目前我們的理工畢業生比較多傾向從事難度低，表面上所謂“回報率”高的行業，所以我們須引進不同層次的海內外人才。這份施政報告提出成立的應用科技研究院，其實也擁有很多好的工業人才培訓功能，它的設立將會把工業與大學更有效、更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因此，長遠來說，隨着香港的科技工業的發展，一定會吸收越來越多本地理工畢業生投入工業，從而步入良性循環，又更進一步推動工業及高等教育加促發展。從這個意義來看，引進人才

不應看作是搶走我們畢業生的飯碗，相反應看作是製造更多就業機會，這也是任何科技工業地區常見的事。台灣的科技工業起飛，便是離不開引進美國華裔科技企業人才。

提升人口質素

主席，香港能有今天的繁榮，人力資源是一項重要因素。香港必須不斷提升其人力資源的質素，培養和招攬一流的人才，才能使香港在被稱為知識經濟時代的下一個世紀，能有持續的發展機會。我們一定要辦好我們本地的教育，以保證本地人口素質的提高。

主席，在支持施政報告提倡增加基礎教育經費，發展優化教育的同時，令我感到遺憾的是，這份施政報告對與本港高新科技發展和各行業優化有直接關係的高等院校的支援，十分不足，在財政上對大學的支持一減再減。先是 1998-2001 年逐年削減 7 所大學經費的 10%，理由是大學發展需要有一個鞏固期。大學發展的鞏固與經費的收縮拉上因果關係，這本身便很費解。不久之前，政府又凍結大學學費 1 年。為了紓解民困而凍結大學生學費，政府的原意雖好，但大學因凍結學費而出現的經濟短絀，政府卻未承諾撥款填補；若不填補，恐怕要拿預留給發展卓越學科領域的經費來墊支。這種拆東牆補西牆的做法，絕對是不利於大學的發展，還會令我在上面所談及，高等院校在近年來努力力爭上游所取得的好勢頭，不能持續。

主席，我誠懇希望政府在未來的一年中，認真檢討大學教育投放資源的問題。香港經濟能否盡快復甦，香港能否保持既有優勢及成為華南以至整個亞洲的科技創新中心，在相當程度上是有賴於香港高等院校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健康發展。

可持續發展

我們很欣賞董先生在施政報告中帶出可持續發展的觀念，但他卻沒有說出政府的實踐決心，如減少填海、推動再生能源的使用等。他在“生活質素”的觀念下提出可持續發展，會令市民以為它是一般的環保策略，因而忽視了它根本的總體政策位置。可持續發展是基本的發展策略，包括：環保、經濟發展、社會政策、地區合作、文化適應等策略。在一些歐美國家，可持續發展是定在基本國策的位置上，例如在比利時，可持續發展是由聯邦政府的可持續發展局統籌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社會在保障發展潛力和確保能夠宜於公民居住方面的最終決定因素，現在很多國家都將它算入基本國力之內。香港不容處於被動，否則便會讓鄰近地區超前，削弱我們的競爭力。

主席，可持續發展要有地區合作概念，香港已經回歸中國，特區政府更有必要與鄰近省市緊密合作，必要時還應起帶頭作用，多作些承擔。

上周三，我曾在這個議事廳內提出有關“香港的可持續發展”議案。上述議案得到會內各位議員的高度重視，並獲得同事一致支持通過。十多位議員的發言，對政府現正進行的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意見，但在那次會議上，我對政府有少許失望，因為在政府官員席上，我只看到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梁寶榮先生孤苦伶仃地坐在那裏。他向我們作了很好的回應，而且我看到該局的施政方針是準備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制訂政策的考慮因素。不過，我感到只有規劃環境地政局的官員出席立法會關於可持續發展的辯論，會否是暴露了我們特區行政機關的冷漠或封閉呢？很多高層決策官員至今仍把可持續發展看成一般環保問題，沒有認識到它其實涉及多方面的問題。與先進國家、地區相比，政府這種表現是落後於世界潮流的。故此，今天不得不補上這個按語。

總評

主席，回顧香港回歸，特區成立後這一年多以來，確實遇到了很多災難、困境和挑戰。金融風暴是其中最大的危機，還有禽流感、新機場癱瘓等，造成這些問題固然有外在的原因、有歷史的原因，但也有因為是當政者的決策失誤或執行政策不力而造成的。我想我們今天在討論第二份施政報告時，應把香港特區政府過去 1 年的表現及施政報告的策略方針，放在這個大背景上檢討。

主席，我想香港能否“轉危為機”，關鍵在於能否吃一塹長一智，能否經過這場金融風暴的洗禮後變得更聰明，在全球一體化的經濟中變得更能知己知彼。

主席，我們能否做到“羣策羣力”，便要看看董先生的領導班子 — 政府官員 — 是否虛懷若谷，既能擇善固執，亦能從善如流，避免自視過高，正確對待自己工作的成績與缺點，主動樹立官民的伙伴關係；只有這樣，才能讓廣大市民有參予感，才能令大家發揮主人翁的精神，共度時艱。

主席，對於本會數位尊敬的同事就原議案所提出的 3 項修正案，我並未敢苟同。原議案只是一個中性的議案，同事對施政報告有不同看法，實屬正常，也在這次辯論中充分表達了，我實看不出有任何必要對一個表現禮貌的議案作出修正，而這亦恐怕是無助於改善大家這麼強調的行政立法關係。

我很高興聽到剛才何俊仁議員說對政府的批評是絕對善意，我希望他們能多走一步，把善意化為行動。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主席：馮志堅議員。

馮志堅議員：主席，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對金融服務業着墨不多，只是重申了政府對金融業的主要方針和政策。這些方針雖然正確，但缺乏深入闡述，因此，我的發言將稍為具體一點，談及對這方面的看法和建議。

施政報告提出會致力保持香港作為亞洲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和我國主要集資中心的地位，同時申明會繼續保持金融服務業體系自由開放。這兩大定位的方針和金融體系繼續自由開放的政策，我認為除了必須從建立完善的監管制度與之配合外，也要充分考慮市場、產品的發展，本着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原則，市場的發展應與從業員的水平及投資者的素質相適應，尤其必須顧及香港整體經濟的適應能力和承受能力，特別是衍生產品的推出，更必須穩步而行，在品種、規模、節奏方面均要有所控制，因為過去經驗說明，盲目追求市場排名，搶先推出新品種，急於求成，也容易陷於短期行為而缺乏對長遠利益的考慮。試看周邊市場過去數年互相競逐，情況劇烈，有些百年老店一朝敗亡，有些國家更被迫關閉市場。前車可鑑，不可不慎。

金融業是香港經濟支柱，我完全贊成行政長官提到我們要以美洲的紐約、歐洲的倫敦作為我們努力達到的目標。事實是，香港雖然號稱國際金融中心，但在國際金融市場的整體地位和實力，實際是不算很高。香港股市雖然排名世界 10 名之內（去年曾一度排於 6 名內），但總市值、規模仍然遠遜於紐約、倫敦和東京，只等於紐約的一個很小比例。數個對沖基金，只要稍為對港股市場興趣大一點，便已經可以興風作浪。政府 8 月入市反擊，全靠實力及地利、人和，試想如果少些彈藥，港股市場完全可以被他們“搓圓擦扁”，“話要幾低就幾低”，這便是市場力量嗎？這便是自由開放嗎？所以，當我們推銷香港金融中心時，實在應該務實一點。

我認為香港金融市場仍要維持高度開放，但不是中門大開；仍須維持高度自由買賣，但不能形成操控，變為炒家的提款機。這裏涉及加強監管，完善法規，某些產品要改變一下遊戲規則，當然，也不能矯枉過正，扼殺了正常的市場營運和拓展。

經過政府入市之後，我們的市場經營者和監管者都可以冷靜地重新檢討

一下。我在此提出下列數點建議：

(一) 檢討金融監管架構

鑑於香港金融市場各個部分多年來都有了很大的發展，使我們贏得了國際金融中心的稱號，但目前的監管架構顯然是落後於市場的發展。在財政司司長之下，缺少了一個負責制訂發展策略及路向、統籌全局，協調進行整體市場監控的機構，所以才會出現證監會負責人說，“由於只看到股市、期市，所以不知道是否有操控的行為”的情況。由此可見，這樣一個機構看來是必不可少，由這個機構領導及監管證監會、銀監處，以至債市、外匯基金等，方可避免要交由行政長官直接指揮的局面。另一方面，目前因應市場發展，已有多個結算所在運作，資金流向不容易及時監察，不利於維護聯繫匯率。所以，我亦建議數個交易所的結算所之間應該設有一個跨市場的監控機制，最終實現一個或兩個結算所便足夠。

(二) 加強監控衍生產品

在保持香港金融服務體系自由開放的同時，應盡速檢討本港衍生工具發展過速及數量過多的問題。本港衍生工具之多是全球前列，美其名為風險管理中心，但市民和一般投資者卻對其缺乏認識，也很難說證監會和財金官員對其有透徹、深入的認識。因此，這些衍生工具的發行及運作，往往與推出的用意相反，投資者極少將之用作套戥，反而是將之用作肆意衝擊金融市場。所以，檢討衍生工具及加強監控，是刻不容緩的。我曾多次公開提出，期指結算須引入現貨交收機制，以現貨制衡期指交易，使其真正體現期市和現貨市場的套戥功能，不致令期指市場淪為賭場。當我提出這個建議時，立即有人問世界上哪個市場有這樣做？美國市場是否這樣？我很懷疑這些人如果不是只覺得月亮是外國的圓，便是毫無誠意探討問題。

(三) 推動和加強國際合作

香港在 8 月獨力反擊國際炒家，是基於當時形勢危急的背景。我們要爭取更多國際間的諒解和支持，而行政長官及財政司司長已在這方面做了大量游說工作。可幸的是，美國長期資本出事，美國聯邦儲備局也赤膊助陣，以救城池之殃。我知道國際間對這些龐大的熱錢，以及複雜的衍生產品對金融

市場所造成的波動已研究多年，可惜一直沒有甚麼共識和措施，實際上是變相縱容及姑息。因此，香港必須呼籲和促請國際社會重視監管短期的大量資金跨國跨洲的急速流動，促成國際社會建立金融新秩序。

(四) 積極培訓人才

人才培訓是必不可少的，而香港亦具備了充足條件，因為有不少國際上有名氣的投資機構均在香港參與投資活動，他們帶來了現代財技，而歷年來亦為本地培養了不少人才。培養金融專業人才，我們要更積極一些，力度大一些，政府也要給予多一些支持，方可提高本地金融服務從業員的水平和素質。各業界團體、專業機構亦須努力，大力倡導監督業界自律守法經營、大力倡導高尚職業操守、提高我們的形象，使香港成為名符其實的國際金融中心。

主席，金融風暴對初生的特區政府是一場嚴竣考驗，特區政府的表現，也頗有值得檢討的地方。以今年 4 月發表的金融檢討報告為例，我對該報告是極為失望的。這份報告顧左右而言他，對國際炒家操控市場的現象視而不見，隻字不提，根本無打算杜絕、打擊操控市場行為的決心。檢討報告也暴露了政府在信息掌握方面的問題，以及在跨市場信息溝通方面的問題，以至個別監管者對事物有不同取態和不同立場。由於信息混亂，監管者、經營者立場各異，政府高層決策者未能及時掌握市場的關鍵及癥結所在。這份報告非但沒有揭穿炒家操控市場的技倆，反而像送了隱形藥給賊人一樣，為他們壯膽。結果，國際炒家更覺操控無罪，蹂躪有理，進一步大舉累積期指和現貨空倉，七、八月間再利用輿論工具，揚言恒指要見 5 000 點、匯率要見 100 元、樓價要在當時水平再跌四成、人民幣要貶值、港元要棄守聯匯，企圖一鋪反轉香港。

面對國際炒家在匯市、期市、股市的立體式進攻，特區政府竟然突然獨具慧眼，亦狠下決心，以內地軍民抗洪的魄力，全線反擊。內地抗洪築起的是血肉長城，香港金融抗洪築起的是血汗長城，“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港人多年累積的血汗錢已被蒸發不少，如再不迎擊，恐怕後果更難想像。經此一役，使人認識到特區政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結果化危為機。

政府入市的英明果斷，加上隨後國際市場的多種演變，尤其美國及歐洲市場局勢的變化，都有利於形勢的轉化，有助提高港人的凝聚力，所謂“過街老‘虎’，人人喊打”，不斷提高我們的信心，維持我們市場的健全運作。我敢說，真心實意來香港投資的海內、外大小投資者，都會讚許、支持我們政府這次的入市行動，我們金融服務界絕大多數從業員由入市第一天起便拍

爛手掌。只有那些恃着財雄勢大，以為自己是國際金融警察，到處操縱市場，藉着舞高弄低、巧取豪奪以圖利，頻頻到處“擦機”提款的老虎大鱷，才會咬牙切齒地一面哀鳴，一面詛咒。

從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的 10 月 7 日起到今天，股市已在國際炒家大“冚倉”盤(short covering)、基金重新追貨盤等推動下，創出多月來的新高，恒生指數已近萬點。當某一些人、某一些輿論尚在嚕嚕嗦嗦地說施政報告“有料到”、“有實質措施”的時候，中長線投資者已用他們的真金白銀來投票，而造淡拋空者已經高舉白旗投降。樓市亦已穩定下來，交投轉趨活躍。樓市是香港經濟支柱，與金融服務業息息相關，兩者皆好轉，這反映了甚麼？不就是危機漸過，生機展現嗎？

猶記得在 8 月 28 日一個酒會上，很多記者圍着我問：“政府這樣大舉入市買股票，將來怎樣套現、脫身？”我當時反問他們：“點解你哋唔問我，那些沽空大量股票的炒家如何買得番，買到甚麼價！”可惜，翌日的報章並沒有人報道我所提出的反問。政府入市，正如我當時在一座談會上所說，是“BUY TIME”；我們為穩定市場、穩定人心，爭取到時間，贏得時間。時間對炒家是不利的，他們已等不及、不耐煩，因恐懼而須冚倉，所以越冚越高，越高越要冚。由於市場被操縱得不合理的低，現在便有不合理的高，只要能取得時間，休養生息，我們便能使一些改善經濟的措施逐漸見效，更快走出谷底。所以，如果有人要求施政要立竿見影，那便是不切實際，也是對施政報告的苛求。

當然，我們不要自滿，我們的經濟仍在困難時期，我們的財政司司長也不要因過於開心而說溜了嘴，免得給大鱷有機可乘，反咬一口。例如，他為何那麼坦白說出“所買股票現時不會賣出”之類的說話？過去，為了遷就一些披着投資者外衣的投機大鱷，市場強調透明度，結果被他們全部數出我們的“花”，但對手的情況卻毫不透明。這便是公平市場嗎？我並不反對提高透明度，但要一視同仁，要透明則須一起透明。有人一面要政府公布持貨量，但卻大力反對要大戶公布恒指期貨持倉量、沽空股票量。這是公平嗎？

主席：馮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昨天梁耀忠議員在辯論中說他是個教師，難免要對施政報告打個分數。我也是個教師，而且教的是政治學、行政學、政策學，也難逃染上、且經常自嘲已經患上了的這個教師職業病。

主席，平情而論，這份題為“羣策羣力，轉危為機”的 1998 年施政報告

是及格的，雖然標題有點不合邏輯，羣策羣力便必定可以轉危為機嗎？這點我想不通。這只不過是善良的主觀願望而已；又雖然結語內提到“奮勇抗洪”，但我的意見明顯地與馮志堅議員很不同。我認為這比喻有點不倫不類，難道要香港人民像人民解放軍一樣，在一聲軍令下，築起血肉長城——當然是血汗長城——堵塞缺堤嗎？在自由經濟體制下，雖有金融風暴衝擊，但仍必須予民自由，而政府的職責則在於事前的防範和疏導，以及事後的善後和重建，而不是要人民忘我無私，共同支持香港有限公司。我們要知道，在一個民間社會之內，忘我無私必須是民間自發的，否則自由經濟體系轉眼間即變為指令經濟。

主席，雖然標題不合邏輯，雖然結語不倫不類，又雖然施政報告內容未能包容我或其他議員心目中認為是急須實施的政策，再雖然施政報告內的某些政策，我或其他議員並不贊同——而提出修正案的議員當然是不贊同有關政策，例如區域組織的改革及其他很多事項。有關這一切一切，各位議員在辯論中——無論是支持或反對致謝議案——均已表露無遺，但我仍然認為施政報告值得及格的分數，主要是因為相對於 1997 年的施政報告，1998 年的施政報告是大有進步的。

主席，1997 年的施政報告以“共創香港新紀元”為題，雖然也有具體內容，但總的來說，是一份“假大空”的施政報告，傾向於藍圖式的社會工程，傾向於以為在政府帶領下團結人民，在多個發展矛頭上設立委員會、撥款成立基金，香港便可以進入美好新世界了。今年 1998 年施政報告便平實得多了，較像港英時代的施政報告。不過，我亦要指出，仍須慎防“大政府”的傾向。今年較為平實的作風，可能只是由於經濟低迷、前景暗淡。雖然現在是如馮議員說，差不多趨於平穩而且形勢大好，但在這形勢下，“假大空”再難令人心服口服。無論如何，這份施政報告仍有不少“假大空”的影子。第 65 段所述的國際顧問委員會，究竟有何作用？是董建華先生的國際朋友聚會，抑或只是具有鹽水為實質的所謂強心針呢？

主席，在眾多議員的發言中，我最為欣賞昨天吳靄儀議員的演說，她字字鏗鏘，擲地有聲，我建議議員和市民加以細讀。我個人完全贊同她的意見、批評和建議，也完全同意她說“本會不應吝嗇(grudging)對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致謝”。她並沒有為這份施政報告打分，因此我不知道她認為是及格與否。

不過，主席，無論怎樣——吳靄儀議員在搖頭——我仍然叫大家不要吝嗇對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致謝。主席，多年前當吳議員剛從美國唸完哲學博士學位回港，她曾對我說，她有一位教授——如果我說錯，請吳議員容後更正——這位教授對學生的論文打分數的方法很奇怪，他容許學生在科目之內的範圍自訂題目，收到學生論文後便召見學生，問他們論文內是否

具有一個“問題”(Problem)。倘學生說沒有，他便把論文發還予學生，要他重寫。倘學生說有，他便問是甚麼問題，如商談後發覺不是問題，亦將論文交還學生，要求學生重寫。倘學生能釐清問題，令他滿意，他便問這論文之中究竟有否包括“解答”(Solution)。倘學生說沒有，他也將論文交還學生重寫；倘學生說有，他才開始細心閱讀、審批這篇論文。當然，我所論述的這個過程是過分簡化了，但這位教授並非完全不和學生討論論文。不過，以這位教授的“問題 — 解答”(Problem - Solution)的評審方式來看這份施政報告，吳靄儀議員可能會打出一個不及格的分數，我應該是猜對了。無論如何，她仍不吝嗇向行政長官致謝，因此，我呼籲各個提出修正案的黨派，倘若 3 項修正案都不獲通過，請不要吝嗇支持致謝議案。

主席，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是在去年 10 月在臨時立法會宣讀的。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對該份施政報告是不以為然的，主要是反對它所涵孕的一些有為的管治哲學、大政府的政治哲學，對於施政內容，我亦持有不同見解。可是，當時我在辯論中，只是讀出了一位評論家洪清田先生的文章，當時我是完全同意它的內容，現在也仍然同意。我亦說出我同意當時馮檢基議員修正案的內容，但卻沒有支持該項修正案，而且最後仍支持致謝議案。

主席，當時我說：“我感到施政報告的辯論，向行政長官致謝是一種禮貌的表現，是一定要遵守的……”。這兩句說話並不能代表我全面的看法，因此須在此加以澄清。夏佳理議員剛才說，致謝議案是一種禮貌，所以不能支持修正案，又說議員倘若不贊同施政方針，大可以在最後表決時否決致謝議案。梁智鴻議員昨天動議時說不能容忍，他用的字是"Condone"，究竟是容忍、原諒，還是接受？我希望他用的是"Support"，不能接受這些修正案，因為此舉將會在一項無方向(Non-directional)的議案上加上方向(Direction)。這種說法，與剛才吳清輝議員所說這個議案是中性的，意義大致相同。

主席，我的看法和夏佳理議員的看法較為相近，但不盡相同。無疑，致謝議案是禮貌的表現，但並不表示不能加以修正，甚至否決。《議事規則》不容修正致謝議案的公式字眼，只容在公式字眼之後加上字眼加以修正，這便是禮貌的表現。我個人認為修正案是直接地或間接地在無方向的議案上加上方向，這是議會意志的表現，是天經地義的。因此，我不能接受梁智鴻議員的觀點，即加上了方向便是不對。

主席，我去年不支持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是因為該項修正案只是間接地提出與施政報告不同的另一方向，說未能做到甲、乙、丙、丁等項政策，因而感到遺憾。我個人認為遺憾式的修正案，與致謝議案的精神是不符的。

因此，要合適地表達遺憾，便是否決致謝議案。

主席，基於同一理由，我不能支持李卓人議員、陸恭蕙議員和李柱銘議員 3 位的修正案，雖然我是完全同意修正案的內容。事實上，我認為這份施政報告仍未能盡善盡美，但我給了及格分數，這並不表示不可以加上一些東西。我只不過認為遺憾並非一個合適的表達方式，我們應該直接表達，例如從請(urge)行政長官“撤換行政會議的班子”（這只是假想）或押後甚或取消實行區域組織改革等。否則，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否決致謝議案，而不是以一個修正案方式表達本身的意見，因為在辯論之中，我們已經可以將意見表達無遺。

主席，官場內有些人已經在說這些修正案是民主派議員在“玩嘢”、玩弄把戲，以後應該加以限制。有人說不如把致謝議案的公式字眼照抄《基本法》字眼，變為“本會聽取政長官的施政報告”，又有人說不如把《議事規則》修訂，說明不容修正致謝議案，更有人說不如兩者兼施，即同時將之轉變為聽取，然後不容修正。我認為這些意見完全是無聊的，因為倘若大多數議員對於施政報告不滿，即使在施政報告辯論之中不能以議案方式表達，也必定在以後其他會議上表達出來。屆時，這議案所表示的可能不單止是不滿，甚至可以是遺憾、譴責。

主席，現時行政立法關係緊張，是否正是源自行政當局（最少有部分人）的思維不清，處處設防，步步封殺？我但望行政當局諸君，包括行政長官本人，一思、再思、三思。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梁智鴻議員的議案。

主席：陳智思議員。

陳智思議員（譯文）：主席，董先生於 10 月 7 日向本會發表的報告是具建設性的 —— 正確呈現了開拓創新科技的漫長而磨人途徑。他徹底檢討了我們的經濟困境，指出了我們的一些長處，讓我們看到能在這個基礎上重建我們關鍵性的經濟局面。董先生談到每一方面的事務，但公眾人士似乎沒有值得慶幸的理由 —— 也許他們對董先生語重心長的呼籲未覺感動。

董先生開列了若干使經濟復甦的關鍵性基本因素，卻顯然遺漏了一項重要的因素，這便是眾人對政府的信心。

缺乏立即挽回經濟走下坡的方法，要擊敗社會上隱伏的悲觀情緒，唯靠啟迪與遠矚 — 揭示本港社會正步向更健全的經濟和更全面的發展。董先生談論創新與科技時，我們已渴望知道能製造哪些產品，到哪裏延聘專家，怎樣促動投資者及怎樣為我們的學子裝備起來。可惜，我失望了，施政報告在這數個重要方面完全緘默了。

政府過去一年來的表現，使商界對領導層的才幹認真關注。很明顯地，政府言論的力量正在減退。曾受市場利率波動嚴重傷害的銀行繼續收縮信貸及抑制新計劃。政府決定走向新科技，卻未帶動向從未起步的科技事業提供信貸。許多中小型企業的情況亦相同，未能從 25 億元貸款計劃獲得資金。在對金融市場信心薄弱及借貸維持收縮之下，營商環境難以在短期內改善。

明天會更好的信念是進一步投資所本，這點是絕對清晰的。投資者必須信任政府及其政策分析，以及相信形勢的發展一如政府所預測，才會注資入市。

我抱歉地指出，董先生領導的政府經歷了去年一連串政策失誤後，正面對嚴竣的考驗。雖然我們有優良的行政制度、強大的財政儲備以及高度廉潔的官員，政府的緩慢反應及錯誤估計導致新機場開幕、病菌控制及金融市場等方面出現大混亂。

我明白到，我們的政府素有最少干預及多方面採取自由政策的傳統。但是，事實上，自由政策不是四海皆準完全通用的理論，這套理論現時正遭受嚴厲批評。要順利實施政策，必須能掌握形勢，準確監測公眾情緒。

例如，為了推動經濟復甦及提高競爭力，政府應考慮全面減低租金、差餉、水電煤收費、稅項及薪金成本的整體計劃。過去多年來，員工成本一直和生活指數同步上升。全面扣減代表以最溫和的方式貶值，有助我們和區內其他競爭者競逐，這些競爭者剛好經歷了痛苦的貨幣貶值。要成功實施扣減計劃，必須能謹慎地計算，作出有力的政治游說以及有效地使民意轉向。

令我失望的是，政府一直無力處理民怨。家禽飼養業及販賣業、漁民及股票持有人都是在上街示威後才獲得政府援手。我不是說援助沒有理據，而是擔憂政府無法平息民憤，終至引進依賴的文化。如果這樣，我們的經濟競

爭力會遭受損害，會引人關注到政府的力量只在強大的金錢儲備而不是行政能力。

與其對社會上不滿的聲音作出消極反應，政府應負起更積極主動的角色，以改變經濟及政治形勢。如果我們的官員有足夠的敏銳觸覺，能洞悉先機，辨別問題所在，則應於形勢變得難以控制之前採取預防措施，以填補現行制度與法律的漏洞。

我期待政府牽頭創造更有生氣的社會氣氛，以明顯的領導才能激勵羣眾。

我亦期待董先生下定決心，一如他在施政報告中歌頌可持續發展概念時一樣。這個概念仍未立法成型，亦未有動員社區資源、經濟誘因或道德期望作配合。

可持續的發展是一套整體計劃，影響環境保護、土地使用、交通、污染控制、循環再造的活動、動植物品種保護等。如能推行計劃，當可製造投資機會和新的職位。

舉例來說，循環再造居於現時政策清單上的低位。人們只看作收集廢物的一環。許多循環再造廠房均正移至中國大陸，以減低運作成本。把本地供循環再造的物料如紙張、玻璃、塑膠及金屬運過邊界，再帶回來循環再造的物品，是極缺乏成本效益的。

採納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我們可考慮透過正確的研究和大量參與，把循環再造引入高增值行業。社會服務機構可協助動員弱勢社羣從事收集及把可循環物料分類的工作，給予恰當的報酬。工業設計家可把創意注入循環再造產品。此外，又可向循環再造業東主提供稅務及土地優惠。

政府若真正支持可持續發展，須採取較激進的步驟。政府可參考德國的“累積綠分”制度，向從事綠色事業的公司給分。出售包裝產品的公司，除非它們支持循環再造商收集已棄置包裝，否則須以付費形式負起“棄置責任”。生產高科技綠色產品的公司亦應該在財政上獲得激勵。

本港社會帶來的大量固體廢物，對本港的未來造成重大的威脅。我相信在公私界別同心合力之下，可以提高綠色醒覺。在建立本港綠色文化方面，政府必須擔當不可缺少的角色。

主席，我支持原議案。

主席：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相信其實大家都很明白，我們今天的議案辯論是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這是我們議會的傳統。3 項修正案其實都保持了這個禮貌的傳統，但更實質的是討論。我們這麼多人坐在這裏兩天，應該是要看看施政報告的內容，一起檢討過去 1 年的得失，認真探討為何香港去年做得不夠好，日後才可以避免。我相信這不單止是行政長官的責任、我們議會的責任，而香港人是更一起須檢討的。因此，我會贊成修正案，不會支持並無提出須進行檢討的原議案。

首先，我要看的是民主進程。行政長官在兩個半小時的施政報告內，花了 1 分鐘談民主進程，那便是跟隨《基本法》的規劃說完了便當作了交代。其實，行政長官有否看到，民主政制與市民信心是有着很大的關連，是值得我們多花心思、筆墨認真檢討的呢？

事實上，施政報告和 3 項修正案均有提到信心問題。市民的信心確實很重要，如果大家都沒有信心，萬事都不積極參與，香港便會停滯不前。可是，信心又從何而來？

好景的時候，外圍因素好，其他競爭對手弱，信心自然容易保持。可是，我們現在身處逆境，面對的可能是全球性衰退。這時，我們的信心並非是評估客觀形勢，亦不是等待外圍因素好轉，而是看看我們自己本身是否有實力，以及是否有機會體現自己的力量。不過，香港不是每個人都有渠道發揮最高能量的。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的題目是“羣策羣力”，但我們知道，香港的決策是由一小羣人負責，行政長官也是由 400 人推舉產生，而非由我們 630 萬名香港市民投票產生的。在制度上，行政機關完全無須向市民負責，但是如果要管治好香港，必須團結 630 萬人的力量。可惜，普羅市民無份決策，他們的角色只是被人策動去發力，如此這般，與一頭被人綁起來耕田的牛又有甚麼分別呢？試問他們對自己的將來怎會有信心？信心是源自有份參與決定，以及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將來，所以，推行全面直選是令市民對政府、對將來有信心的方法，因為如果我們自己有機會作決定，便會全力支持。

民主是否萬金油，得視乎那病人身體的虛弱情況，看看是否真的大病小病也可以藥到病除。不過，專權肯定是一塊山埃，是削減市民對自己信心的山埃，是除了有權在手握着不放的人外，沒有其他人肯吃的山埃。可是，政府最近做的不單止沒有加快民主進程，讓市民可以體現民權，反而取消了兩個市政

局，馬上收權，堵塞市民參政的渠道。在放權方面，政府是連準備檢討也不肯，但說到收權，便“話都無咁快”。對一個這樣專權的政府，市民是不會有信心的。所以，我請行政長官認清楚民主政制及信心的關係，請政府盡快展開檢討香港民主進程的步伐，推動討論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及架構，為香港進行全面直選作好準備。董先生的任期在 2002 年便會屆滿，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打算連任，但根據現在產生行政長官的制度，哪個連任，哪個出任，我們香港人也不可以作主。所以，如果董先生不在他任期餘下來的時間盡快展開這方面的工作，到他離任時，只留下殺局的成績給香港市民看，那麼在民主進程這方面，不單止是交了一張白卷，還要倒扣 30 分。這樣，到他任滿時，便怎麼也不可以說自己是無愧於港人了。

接着下來，我要檢討的是香港的經濟問題。近兩個星期，外圍因素轉好，美國聯邦儲備局兩次減息，恒生指數回升，樓市交投亦好像暢旺了。這是否便等於經濟復甦呢？（也許我們應問一問庫務局局長，看看股票印花稅收了多少便知道。）其實，我們內部基調並無好轉，失業率仍然是 5.2%。我們上次見董先生時，他說估計年底會達到 7%。我們一連兩季出現負增長，是 13 年來的第一次，“打工仔女”依然是生活在裁員、減薪的陰影下，公司說要減薪，一開口便是一成。如果我們最近看到恒生指數及樓市稍有好轉，便覺得經濟復甦，這是過分樂觀。相反地，我覺得我們要很小心，最近的所謂“小陽春”，其實是否最後一個泡沫？是否像我們燒傷手之後所起的水泡？如果連這層皮都穿了，便會更痛楚。經濟復甦，其實不可以被動的等外圍因素好轉；我們亦知道不可以單靠樓市股市。事實上，我們現在須很認真地着手重整經濟結構。

香港天然資源匱乏，製造業外流，不單止是北移，還去了很多比國內更廉宜的國家。行政長官自上任以來，一直強調香港應該走高科技、高增值的路線，這點我們並不反對。今年，行政長官更撥款 50 億元，投資科研。

如果以投資高科技作為振興香港經濟的唯一出路，是很有問題的。我們看看美國，出名的微軟電腦軟件公司，其業務令 Bill GATES 成為美國數一數二的巨富，其公司股票每天在華爾街的成交量差不多等於香港股市每天的總成交量（政府托市那天不算），但微軟所聘請的員工只不過是 15 000 人左右。然而，美國和香港一樣，因為製造業，例如汽車、飛機製造業等外移至亞洲等國家，失業人數不斷上升。如波音飛機的全球僱員有 23 萬人，但留在美國本土的則不到一半，因為很多工序都遷往了第三國家。雖然美國人所享用的消費品的價格，簡單的由衣服、鞋襪，以至電器、汽車，均因為海外勞工廉價製造而持續下降，但他們的就業機會亦隨着工業外流而繼續下降，結果是

貧富距離越拉越遠。軟件開發人員和金融界的從業員收入確實上升，但藍領甚至中層管理的白領則收入減退，縱使物價低廉，但大部分人的生活質素卻大不如前。

難道美國不夠大學培養更多從事高科技行業的人才？其實，他們自七十年代電腦科技採用晶片以來，電腦產品大行其道。既然他們亦有足夠的大學培訓人員，為何仍然有那麼多人投身製造業，乃至今時今日失業呢？答案是：高科技行業其實不用聘請很多人；自動化的生產線不需要太多工人，有能力消費的市場亦因為生產力提高而接近飽和，消化不了高生產率帶來的所有產品，所以，市場只能接受數家具有雄厚競爭力的企業生存。

科研經費其實也不容易應付，有數家知名的電腦公司，包括 IBM 在內，便為了減低科研成本，協議共同研究製造記憶量更大的晶片。我們今天投資 50 億元進行科研，會否如泥牛入海？

香港今時今日才起步，但以重鎚出擊的姿態押下重注，其實是將我們的短處與別人的長處比拼。即使我們成功打開高科技市場一道缺口，又可以提供多少職位？我們更別要忘記，香港的五十多萬名藍領工人中，大部分仍未完成基礎教育。剛才有很多同事也說過，這些工人年齡在 30 至 50 歲之間，即使他們接受再培訓，也只可以轉到較為簡單的文職工作和服務性行業。對這些工人來說，高科技行業內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沒有製造業，社會根本不可以吸納他們。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檢討現時的行政措施，製造有利中小型企業的營商環境，從而增加本地勞工的角色。其中一個可能性，是檢討現有的配額申請制度。我希望政府可以很認真檢討這個配額制度，令更多中小型企業可以將生產線搬回香港，減低他們的經營成本，在香港聘請多些工人。

其實，香港最大的資源便是人。我們最有能力做、成本效益最高的投資便是發展人的創意，而新創意又可以成為高增值元素。我們看看樂高玩具，其原創概念是沒多少科研成分，只是將大小不同的塑膠配件嵌起來，演化為變化無窮的模型玩具，這便成了一個很重要的玩具企業。行政長官也說知識為本，發展教育肯定是有回報的投資。可是，我希望我們的教育除了是傳遞科技知識外，還會着重香港的人文精神，需要想像力及創作力。所以，我希望政府加強中小學的美育課程，在教育政策上，以釋放學生的想像力為目標。我希望我們的學生，將來可令香港成為產品設計中心，為傳統製造業加入消閒玩賞的元素，更可吸納我們固有的熟練工人。這是我們在發展高科技之餘，必須同時走的方向。

可是，這同時亦指出行政長官是有他的盲點的。培育創意，要有開放自

由的環境，鼓勵獨立思考，讓年青人挑戰權威。不過，批判性的思考，最後的挑戰對象可能無可避免地便是當權的政府。在這條防線，我們看到董先生是很有保留的。董先生有他的矛盾，他一方面希望年青人有競爭力，能夠從事高增值，但另一方面卻又不希望他們越軌挑戰權威。究竟董先生對年青人的要求是怎樣呢？

董先生在 97 年說，學生要懂得兩文三語、掌握電腦科技。他在今年再說，香港人以知識為本，適應力強，有多方面技能。我想問問，難道教育的目標只是為了製造一批“多功能記憶體”，將“人”變為生產單位？不過，行政長官不單止是在教育政策方面缺乏一個人文角度，就是在很多其他政策範圍，也是用金錢利益作為量度的標準。例如法治精神，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內指出，法治的目的是維持公平營商環境，但法治如何保障社羣，個體之間如何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如何保護個人的安全權利和自由，如反種族歧視、年齡歧視等，施政報告內絕對沒有作出承諾。即使是電影工業，董先生也只着眼於特技方面的發展，如果電影沒有劇情，我們不如玩任天堂。這一再顯示施政報告是欠缺了一個人文角度，如果我們萬事都是以經濟效益來量度，而不以人為本，結果人的價值便越來越低，我們絕對不想看見社會變成這樣。

在在顯示，施政報告是欠缺了一個人文角度。

在這裏，我們一定要說回社會服務，勞工因失業而感到羞愧自歎、最後可能演變為暴力發洩。可是，我們看回最近的新聞，許多悲劇都是可以藉着提供支援、關懷及輔導而避免的。對於這羣暫時無機會發揮生產力的市民，政府其實是須施以援手的。當然，我們可以謝謝行政長官加設了 29 個家庭個案輔導社工、增加了 23 個保護兒童的社工，但這些社工加起來的年薪，其實只不過是 100 萬元，與政府投進股票市場的金錢相比，真是“濕濕碎”。

我們看回政府對問題輕重的看法，以及排列優次序別的方法，可說是令人失望的。施政報告裏沒有以民為本，以民為先，對於這一點，我是深表遺憾的。

主席：楊森議員。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行政長官上任後提出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以“羣策羣力，轉危為機”為題，但整份報告中，行政長官在民生方面只是照顧大地產

商的利益，托着市場，但卻沒有理會民間疾苦，未有提出紓解民困的措施，讓小市民可共度時艱，這實在令人十分失望。

有關民生方面的問題，民主黨其他成員已經提出他們的意見。我只想集中討論有關政制部分，包括解散兩個市政局，以及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關係。

解散兩市政局 封民選參政機會

行政長官在其演辭中曾引述：“這次檢討區域組織的職能和架構，主要着眼點是怎樣提高服務效率和成本效益、精簡架構……以及鼓勵市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而他提出的具體建議方案，便是廢除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把這兩個局原先在處理環境及食物安全方面的職能，轉交給新建議成立、直轄於中央的決策局，再把兩局原先負責提供文化、康樂、體育服務的職能，轉交給另一行政架構。

這樣的安排，明顯是沒有在行政決策上精簡架構，只是將兩個市政局的全部職能及相關的決策機制，轉移至中央的行政機關，在行政機關下多開設一個政策局及另一個新設的行政架構。

施政報告建議的實際效果，是大幅擴張行政機關的權力，借此“殺局”，收回三級議會架構中，唯一擁有行政權力的民選議會的權力，打擊民主參政。

民主黨並非否定檢討地方行政架構。早於 1992 年 6 月 3 日，我曾代表港同盟（即民主黨的前身），在立法議會上提出檢討兩個市政局和區議會的議案辯論。當時的港同盟認為當時的立法局已全面取消委任議席，香港的政制發展亦應逐步走向全面民主參政，故建議地方行政議會亦必須取消任何形式的委任制，以及簡化架構。

在立法會和行政長官普選的大前提下，當時的港同盟建議可考慮把地方議會的 3 層架構改為兩層架構，即把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合併為市議會，負責管理地區事務。

以外國的經驗為例，很多地方都有把一些屬於區域性事務層面的職權，交由地方或區域性的市議會負責，以減輕行政權過分集中於中央而引致的一連串中央集權、行政紊亂、資源運用不當等問題，亦同時藉此鼓勵公眾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事隔 6 年，香港的民主進程不但未有向前走，反而往後退，民主黨對此

再一次表示極度遺憾。

反觀今天的政治環境，行政長官上台後，政制倒退，立法會有六分之一，即 10 個議席是由委任的選舉團產生，而兩級的地方行政議會均有為數不少，約 20 個議席不是由民選產生，而是經委任的議席，完全缺乏把 3 層架構改為兩層架構的基本條件。

另一方面，《基本法》在主權回歸後正式生效，當中又訂有限制議員提案權的規限，坐大了行政機構的權力，削弱了立法議會制衡行政機關的權力。因此，現時根本不是把 3 層地方議會的架構改為兩層的理想時機。

在一個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殺局”，市民日後便無法透過一個公平、公開的民選機制，推選代表進入議會，在區域性事務上制訂民意認受性較強的決策，這無疑是香港民主發展很大的倒退。

再者，今次施政報告提出的方案，其實不是把兩層地方議會合併為市議會，由市議會全權負責地方行政的決策工作，而是刪除具行政權力的兩層地方議會，把地方行政的決策權收回中央，與港同盟 6 年前提出的構思根本不能相提並論。與此同時，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把文化、藝術、康樂、體育政策交由不是由直接選舉產生的藝術發展局及康體局負責，令人不能不擔心日後的文化、藝術等政策，可能會受某一政治方向所影響，我想在此回應馬逢國議員，其實並非所有文化界人士都支持取消兩個市政局的。我亦想向文化界的朋友說，不要過早高興，因為由中央政府制訂的文化政策，雖然是會諮詢議會、諮詢民意，但中央政府主導的文化政策，與文化界朋友心目中的開放及多元化發展，恐怕會是背道而馳的。

區議會停留諮詢層面 政制停滯不前

另一點值得關注的是，行政長官在回應擴大地方議會行政職能時，卻以“若把某些行政職能下放予 18 個區議會，恐怕會使權責過於分散，有損效率”為藉口，拒絕增強區議會的職能，只重申其提供意見、反映市民心聲的功能。

這種解釋，處處顯現了行政機關根本不欲放權予民選議會的心態。從中可見，行政長官根本沒有為未來區議會合併成為市議會的政制安排作好準備——或許孫明揚局長回應時可以詳細解釋——反映出政府無意透過區域組織的改革，讓市民有更多機會參與地方決策。

事實上，行政長官的建議，進一步暴露出其行政專權的心態，以“重組區域組織”為名，扼殺民主發展空間為實，削弱由民選代表制衡政府運作的

議會能力。

行政機關獨大 立法會權力受削

主席女士，從施政報告的烏籠民主，我想談談現時的行政立法關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會致力改善行政立法的關係，建立互信互重的關係。不過，自行政長官上任後，行政立法關係並無改善，相反，行政機關處處限制立法會的議事及監察行政機關的功能。

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經常質疑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包括立法會議員投票通過議案時應否包括棄權票，以及直指立法會主席無權決定立法會議員所提的法案是否涉及公帑而要由行政機關決定等的荒謬言論。此等行為，在反映出行政機關很想削弱立法會的議事功能。為了改善行政和立法機關的關係，我認為行政長官應該走出第一步，即取消對立法會無理的壓制，不要對行政主導中毒太深。行政長官應尊重行政向立法機關負責的憲制安排，以及讓立法會保持議會運作的完整，包括尊重立法會主席的權責，而政府在提交議案時，必須對議會尊重。第二，增加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的次數，遇到重大的事故，先到立法會匯報及聽取意見。第三，行政與立法關係也要視乎政府用人的表現。最近，律政司聘用政策專員一事，已經引起了社會的疑慮。根據報道，市民基本上看到有關人士是有親中聯繫，不禁令人覺得，行政長官在用人方面，會否有用人唯親而不是用人唯才之嫌呢？

全面普選三級議會 制衡行政機關

目前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班子，缺乏民意認受，完全無須負上任何因政策失誤而帶來的政治責任。民主黨認為若再缺乏對行政機關有效的制衡，恐怕行政權力會越加膨脹。大家只要看看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就像是一個獨立王國。民主黨同意他們有自主權，但亦要求該局須向立法會負責和交代。這是立法會議員的憲制權利，立法會議員有責任監察和制衡政府。我亦順帶一提，民主黨會致力改善對有關金融機構及金管局的監察。

主席女士，民主黨認為只有在全面普選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的基礎上，討論重組區域組織架構才有意義。在現階段，政府應致力研究如何修改《基本法》及相關的法例，使立法機關、地方議會及行政長官可以盡快由全面普選產生，諮詢民意。

主席女士，政制民主化與經濟發展是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在此，我想回應劉江華議員。李柱銘議員並不是說經濟問題是因缺乏民主所引致，他主要想指出，民主與經濟基本上是相輔相成，兩者互相影響的。總結

來說，施政報告在改善民生方面是政策無力，而在政治方面則是民主倒退。這樣，試問又豈能“轉危為機”呢？

在此，我亦想到最近在馬來西亞所發生的事情，那便是下台的副總理安華的那雙黑色的眼睛，因為這件事是對亞洲價值的一個很大諷刺。十分重視亞洲價值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很強調亞洲價值，重視社會安定，但卻忽視民主人權。大家可以看見，在只圖發展經濟，忽視民主人權的國家，社會動盪基本上是指日可待的。

我在此再提出我對整份施政報告的感覺，那便是“政策無力，民主倒退”，怎可以“轉危為機”呢？

我謹此陳辭，支持所有修正案。

主席：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施政報告發表之後，並不出乎意料之外地，有人指摘它是一份沒料子的報告，甚至提出譴責，“多謝”也不想說一聲，我認為這是有欠公平的。現在經濟低迷，實際上是取決於很多外來因素，不能由香港自己來控制。何況，行政長官也不是神仙，不能只靠個人提出的一份施政報告便能解決問題。我們大家應抱着同坐一條船的心態，加以客觀的評估及分析。

旅遊業

首先談一談旅遊業，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重點提到旅遊業，表示他肯定了旅遊業對香港的重要性。再者，決定委任旅遊事務專員顯示政府對旅遊業的關注及承諾。不足之處是沒有更具體提及有關興建新旅遊點的建議，以及沒有清楚闡述旅遊事務專員如何跨部門地推廣旅遊業的發展和政策。

自由黨與行政長官會面討論有關未來 1 年發展的方向之時，我們指出政府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已不合時宜，香港所需要的，是政府採取“主動進取”的政策。這政策包括所有經濟活動，也包括工商商業裏的一環 — 旅遊業。本人上月在倫敦，從前任英國旅遊局主席得悉，當年原定是以英國倫敦作為興建歐洲迪士尼樂園的首選之地，還在希斯路機場附近找到一個地點，當時英國旅遊局對此亦表示歡迎，可惜英國政府沒有及早積極主動與美國迪士尼公司接洽和落實有關興建問題。最後，歐洲迪士尼樂園的專營權被法國奪得。現時，法國迪士尼樂園的入場人數比巴黎最著名的旅遊勝地聖母

院還多。

鑑於現時世界名牌主題公園並不多，而英國有前車可鑒，為免日後政府就喪失第二個亞洲迪士尼樂園的專營權而後悔，本人促請政府對興建迪士尼樂園的問題應採取積極進取的態度。這不等如人們所說的，是以賤價送地給別人來經營，其實，香港有其優勝之處，只有香港能同時吸引東南亞地區的市場及中國大陸的市場。我相信政府須做的是：第一，在城市規劃有所承諾；第二，承諾作出基礎設施的配合；第三，對未來中國內地的旅客 — 大家不要忘記，這是 5 年後的事 — 如何能更方便到香港旅遊，作出承諾。這已足以表示政府是支持及重視這個項目的。

本人和業界均對行政長官決定委任旅遊事務專員負責推廣香港旅遊業，表示歡迎和支持。我們認為旅遊事務專員必須有足夠的影響力，因為涉及旅遊的政府部門眾多（如保安局、工務局、經濟局，甚至運輸局等），各部門均有各自的工作目標，未必處處與旅遊業的目標吻合。旅遊事務專員應成為業內下呈上達的渠道，收集、研究和分析業內人士所提出的意見，制訂全面和有效並有利於事業發展的策略；更重要的是，要令這些政策可以得到政府跨部門地互相配合及執行。

要發揮香港旅遊業的優勢，我認為政府在以下數方面應加以考慮。

第一，減輕經營者的負擔。我提議政府應該減少或暫停徵收有關旅遊業的收費，例如各類牌費和酒店排污費，以及機管局向航空公司收取的升降費等，以減輕經營者的營運成本負擔。

第二，出入境關口開放。皇崗口岸對貨運的開放時間雖然早已 24 小時通關，有海關及入境處職員辦工，但客運卻於晚上 10 時截止。由於現時香港缺少旅遊景點，在未有新計劃落實前，香港旅遊事業可利用深圳的旅遊景點，提供更多元化的旅遊節目。延長通關便可增加旅行團到珠江三角洲行程的彈性，促進本港旅遊業。

第三，放寬入境限制。我希望政府盡快落實簡化程序的措施，甚至豁免例如俄羅斯、中東和東歐等地的入境手續。

第四，是台灣旅客的入境問題。預計未來，台灣人來港的數字會繼續上升，因為台灣政府放寬未服兵役的男士出境旅遊的禁制，和將會實施每周休息兩天的工作制度等，相信這會促進短線旅遊的需求，而近水樓台的香港，應該是台灣旅客的首選。

今年 6 月，特區政府給予持有效台胞證往返大陸的台灣旅客可在港過境

停留 7 天，這措施是非常有效的。政府可否再進一步放寬，即考慮給台灣旅客不一定是過境到大陸，而是在經香港往任何地方時，如往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亦可獲免簽證留港 7 天？

放寬措施，不單止對旅行社和酒店有利，對航空業亦有幫助，如香港能成為航空中樞或中轉站，更可用盡機場的潛力。放寬過境措施自然有助吸引轉機旅客順道在港逗留一兩天。

第五，關於內地來港旅行團。“香港遊”的名額雖然是增多了，但新增的名額只交由一家旅行社負責，並不是開放予更多本港旅行社，使旅行團的團價在競爭情況下調低，以及讓更多本港業界人士受惠。很明顯，內地旅客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有潛力的市場。我建議將來可進一步放寬的措施，包括在本港舉辦獨特的大型活動或展覽會時，可讓內地有關人士及單位來港參觀。

第六，積極增加旅遊觀光點。除了我剛才所說的主題公園外，我認為我們應積極爭取在海港興建郵輪碼頭，使香港發展為東南亞郵輪中心及中途站，又或作國際郵輪雲集的大都會。

電訊和廣播業

隨着數碼科技的急速發展，政府建議容許電訊經營者提供廣播服務，和容許廣播經營者提供電訊服務，這是合乎科技潮流的做法，最終使公眾獲益。自由黨是支持的。

我們贊成長遠來說，必須開放市場以促進競爭，但政府必須考慮到市場的競爭環境是否公平，市場是否有健康的發展等因素，並作出協調。

目前電訊市場的問題，是市場欠缺公平的競爭環境，無法促進良性競爭，故政府必須從速就市場的管理提供法律基礎，讓電訊局可以主動調查市場上的反競爭行為，並予以有效制裁；政府亦須規定未來落成的新樓宇，必須提供足夠的空間予所有固網商放置設施。

其實，市場出現扭曲的現象，同樣出現在電視行業上。何以一間電視台可以佔有現時近八成的廣告收益和八成以上的收視率呢？除它本身多年的成功經營和贏取到絕大多數觀眾的支持外，其實很多人士均認為它是憑藉其優

勢作出跨界壟斷，如操縱歌星，間接控制音樂唱片業等。所以政府亦應設立機制，調查一些不正當的競爭行為，例如以不公平、甚至“造馬”方式達成推廣目標，並杜絕這種惡習。

此外，就廣播內容的監管問題，自由黨建議廣播管理局應作出徹底改革，加強透明度，清楚訂定其收取、討論和處理投訴的方法，用客觀科學化、有系統和公平的方法，準確掌握觀眾的口味和社會的尺度準則。

改革公務員系統

政府部門在過去 10 年急速膨脹，目前公務員人數接近 20 萬（所謂金飯碗），若把以公帑支薪的公共機構或資助機構員工（俗稱鐵飯碗）計算在內，人數我相信已經超過 30 萬。香港的勞動人口是 330 萬，公務員的人數已佔 10% 或以上。

現時本港每天的總薪酬開支是 7 億元，當中 20 萬公務員的薪金開支竟佔 1.6 億元，即四分之一。在這經濟衰退時期，過度膨脹的公務員系統會造成一種嚴重的危機，因此，自由黨認為政府有需要仿效社會上很多大機構，進行“減肥”，方法可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是要調整公務員的薪酬待遇，使之配合社會的發展和現況。包括：

1. 全面檢討公務員長俸制度。現時仍領取退休金的退休公務員共有 5 萬多人。隨着醫學進步，人均壽命得以延長，我們應考慮一下這種制度是否還具適應性呢？既然政府推行全民強積金計劃，以公積金取代長俸應否是一個更可行方法呢？
2. 應該重新檢討公務員的入職點。較早前一間人事顧問公司的研究結果顯示，單以月薪計算，大部分公務員的入職點是拋離私人僱員的，差距最大者近 60%。
3. 讓政府部門在招聘員工時有更大的靈活性。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政府可考慮以合約制聘請公務員，可因應工作的需要而聘用更多短期員工，同時在釐訂薪酬時，亦可具靈活性，如只設薪酬上限，不設下

限，鼓勵各個部門節約公帑。

4. 應該檢討政府部門的編制，必要時作出重組。政府某些部門的編制有時候會令人懷疑是否恰當。另一種情況，是一些因應服務需要而成立的部門，在服務需求大幅減少後可能會繼續存在，例如寮仔部。因此，我認為政府應全面檢討部門編制，包括削減或重組重複或臃腫的部門架構，及取締已過時和沒有客觀需要的部門。

第二方面，我認為應引入新機制和文化，提高資源運用的效益，包括第一，現時政府部門缺乏一個鼓勵部門節約資源的機制，以致當財政年度快結束時，即使部門有剩餘的資源，也不能保存下來，留待下年度使用；這很容易導致各個部門在每個年度結束前，會用盡辦法花光所得的資源，造成浪費。因此，政府應引入新的機制，鼓勵各個部門節省這年度的資源，部分則留待下年度使用，這樣會更有彈性。

第二，晉陞是現時政府內部對表現優秀的公務員的唯一獎勵方法，結果導致中上層有時會出現不必要的膨脹。因此，政府應考慮設立其他渠道，表彰有優秀表現的公務員。

主席女士，本人支持原議案。

主席：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主席，行政長官的第二份施政報告，可以說是在荊棘滿途的情況下制訂的，議員和市民普遍對施政報告的期望，亦是相當矛盾的，一方面，我們明白，正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所說：“經濟的困難還會持續一段時間，明年的情況亦令人難以樂觀”，同時，即使政府提出一些政策和措施，亦因為“實施需時，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對刺激經濟增長產生作用”，因此亦不會對施政報告抱太大的期望，但與此同時，大家亦很希望，行政長官可以拿出一些靈丹妙藥，即時回應社會的要求，解決市民的生活困境。

主席，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政府，經常被我們批評為目光短淺，不肯就各方面制訂長遠發展策略，當看過今年的施政報告之後，我們的確可以看到行政長官的高瞻遠矚，因為施政報告用了不少篇幅，提述如何制訂策略推動經濟增長，就香港的未來作出相當宏偉的定位：包括使香港成為華南以至整個區域的科技創新中心，並且要成為在發展及應用資訊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還有發展成為另外 5 個“中心”。

民建聯同意，創新和科技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香港過去十多年，一直過分側重金融服務業而忽略高科技工業的發展，以致我們不論在科研和技術開發方面，都遠遠落後於鄰近的新加坡和台灣。今年年初，行政長官在委任了創新科技委員會之後，才逐漸確立我們須發展高科技工業，因此，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一系列長遠目標。我們衷心期望政府能盡快落實各項計劃，帶領香港市民走一條健康發展經濟的道路，再創繁榮高峰。

主席，自去年金融風暴發生以來，東南亞各國市場大為縮減，本港息口持續高企，本地中小型企業都要面對融資困難的問題。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建議，要檢討中小型特別信貸計劃、成立中小型企業服務中心、透過工業支援基金幫助中小型企業提高競爭力、發展創新科技以協助製造行業提高生產力、與內地有關機構研究如何改善本港製造商在珠江三角洲的營商環境等，都是頗具遠見的支援工業發展措施；民建聯認為，這些措施是值得肯定的，是有助提供誘因，強化本港工業發展的基礎，擴大本地生產總值和增加本港經濟結構中工業所佔的比例。

但我們必須指出，即使施政報告內的工業政策得以全面開展，本港的工業亦不會於一夜之間獲得改善，工業的生產和競爭能力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大幅提高。因此，特區政府必須就着目前各行各業所面對的經濟困境，提出援助措施。短期來說，民建聯認為特區政府必須盡快協助中小型企業解決融資及財務問題。

自從中小型企業信貸計劃在 8 月份推出以來，反應相當熱烈，但不少曾經嘗試提出申請的中小型企業均認為，具體的計劃未能切合中小型企業的實際需要，批核準則亦十分苛刻。工商局表示，截至 10 月初，獲得該貸款計劃的公司只有百多間，批出貸款額只有二億多元。雖然工商局表示會在計劃推行後半年進行檢討，但是，民建聯認為，目前經濟低迷，企業融資有如撲水救火，倘若政府不立即檢討信貸計劃，使企業獲得方便，則計劃是形同虛設的。

我們建議，政府可以考慮改變現行政府及貸款機構各自承擔 50% 的擔保比率，改為由政府提供 70% 風險承擔責任，使銀行更放心批出款項。

在審批準則方面，除了考慮申請人的還款能力和財務報告外，亦應考慮企業的發展前景、過往的業績、企業負責人的營商經驗及管理能力才可決定批款。

主席，施政報告在人力政策方面着墨很少，在“人才培訓”方面的篇幅

只有 5 段，其中為協助就業提出的措施，包括加強勞工處就業選配計劃、改善再培訓課程、提前開始工務工程及促進旅遊業發展以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等，都是較早前就業專責小組所提出的較籠統的建議。

民建聯希望政府能早日落實就業專責小組所提出的建議，並定期檢討建議的成效，使勞工市場健康發展，以解失業人士之困。

我們當然明白，施政報告放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幅香港長遠規劃藍圖。行政長官希望透過推行創新科技及資訊發展搞好經濟，香港經濟盡快復甦。工商業興旺，就業機會自然增加，市民亦可以重建信心。

施政報告指出，政府會研究外地預測人力需求的最佳方法，並構思一個適用於未來 10 年的人力需求推算模式，這是值得歡迎的。我們期望港府能充分利用由此而得出的人力需求趨勢資料及數據，並透過設立就業資料庫，主動搜集勞工市場的資料，包括個別行業擴展及萎縮速度、薪酬趨勢、各大專院校及培訓機構畢業生數目、失業人士行業分布情況等，以改善勞工市場配對，及時對失業問題提出針對性措施，制訂因應市場環境的培訓及再培訓政策。

主席，施政報告涵蓋的各方面，我們民建聯的成員對此已作出論述，所以我現在不再重複。

對於楊森議員剛才所說，擔心行政長官起用親中人士，批評用人唯親而非任人唯才，我感到非常驚訝，為何一位博學多才的人竟然也有如此愚昧的狹窄心態？莫非親中人士之中便沒有能人賢士嗎？莫非有才能的人都不可以愛國愛港嗎？按照楊森議員的說法，特區政府應制訂一套政治審查的招聘公務員制度，以確保公務員都不愛國愛港，或無須愛國愛港。這是甚麼邏輯，是甚麼奇特的思維？

主席，今天當我進入會議廳時，接到一些團體就施政報告所提出的意見書，或許我在此引述數份意見書的內容。

在一份香港青年會的意見書中，表示：“本港出現今天的經濟危機，主要原因是前政府的經濟政策導致經濟結構失衡，泡沫經濟最後之崩潰而調整是必然的，將引致今天經濟危機的責任，歸咎於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及特區政府身上是不合理的。事實上，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上任以來，致力於發展本港經濟是有目共睹的，面對目前經濟困境及外來的不利因素，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施政報告中，既盡力採取短期措施，利民紓困，更加為未來繪畫了宏偉藍圖，……”

在新界社團聯會的意見書中，也表示：“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發表之後，有些人反映，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遠水解不了近渴，沒有靈丹妙藥等。請問，在目前香港經濟環境下，有誰可以開一張藥方，藥到病除呢？冰凍三尺，豈一日之寒，目前本港經濟之困局，除外在原因外，也由於本港產業結構出了問題，泡沫經濟破後，豈能期望一夕可復甦呢？……這個時候正需要工商界、各行各業，同心同德、羣策羣力聯同全港市民，加強信心，共度時艱，重創新天地。”

最後，讓我引述一篇出於香港南區聯盟的意見書：“近期更為亞洲金融風暴和國際大炒家的狙擊，使香港經濟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雖然特區政府果斷而勇敢地採取一系列的保護措施，使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美譽穩定下來，但是這一切紓解民困、轉危為機的部署，卻遭一些政黨和政客乘機誣衊攻擊，極盡醜化董建華先生之能事，更曲解施政報告，以偏蓋全，誤導市民，散播“倒董基金”謠言，妄圖打擊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心，妄想實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何其毒也！全港市民實應深思！”

“香港是我家，齊來管好它”。值此艱難時期，港人應勇於面對現實，和衷共濟，提出切合實際的建議，積極人生，奮發自強，總比高喊“倒董絕食”，苛求責備，來得更為實效！”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涂謹申議員。

涂謹申議員：主席，陳鑑林議員的演辭果然是義正詞嚴，不過，我還是說回自己的演辭好了。

我想說的是有關保安的問題。個多小時前，澳門又發生開槍事件。有人會問，澳門的社會治安亂了年多兩年，為何香港似乎還算不錯？據我的分析，這很簡單，香港事實上有一支不貪污而紀律良好的優秀紀律部隊。我覺得我們的整體治安形勢是不錯的，從數字看來，事實上是 25 年以來最好的。我們現在要關心的，反而是一如很多市民所說，治安會否因經濟變壞而變差，甚至紀律部隊內很多人員都已放出風聲說，治安不會永遠都這樣好，罪案率不會永遠都大幅度下跌的，有可能跌幅會少些，但亦可能會逆轉，不過，我覺得我們應要看的，是各種很微細的趨勢會不會真的變差？總體來說，我覺得

我們可以是有謹慎的樂觀。在這裏，我只是想說，我希望政府在檢討對社會上有需要人士提供公共援助時要很小心，因為這是使我們的治安暫時穩定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們一旦大幅度削減公共援助，我擔心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說回警隊方面，首先，我要說的是，警隊應該從根據法例向行政長官直接負責，改為在架構上向保安局局長負責。從前，總督掌有所有的權力，包括控制軍隊和警方，這是一個很殖民地、很不信任異族的架構。警務處處長理應向保安局局長負責，而不應該直接越過民官的制度。第二，政府說要以科技加強效率，我很贊成，也認為這是必然的前瞻方向。老實說，我很難想像我們在調配警車、巡邏車時，還須找磁石吸來吸去，還須由該等車輛報告位置在那裏。釣魚人士出海時，即使駕駛一隻很輕便的船也會設有全球定位儀系統，這儀器亦只不過是二千多元一部。然而，我們無論警車、消防車、甚至救護車，卻仍須作這樣的報告。我覺得這方面真的存在很大的空間來依靠科技增加效率。我們可見例如著名的美國聯邦密探，在調查一些大案件時，每每會由兩、三名以至數名幹探聯成一組，依靠很多科技和研究作支援來進行調查，而事實上他們的效率是很高的。

最近，有社論說自從發生張子強的案件後，可能會開始引發出一個所謂智慧型罪犯的年代。其實我在三、四年前已提出過這個論調。我預測將來偽造手法的案件層出不窮，例如信用卡騙案、假樓契、假 LC、假鈔票、甚麼都可以假，又或者會發生大規模的清洗黑錢、或與電腦有關的罪行，我相信這些案件是會接踵而來的，因為現時是科技世界。我希望警方和廉署在這方面對人員特別加強訓練，而我們可不可以早一些有一個比較強的基礎來應付這些問題？

政府談資源增值，我覺得警察是應該做得很好的。我們的警隊每年用上百億元的支出，事實上有很大的資源增值空間。數年前，我曾說過，在同一個警區、設立同一個總警司的職位帶領着數百名警察，由不同的總警司指揮官出任，便可以發揮不同甚至好像增加了數倍警察實力般的效果，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我們要看領導才能和效率作為準則，按照這個準則，看看誰是真才實學，誰是濫竽充數，誰有領導才能、誰沒有，他是勤力還是懶惰。幾年前，我們制定了《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賦予政府更大的執法基礎，但我們已等了三、四年，似乎仍未能看到很顯著的效果，讓我今年在此再說一遍，我期望政府在這方面能更積極對黑社會和有組織罪行迎頭痛擊，同時亦要加強財富調查組的人力和資源。另一方面，有關警隊和刑事法條例的改革，我們也久候多時了。97回歸前，我很驚奇地發覺原來政府是沒有忘記這方面的事，還發出了一份簡單文件，但過了 1 年了，今年施政報告裏似乎又沒有提起，我不知道是否要等到 2000 年，不過，我會維持希望，因為由 92

年法改會已開始研究這個問題，至今已很多年了。至於警監會獨立的法例，我覺得政府是完全沒有任何理由推搪的；老實說，心水清一點的人也可預見，再提出這項條例草案的話，在點票時，加上我們的分組投票機制，屆時情況將會如何，而政府心裏亦明白條例草案究竟能否通過。我希望政府不要再以其他的理由作為藉口，如果越遲將條例草案呈上來，我便會被迫越生懷疑，究竟政府是否想連警監會法定化的這個進程也退卻呢？我仍然希望政府考慮讓警察的投訴調查科獨立，或最少也考慮正如警監會所說，怎樣增強其公信力。

最近，我們看到李明達的事件。很明顯，他曾侵犯人權，但他仍能夠接受勳章，這等於在香港人的面上擗了一巴掌。我同意李明達先生以往是一位好警察，回歸時亦將各事務打理得很好，但我們不能說，因為他過往是一位好警察，做過多少件好事，便可以將他這一宗侵犯人權的案件一筆勾銷，我覺得對與錯，是有客觀標準的，否則我們又以甚麼來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呢？

警務人員的欠債問題，仍然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從最近收到的數字來看，是有惡化的趨勢，我希望建議有關當局在這方面多加關注和採取比較大刀闊斧的手法來處理這問題。有關反貪污和廉政工作方面，正如廉政公署說，現在是鬥智的年代，像從前處事那般愚笨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今天早上，我們到訪廉署時，看到葛柏的帳簿，現時的人已沒有這般愚笨，誰還會寫着收了多少錢，或有多少錢未收，沒有人會再這樣做的了，所以我們要增強我們的調查能力，尤其是對一些現代的財技，幾秒鐘可以把金錢經過幾個銀行系統，清洗得無影無蹤的技倆加以杜絕。有一點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我們發覺有些內地的公司，很多時候在廉署就一些事件或就香港某些貪污案件找它們協助調查時，往往要等待一些時間，而結果是有關人等在數日內便會調離香港，從此就由內地其所屬的政府，用其較嚴厲的方法來處理。但是，這樣的情況會產生一個副作用，就是當日子久了，香港人知道凡涉及貪污事件時，如果其夥伴屬內地的資本便可以逃避，而且沒有所謂證據斷續的問題的話，便會產生更大的貪污問題。

另一方面，檢討公務員在海外資產的指引最近出爐。我希望政府部門不要只是從指引着手，而應更認真處理這方面的貪污。現時執法部門有些人士，甚至是位處很高層的人士，將其內地的投資，變相成為合法的收賄，這是很危險的行為。

聯交所和期交所應該列為《防止賄賂條例》的法定機構，我相信政府一定要用硬功，不可以手軟，否則這便會變成令人很失望和沮喪的形勢。市民亦會很密切留意下一任的廉政專員的人選是誰。這是很值得關心的，因為這隱含着的意義是，我們的法治公義和反貪污制度是否可以延續。

此外，貪污行動舉報委員會成員行將更換人選，屆時會換上甚麼人呢？這些人是否社會大眾能夠接受和是否能發揮安全閥的效果呢？這些都是市民會密切留意的。

至於消防和救護方面，第一點我要說的，是緊急救護服務改為以召達時間作服務標準，是經過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成果。但很可惜，由 93-94 年至今，雖然這基礎終於改了，但效率竟然未有寸進，我們說着的標準仍然是 10 分鐘加兩分鐘，如果黃宏發議員的記憶沒錯的話，事實上可能還慢了 1 分鐘，因為我們曾經談及 10 分鐘加 1 分鐘的。此外，由於最近火災頻繁，消防處和機電處在這一連幾個月更須加強有關的巡查。

說到入境事務方面，我希望政府能積極爭取更多外國的免簽，以便在旅遊方面給予我們更大的方便。最近，政府剛剛收緊對某些國家的國民的免簽及逗留的時限，我覺得那是基於一些客觀的數據而作出，所以我是予以支持的。

另一方面，昨天許長青議員說到，許多國家在香港沒有設立辦事處，對營商人士來說，簽證是很不方便的。我很認同這一點，並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向中央政府爭取，讓這些國家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懲教制度方面，麻浦坪的事件反映了現時的太平紳士調查制度是有值得檢討和改善的地方。第一，太平紳士是沒有獨立的調查隊伍協助，我今次沒有提出這樣的要求，但我仍希望太平紳士最少可以像警監會般，可在某一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某些報告，否則的話，我們這整個制度就會變成太平紳士表面上很是威風，有權執行公義，但實際上卻不能做甚麼的情況，而該事件正反映出我們的制度是多麼的不濟事。

至於更換海關和懲教署的首長問題，以我的意見是希望盡量可在署內提升，如不能找到理想人選，才可考慮最後由警察借調。

對於因越南難民問題而招致的欠款，我建議從中國作為會員國付予聯合國的費用中扣除，直至扣清為止。這是實際可行的方法，亦是公道的。

人權法制司法方面，我樂於看見政府沒有提到《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制定，政府審慎處理這問題，亦就此進行過廣泛的諮詢。我也樂見中國簽署國際的人權公約，但我對於人權公約的執行和監察方面則有些擔心，如果我親身出席過民政事務局高官數次的舉辦有關會議，聽到人們對人權的錯誤認識，便會覺得更應該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來處理這些事務。

說到最近律政司內高級人員的任免，我覺得有很強政治背景或身份的人都不適合任該職。他不能令普羅大眾信任我們的司法會得到公義的實踐。我們要看看下一位坐上檢控專員職位的是誰。我十分擔心會產生公義倒退的現象，因而滋生了一份心淡的感覺。

至於最近引起的司法管轄區衝突問題，我覺得政府是要很審慎來處理。

主席：涂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在 1992 年美國大選，克林頓憑着一針見血的選舉策略：“It's the economy, Stupid”，充分表現他能掌握時勢，贏得國民對他解決困難的信心而得以當選。幸好香港充滿着智慧，君不見第一屆立法會選舉時所有候選人的政綱，都是以經濟為主題麼？不過，面對着危機而大聲疾呼，只是小聰明的表現，如何克服困難，轉危為安才是真正智慧的考驗。

每年的施政報告都不會是完美的，所以這個辯論便有存在的價值，但當我們批評和表示不滿時，實在有必要作公平客觀的分析，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真正履行我們作為民意代表的責任。自由黨一向都是以積極態度改進政府的施政，並且認為必須具體深入，才會起實質的作用，而我們每位成員都本着這個原則發表意見。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是否一如某些同事所說，完全一無是處呢？難道制訂策略推動經濟增長是錯誤的大方向？難道我們無須力求創新，發展科技？難道香港無須重新定位，從而訂定新措施以鞏固我們的地位？行政長官所提到的行業，如以旅遊業、金融服務業、資訊科技、廣播電訊、電影工業等創新工業作為關注的重點，是捉錯用神嗎？有聲音大力反對發展基礎設施的擴展嗎？非也，一般的批評其實都可以歸納成數大類，一是了無新意，二是所謂遠水不能救近火，三是未有紓緩打工仔苦況的措施，四是缺乏立竿見影的措施來恢復信心。其實，這些批評在某程度上都有其道理，但從一個積極的取態看施政報告，便應該首先仔細分析一下被普遍認同為可取的策略。行政長官對創新科技委員會的首份報告予以肯定和支持，自由黨認為行政長官對推動高科技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我們必須明白這是一條高風險的漫漫長路，要成功便一定要給予參與的人士和組織有足夠的空間開創創新領域，切勿讓政府慣常的保守因循思維，阻撓創新能力的發揮。與此同時，行政長官明確表明，這方面的發展是為工商界創造有利的環境，發揮和增強我們的競爭優勢，這些目標最終是為了鞏固香港的創富能力，因此，任何學術研究都不能偏離這個最終目標。

除了高科技之外，自由黨堅持高增值亦是同樣重要的一環，但要增值，

便先要認清要增值之所在。無疑施政報告列舉了好幾個行業，但對於傳統行業卻着墨不多，尤其是對過往相當成功的製造業和服務業，並沒有甚麼特別好的建議。

其實，一個非常顯明的道理，是任何做生意的人都明白，但卻往往被其他眾多問題所埋沒的，便是在一個自由經濟體系中，經濟興衰的源頭是在投資和經營者的手中，政府的責任在於製造有利的經營環境和訂定公平的遊戲規則，目前唯一可望促進經濟復甦的，便是重建投資者的信心，這樣才是真正可以緩和失業問題的良方。

我所代表的批發零售界，絕大部分都是中小型企業，他們經常向我吐苦水，大嘆生意越來越難做，主要原因是市民的消費力和信心薄弱，加上回歸後香港與國內交往越加密切，間接削弱了他們的競爭力。但他們也埋怨政府不單止未能幫他們一把，反而不時為他們製造更多困難，尤其是在經營成本方面，令他們百上加斤，增加收費和繁複的手續都是令他們頭痛的問題。經濟好景的時候，政府加價從不手軟，現在經濟不好，為甚麼政府不能減價？此外，勞工問題往往因錯配而使他們在人手短缺的情況下減低效率，而遇到勞資糾紛時，他們亦覺得勞工署往往不夠持平而令僱主不滿；排污費對食肆而言仍然是遲遲未能解決的死結；近月來為某些有特別需要的行業而設的貸款，都是“得個聽字”。我接觸過的個案都反映政府完全對急切的求助視若無睹，有時候還以虛假的表面工夫取替了實質的效果，甚至粉飾真實的情況誤導公眾及議員，25 億元的中小型企業特別貸款計劃便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若政府堅持要多等數個月才作檢討，恐怕比“手術成功，但病人死了”更為荒謬，屆時連手術也可以省卻了。正是政府這種後知後覺的態度，使營商者心灰意冷，對政府失去信心。

香港服務效率高，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否就此便能令顧客開開心心，卻又必然。前幾天，我在零售管理協會主辦的“傑出服務獎”活動中擔任評判，其中一位參賽者以 10 個字來形容她的服務指標，其實是值得香港的服務界借鏡。她獲得是項比賽最佳服務金句獎，句子是：“今天笑着走，下次笑着來”。若香港服務業整體都能夠達到這效果，便能在亞洲經濟復甦時一枝獨秀，拋離對手，但對於這種激勵行業士氣的姿態，政府又有否竭力推動呢？

與零售業息息相關的是旅遊業，其實政府對這行業可說是另眼相看，皆因它是我們經濟的重要支柱，這是連小孩子也明白的道理。最近本會也曾就跳蚤市場這題目對政府提出質詢，雖然珍寶墟計劃最終被放棄，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攬作市場，而我很慶幸有份參與設計，結果，上星期有 45 200 人入場，其中包括了遊客。我知道有數位關注就業的同事也似乎把這活動的目標

視為創造就業機會，但我卻認為若這些新意念成功，便要取決於商業原則，如人流、生意額等，最終目標是利潤；換句話說，“有錢賺”便可以經營下去和製造就業機會，“蝕本”便甚麼也不用談了。

10 月 7 日當天，聽過施政報告後，自由黨的確曾經就行政長官未能對興辦狄士尼樂園表態而感到失望，不知道是否因各位同事都非常認同我們自由黨的看法，於是大家齊齊炮轟經濟局局長。其實當天的局面是可以避免的，試想如果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明確交代政府正在積極爭取這重要項目，不單止省回議員的口水，更可以令大家精神一振，亦無須官員近日花費時間精神，急急“補鑊”吹風。時至今天，我作為多年前此項建議的倡議人，反而覺得既然政府已公開交代了他們的態度和行動，我們便不應再為對方機構製造談判籌碼，要對我們的官員有點信心，其實想深一層，珠海條件實在比我們遜色得多，而新加坡又沒有中國市場的優勢，更沒有大都會本色的吸引，所以我們根本不用擔心。

我多年來不斷爭取關注電影行業，但港英政府一直我行我素，而行政長官在短短一年間便積極回應，實在可喜可賀，但最終能否做出成績，將取決於政府能否好好善用業界的專業知識，對症下藥，若是畏首畏尾，則恐怕只會帶來失望與灰心。

基於以上各點，雖然施政報告未必盡如人意，但卻不能說是“無料到”。然而，行政長官必須確保所定下的路向和目標，不會在執行時被辦事不力的人員或人為錯誤所拖累。我並不是杞人憂天，而是過往有太多經驗告訴我們，不少好的政策便是因為執行差勁而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好像出售公屋、母語教學和加強學校資訊科技課程等，政府實在有必要從經驗中汲取教訓，避免再次犯錯。

說究竟，我們的公務員體系的確是過去一年來引起民間不滿的觸發點，除了以上說過的一些失敗的例子外，同樣重要的，是政府和官員的態度和文化。

首先，“積極不干預”已經不合時宜，特別是經過早前政府入市，這口號已流於空洞和毫無意義，當然我並不是建議“官與民爭”的取向，但作為一個口口聲聲標榜“行政主導”的政府，必須有作為領導的大將風範，特別是在重振經濟方面，一定要大刀闊斧，廣納有建設性的意見。但願行政長官每天兩個半小時接見外人的習慣，可以感染其他官員，讓他們學懂謙虛體恤的工作態度。那種目中無人、狂妄自大，自視精英的態度，是不會贏得市民的尊重，而只會令人反感而已。此外，政府在來年一定要有決心，改變“各局自掃門前雪”這種僵化的、“隧道式視線”的解決問題方式，對有需要跨局跨署齊齊解決的問題，以“橫向團隊結合”來應付，才會深得人心；而到頭來，姑勿論是選出來還是委出來的政府，都會取得人民的信心，這樣才能

有效管治，創建美好將來。

主席：程介南議員。

程介南議員：主席，在座議員似乎不足法定人數，請問是否有需要點算人數？因為應該是“好頭好尾”的。

（主席指示秘書點算在席議員人數。秘書報告不足法定人數）

主席：現在不足法定人數，請秘書鳴鐘召喚議員返回會議廳。

主席：各位議員，按照《議事規則》，我們要等 15 分鐘。現在還有 10 分鐘，請大家先休息一陣子。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有規程問題。我們在點算人數時，是否仍在進行會議？

主席：現在仍正在進行會議。

主席：趁現時還在等待其他同事回來，我想稍作解釋。即使今天因法定人數不足而須休會，對整次辯論亦影響不大，因為程介南議員已是最後一位發言的議員。若法定人數足夠，內務委員會副主席楊森議員會稍後動議辯論中止待續，而在 11 月 4 日的會議，梁智鴻議員將會就修正案發言。若在這 15 分鐘內法定人數仍然不足，只會令程介南議員成為 11 月 4 日的會上第一位發言的議員而已。（眾笑）其實，這只表示將會有多一位議員與梁智鴻議員一同就這項議案發言，然後會由政府官員回應，之後再由議員動議修正案。

下次會議

主席：各位議員，由於現在還未達到會議所需的法定人數，我宣布現休會待續。

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 47 分休會。